

# 目录

绪 论 001

## 上 编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

第一章 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011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时代 011

二、分期的“概念”、“标准”与“界标” 018

第二章 近代史的分期方法 037

一、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 037

二、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046

三、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  
为标准的分期法 050

四、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055

第三章 近代史上限与下限的讨论 063

一、关于上限的三种意见 063

(一)视 16 世纪中叶或稍后的明清之际为中国近

代史的开端/063	
(二)视 1839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070	
(三)视 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073	
二、关于下限的两种意见	079
<b>第四章 分期引起的其他论辩</b>	<b>086</b>
一、近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086
(一)分期的标准与标志/087	
(二)近代与现代经济史的分界/092	
(三)几种具体的分期法/103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10
(一)甲午战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完全形成/110	
(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116	
<b>第五章 近代史分期论辩评述</b>	<b>126</b>
一、共同的理论方法与着眼点的差异	126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及其学术局限	137
<b>中编 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b>	
<b>第六章 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再度兴起</b>	<b>157</b>
一、再度讨论的历史时代	157
二、基本线索讨论概况	161
(一)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161	

(二)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169	
(三)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178	
<b>第七章 关于基本线索的论辩</b>	<b>188</b>
一、“三次革命高潮”说	188
二、“四个阶梯”说	194
三、“民族运动”说	207
四、“两个过程”说	210
五、“双线”说与“三个阶梯”说	222
六、“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	226
七、“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	228
八、“新三次革命高潮”说	230
九、“两段论”说	233
<b>第八章 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深入探讨</b>	<b>244</b>
一、关于上限的讨论	244
二、关于下限的讨论	259
三、近代史的划段问题	270
<b>第九章 近代专史线索与分期的讨论</b>	<b>274</b>
一、中国革命史的分期	275
(一)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问题/275	
(二)中国革命史的不同分期/282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284	
二、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291

三、其他专史的线索与分期	296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296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299	
<b>第十章 基本线索论辩的评价</b>	<b>304</b>
一、与五六十年代近代史分期论辩的比较	304
二、进一步探讨基本线索问题	310
<b>下编 革命与改良的论辩</b>	
<b>第十一章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b>	<b>319</b>
一、革命与改良的概念	319
二、革命与改良论战与史学重大是非问题	330
<b>第十二章 “告别革命”及其批判</b>	<b>342</b>
一、《告别革命》一书的论点	342
二、对“告别革命”的批判	347
<b>主要参考文献目录</b>	<b>357</b>
<b>编辑后记</b>	<b>388</b>

## 绪 论

### 一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它的探索不但有助于学科体系的建设和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的开展,而且有益于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其本质的把握。因此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两次对此问题的探讨和论辩,这种探索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发展。本书的前两编就是对这两次探索和论辩基本情况的阐述,其主旨在于捋清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并为将来进一步探索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一个学术背景。

上编主要叙述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辩。

1954 年胡绳最早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是胡绳对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检讨。这个检讨同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开始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及苏联历史分期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影响关系十分密切。胡绳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来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并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从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辩。当时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也同意以阶级斗争为标准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但是在具体分期上个人又有各自的意

见,彼此之间展开了论辩。还有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守任和范文澜。也有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代表人物是金冲及。此外,还有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代表人物是刘大年。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问题,也有不同的争论。关于“上限”有三种意见:其一,尚钺把16世纪中叶或稍后的明清之际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二,来新夏把1939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三,大多数学者把1840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关于“下限”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下限;一种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1956年以前,未涉及对下限的讨论,人们按照传统的习惯,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近代史终结的标志,近代史的下限似乎已成定论。1956年林敦奎首先提出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长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撰文系统阐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是李新与陈旭麓。

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影响下,还引起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标准和标志问题、近代与现代经济史的分界问题的讨论,并形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几种具体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学者虽然争论较为激烈,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方法,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指导,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对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他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时,虽然着眼点不同,进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从当时的论辩过程中可以看出,参加论辩的学者,不管是自己的立论还是对他人的驳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得出来的,所以从不怀疑自己的结论。这是当时学者们共同理论方法

的充分体现。为什么运用共同的理论方法会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这是由于经典理论的论述有所侧重，学者对经典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掺和了各自不同的主观意识，进而导致着眼点的差异。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事实上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它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教材编写的实践上也有了新的进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是巨大的。当然，仅仅靠几年的讨论，要想解决更多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这次论辩的学术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包括运用理论和思维方法的局限等等。

## 二

中编主要叙述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到了70年代末又再度兴起，并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为题展开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这次讨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取得重要成就的反映。这个时期仅以“基本线索”和“近代分期”命名而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百余篇，而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竟达到了二百多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参与这一主题探索的史学工作者也有上百人。这使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成为二十年来近代史学界讨论的几个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各种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述。除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外，还形成了“四个阶梯”说、“民族运动”说、“两个过程”说、“双线”说和“三个阶梯”说、“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等。通过这次讨论，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和基本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纵观二十余年的讨论，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把握和认识它。

1.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主要指1978年范文澜

遗著的发表到 1985 年曾景忠发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前后的这一段时间。1978 年《社会科学战线》在第 1 期发表了范文澜的遗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一文章的发表，透露了近代史学界在渡过了“文革”之后，开始重新注重学术研究和关注近代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信息。1979 年《昆明师院学报》在第 4 期发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是 5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下限问题讨论的继续，实质是赞同李新和陈旭麓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到 1949 年的观点。而真正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深入讨论的是 1980 年《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1984 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本人的观点，使论辩进一步展开。在这一时期胡绳、章开沅、刘大年、戚其章、苏双碧、苑书义、荣孟源、胡滨、张海鹏、徐泰来、陈旭麓、汪敬虞、张耀美、周清泉等人先后发表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和看法，并参加了热烈地论辩，使得讨论比五六十年代更加热烈，观点也更加鲜明，基本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几个重要理论观点。

2、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这一阶段主要指 1986 年姜进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到 1990 年胡绳在《近代史研究》第 6 期发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学者仍然很多，其中陈旭麓、夏东元等学者的学术探讨有一定影响。

3、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这一阶段主要指 1991 年姜秉正在《学术研究》第 1 期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到 1999 年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第 5 期发表《50 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学术界还在深入

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其中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和林华国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等文章影响较大。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发表文章阐述过自己的意见。但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重心是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和分期的标准问题,所以对上下限问题讨论得不多,没有引起更大的争论。80年代以后,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进一步讨论,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中国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争论,成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问题,国内学者虽然大多数都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划在1839年,1861年,1905年,1911年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50年代就有学者针对1919年的下限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下限问题又开展新的讨论,这种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进行的。讲现代史的开端,也就是讲近代史的结束,两者实际上是在谈一个问题。那么,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甲午战争说;1905年说;1911年说;1915年说;1917年说;1919年说;1949年说;1956年说等。在这其中,持1919年说和1949年说的学者较多。有的学者认为,持1919年说是“合乎习惯”,持1949年说是“合乎科学”,所以长期以来,这两种主张一直并存,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上也有所反映。

八九十年代,由于对中国近代史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探索,又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有关专史线索和分期问题的研究。正如经济史学者吴承明所说:“近年来史学界有个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于多年来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的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较著称的是



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的体系；这显然是一种重视资产阶级运动的想法。而在最近一次中国近代史体系讨论会上，则竟提出应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个讨论势必涉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看法。”（《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与“史学界至今争论未已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紧密联系着”，“中国近代哲学史与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同经济、政治史紧密相关”（张琢：《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23、25页）。事实正是如此，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五六十年代近代史分期的论辩与八九十年代基本线索的论辩，两者比较，有如下几方面共同之处：其一，意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其二，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其三，探讨了重要的历史问题。两者比较，还有如下几方面的不同之处：其一，后者思考的范围和思维的空间逐步扩大；其二，后者更重视探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论；其三，后者更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问题。

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两次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的高潮，使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它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完结，还将被不断地探索下去。为使新的探索取得新的成效，笔者认为还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要注重加强微观历史的研究；其二，树立“纲”与“目”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其三，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总之，经过半个世纪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探索，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在新的世纪里，在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将继续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

## 三

下编主要叙述 90 年代革命与改良的论辩。

粉碎“四人帮”后,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了重新评价戊戌变法的热潮。随之史学界非常关注地探索有关改良、改良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概念,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历史。邓广铭在《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26 日发表《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一文,详细阐发了他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概念的理解和认识。90 年代以后,学界又一次探索革命与改良的概念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有的学者还认真梳理了经典作家对改良与革命关系的有关论述,并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肯定革命但并不拒绝改良。其次,改良而不忘革命,特别是当革命条件成熟时,就要采取坚决的行动。第三,对于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必须揭露和批判。这样的概括和归纳,使人们更清晰了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46—148 页。)

90 年代有人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告别革命”主张。一些中青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则在不同场合的讨论中,也从不同的角度与之不谋而合,进而拉开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论战的序幕。对辛亥革命的褒贬,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辛亥革命究竟该不该发生,人们各持己见。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诸如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和发展道路、中国近代的反帝反封建、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反传统定论的新观点。1995 年以来,一部分学者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在发表的文章中,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与上述否定意见展开了争鸣,并在学术界形成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批判“告别革命”论的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和政治的高度分析和评判了“告别革命”论的错误和危害,进而有益于人们坚定信念。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会再度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迎来新时代的繁荣和辉煌。

上 编

---

五六十年代中国  
近代史分期的论辩



## 第一章 | 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时代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文章提出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的主张。问题提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论辩。这场讨论一直延续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

胡绳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主要是想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来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胡绳为此作了缜密的思考,并在文章中专门撰写了“问题的提出”一节,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胡绳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和著作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书籍由于不注重科学地分期和缺乏对基本线索的准确把握,所以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欠。他把这类书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阐明中国近代史,这类书只是看到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片面,而忽视了许多带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比如李泰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一书,把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按照皇位更迭而分成“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

等,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同样依照北洋军阀的当权者的更换来划分时期。再比如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一书,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共和时期”。胡绳认为以上这类划分时期毫无意义,既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中本质的东西。另一类是用“纪事本末体”方法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若干突出的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而放弃了具体的分期办法。比如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版)就是这样。由于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胡绳看到了中国近代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所占的比重不同,其中就有跟“纪事本末体”这种体裁有关的因素。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容易只顾及某些大的政治事件了。胡绳特别指出,有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籍,也有类似的缺点。比如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版)一书,在第五章“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中的“甲午战争前中日经济政治状况与两国的外交关系”一节中,述及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工业开始萌芽的状况。到了第六章“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为叙述“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才又附带叙述到甲午战争前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和当时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的发展,很明显是密切关联的,把二者分开来阐述,缺乏完整性。再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7年版)一书,也把这二者分别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叙述。在标题为“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的第五章中述及了当时的工业发展的状况,到了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的第七章中才又退溯到“甲午战前改良思想的酝酿”。这样的处理给人以割裂历史的感觉。与胡绳观点相似,戴逸在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也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评价:“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近

代史的系统著作。这本著作打击了封建的、买办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历史观点,在近代史一片荒芜的领域中作了初步的垦辟工作。但是,正由于范文澜同志没有能在比较科学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来完成自己的著作,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这本著作的科学性。使它在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上显得不够有力。”<sup>[1]</sup>

胡绳的上述分析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有很多种,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版)、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版)等等。这些书籍在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所建树,对中国近代史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偏重于纪事本末,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讲,采用这种方法撰写,就会出现上面所谈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书籍在写作思想上有自己的特点,并力求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本质与规律。比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采混合式的编法,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之事变与运动皆冶为一炉,作综合的叙论”<sup>[2]</sup>。李鼎声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混合式的编写法,是和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

历史学在现今已不能单纯地看作一种记载的科学了。自从新的历史观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以来,历史学就担负了一种极重大的任务:它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种活动之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来,不只是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要从新历史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即是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亦不能合理地存在了。……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史如果目的仅仅在要使我们依据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来



发扬所谓‘国粹’，或记忆许多兴亡治乱的事迹与民族英雄的伟业，那简直是在和历史开玩笑。实际上，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知识工具。（《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50年11月新9版，第1-2页）

了解这段话的意义，会使我们感到李鼎声的历史观，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胡绳所阐述的那些情况有一定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就连李鼎声在具体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也未必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我们在整本著作中还看不到这一点。全书似乎还是以某些政治事件为纲，却很少涉及其他。因此，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显然是重要的，而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这可视为胡绳提出分期问题的一个原因。

另外，胡绳当年提出分期问题，也与当时学术的指导思想和学术背景有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不但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亦成为中国学人研究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从此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自从李大钊撰写《史学要论》这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奠基作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史纲》（翦伯赞）、《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从此中国史学有了新气象。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也确立了它在我国学术界和史学界的指导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学在建国之初不但备受史学界的关注,而且还有了一个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界开始注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时,中国革命刚刚获得成功,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紧接着正如火如荼般开展。新中国的学者不仅自身面临着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同时,由于近代史与现实紧密相关,他们还承担着借助自己的研究工作,帮助人民群众理解并投身于现实的中国革命这一义不容辞的任务。1953年4月4日,《光明日报》的《史学》创刊,其《发刊辞》就指出,学习近百年斗争史,以便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史学工作者迫切而又光荣的任务。因此,《史学》有理由以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重点”<sup>[3]</sup>。1952年华岗在总结建国两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时,曾指出中国史学有了由贵古贱今到注重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的转变,他撰文说:“过去史学为少数没落阶级所把持,只重视古代史的研究,忽略了近代史的探讨,甚至有‘看不起’近代史的偏向,有些学者在大学里教书,一定要讲古代史才有‘地位’。研究历史只重视古代而忽略近代,是统治阶级有意的安排。因为钻研古史对反动统治阶级利多害少,而研究近代历史,便容易暴露现实社会的真象,对反动统治不利,它当然不主张研究近代史了。过去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受了统治阶级的蒙蔽,‘复古’的倾向也很严重,现在已由‘整理国故’到重视近代史的研究。两年来对近代史研究空气的提高,确是一大进步,当然重视近代史决不就是抛弃古代史,而仍然给古代史以应有的地位,不过必须改正贵古贱今的错误。”<sup>[4]</sup>华岗在这里是运用阶级的观点来认识解释史学界贵古贱今的现象的。郑鹤声建国初也曾特别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他说:“我们知道要理解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古的历史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也不重要,乃是说近代的历史,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sup>[5]</sup>

史学界开始认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这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

新中国建立初,郑鹤声就开始对历史的划分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某些宏观的分期问题。他说:

历史所包括的范围,最为广泛,在研究的便利上,可以划分许多部门。有就空间来分的,有中国史、苏联史、印度史、朝鲜史、……等。有就性质来分的,有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而以上两种部门,为求研究的便利计,又可依照时间来划分。惟分期的标准,在史学界尚未完全确定。依照向来的习惯,西洋史家常将自有人类文化以来一直到罗马灭亡时代的历史划作古代史,自第五世纪西罗马灭亡至第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的历史划作中古史,而将十五六世纪直到今日的历史划作近代史。中国史家,亦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主要时代,普通以远古至战国末年为上古史,自秦汉至唐宋灭亡为中古史,自元代至鸦片战争以前为近古史,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为近代史。(《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

郑鹤声这里阐述的是学术界对中外历史的宏观分期问题。接着他又根据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析作为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大时期,“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民国前七二至民国八年即公元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九年),总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为自五四运动到现在(民国八年到现在即公元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总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sup>[6]</sup>。当然这只是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新旧两个时期的划分,还不是具体讨论近代史分期问题。不过这对后来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有影响的,对近代史上下限问题的讨论也产生了影响。

苏联历史分期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影响更为直接。中华书局1952年4月出版了由石父辑译的《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

论》一书。1949年至1951年间,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展开了“苏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苏联各地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加了这次讨论。讨论的主题集中在历史分期的原则问题和封建时代及俄国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中华书局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最后发表的三篇总结性论文翻译过来,这几篇论文的题目是《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总结》《论封建时代俄国历史的分期》《论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分期》。翻译这几篇论文的目的的一方面是要读者了解这次讨论的全貌,同时也是作为我国历史分期的一种参考<sup>[7]</sup>。苏联历史分期的讨论直接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界,“苏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产生了生动的回响”<sup>[8]</sup>,在中国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出版和中国古代史分期以及近代史分期的讨论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胡绳1954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也受到了这一影响,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苏联历史学界曾对于俄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中的分期问题进行过长久的讨论,其收获可以供我们参考。”胡绳在思考分期标准时也受到苏联学者的启发,他认为苏联学者讨论分期问题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是对我们很有益的”。戴逸在阐述历史分期的意义时,也引用了苏联学者的观点:“科学的划分中国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是推动历史研究的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正像苏联历史学家德鲁任林在讨论俄国历史分期问题时所指出‘分期的任务系在于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指出它那连续性诸阶段间质的区别’。这种工作‘即令是一种假定的图式,但终究不失为研究者一种指导性和卓有建树的工作’。”<sup>[9]</sup>金冲及在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志时,也受到过苏联历史分期的影响。他说:

苏联历史学界在讨论苏联历史分期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正是这样。在“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所作的讨论总结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过程系以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为基础,参加讨

论的人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出发,企图从国家生活中发掘出那反映生产方式变化同时足为本国史明确标志的现象来。”“参加讨论的人一致反对根据纯然经济性、基础性的现象来在社会经济形态以内划分时期的企图……把历史分期建基在纯经济性的现象上,便必然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但历史家们切不可把阶级斗争的表现视作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历史过程之唯一的和普遍的界标。”“要拿一种单纯的、普遍性的标志来严格划分历史,其不能得到肯定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 1952 年 4 月初版,第 8-10 页)

来新夏 1956 年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阶段问题》一文,在探讨根据什么原则划阶段和在什么时候划阶段的问题时,就直接引用了《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一书中苏联史学家恩·姆·德鲁任林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划分时的一些学术主张。来文指出:“在讨论中集中的问题是‘怎样’和何时的问题,也即根据什么原则划阶段和在什么时候划阶段的问题。苏联史学家恩·姆·德鲁任林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划分时,将把这两个问题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应该拿那作为生产方式发展之结果和指标及作为历史事变之动力的阶级斗争来做基础。应该拿那在生活过程中发生重大影响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极端重要的表现来做为各时期彼此间的分界线’。”<sup>[10]</sup>另外,孙守任等也都引用过《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一书,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苏联历史分期的启示。可见,苏联历史分期的讨论的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并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二、分期的“概念”、“标准”与“界标”

讨论近代史的分期,首先涉及和要讨论的便是关于分期的“概念”、“标准”与“界标”问题。

分期的“概念”指的是如何理解“分期”本身的意义。胡绳当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时,就开门见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胡绳把近代史的时间界定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这是当时大多数近代史学者的一般看法,后来,尤其是近些年来,近代史学界对近代史的时限问题有了不同意见。80年代末,学术界在总结建国后历史学发展的学术史时,有学者对当年分期的“概念”又作过进一步阐述,如:“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变脉络”<sup>[11]</sup>;再如:“所谓分期,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历史应划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的历史,其实质是如何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变化过程”<sup>[12]</sup>。可见,所谓分期问题,是要通过分期这样一种方法,来探讨中国近代史内在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分期”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对近代专史的研究和编纂等等。所以,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胡绳一提出这个问题,马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一场大辩论。胡绳的文章发表后,几年间发表了很多文章参加讨论,主要有孙守任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黄一良的《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史学”63期)、金冲及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范文澜的两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史学”94期)、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荣孟源的《对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李新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

来新夏的《读“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笔记》(《天津日报》1956年10月27日“学术”第二期)、王仁忱的《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章开沅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刘耀的《试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史学集刊》1957年第2期)、夏东元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6期)、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等等。

参加讨论者经过深入地思考,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说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兴趣所在。而这些又表现在对分期标准问题的探讨上。对近代史要进行分期,就要解决分期标准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分期就无从谈起。从当时发表的辩论文章看,关于分期标准的讨论非常热烈。而提出的不同“标准”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观点上。

1、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的标准。这是由胡绳提出的,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忱也同意这个观点。胡绳不同意拿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态做划分时期的标准。他说:“拿西欧各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作一个时期,而在进入帝国主义后作为另一时期?——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国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这里胡绳强调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重要方面,这是对历史本质的一个深刻透视。胡绳也不同意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他说:“中国近代历史中,随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生产关系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一步一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特别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某

些方面的变化要比基础的变化更为激烈一些。因而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考察当时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进行分期。”胡绳在排除了上述两项“标准”后,依据苏联历史分期讨论的思路,即不要“把历史分期建基在纯经济性的现象上”,以防“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sup>[13]</sup>和深刻地理解了“阶级斗争乃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列宁),它的诸阶段和它的长足进展,它的高涨和它的爆发,系反映着整个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地正构成每一阶段阶级社会形态内部历史过程的最重要标志,没有这种标志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即无从着手”<sup>[14]</sup>。他承认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解释“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这样地研究才能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基于这样的分析,胡绳得出了“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的结论。

戴逸也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经济自发发展过程,把纯粹经济性的现象来作为分期标准,“经济的发展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但却不是惟一的因素。直接用经济发展来划分历史时期,那就会忽略多种历史现象交互影响的作用,就会抹煞历史发展的丰富多样性而陷入经济唯物论的错误”。他赞同胡绳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他认为“阶级斗争最本质地反映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都和阶级斗争相关联,发生在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内的斗争,其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所以他的结论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最能够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够揭露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够显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最能够反映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他在支持胡绳观点的同时,也批评胡绳“对这个概念没有作更具体细致的分析,没有指出广义



概念的‘阶级斗争’中还包含着斗争锋芒对内对外的区别,而这个重要的区别却会牵涉到社会阶级关系配备的不同和革命阵营战略策略的变化,却会涉及到上层建筑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色彩。而这一切,在考虑划分阶段时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事情”<sup>[15]</sup>。

章开沅也同意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他说:“阶级斗争的表现之所以最适于作为分期的标准,不仅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且还因为它在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各种上层建筑的变化。这就是说,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为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并且还要受到新的社会思想的促进,而阶级斗争又往往能够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并反转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我们才能比较精确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诸阶段间的质的差异。”<sup>[16]</sup>章开沅虽然赞同基本上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但在对于阶级斗争表现的具体理解上又同胡绳存在着某些分歧,特别是不能同意胡绳“以中国近代史中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来作划分时期的标准”的结论。

荣孟源“赞成胡绳同志的意见,以阶级斗争为分期的标准”<sup>[17]</sup>。另外,王仁忱也认为胡绳关于分期标准的论点,“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是惟一的正确的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的”<sup>[18]</sup>。而且他还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作了概括的阐述。

对于胡绳等人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观点,孙守任、金冲及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孙守任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特殊过渡性的社会,因而在考察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时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而不同意胡绳只拿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做标准来考察。他认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使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因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因此不同意胡绳“拿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态

做划分时期的标准”，“是不恰当的”的意见。孙守任强调，“侵略与压迫如不存在，亦将没有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运动，二者实是辩证统一的两面，而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为存在的前提。”他还说：“胡绳同志的文章已经承认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就无形承认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开始入侵的重要意义。”<sup>[19]</sup>

金冲及也不同意胡绳等人提出以阶级斗争为分期标准的观点。他认为，胡绳同志的提法给人一个错觉，似乎“充满了阶级斗争”这只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因此按照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特征，就必须“用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但事实上，“充满了阶级斗争”这是一切阶级社会中共同的特征，并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特征。他批评胡绳忽视了中国近代历史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极为急骤、极为猛烈的历史。正是社会经济结构这种急骤猛烈的发展变化，才是这个时期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产生的基础。因此，胡绳对分期标准的看法就不免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他指出：“阶级斗争只有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时才能用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如果离开了作为其基础的生产方式之发展变化来考察，那么它本身就成为‘无本之木’而变得不能真正理解，也不能看清它对社会历史真正的推动作用。”<sup>[20]</sup>当然，对于金冲及的看法，一些人是不同意的，这在后面还要论及。

2、以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某些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准。孙守任和范文澜持这种观点。孙守任主张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应当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sup>[21]</sup>。他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主要矛盾的性质”和“某些变化”这样两个重要因素。孙守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有“三种主要矛盾形式”：其一，“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

位。”如在 1840、1894、1900 年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便是如此。其二，“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辛亥革命时期便是如此，实际上这种主要矛盾形式所占的时期是最长的。其三，“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sup>[22]</sup>在中国近代史上如 1854 年英法侵略军联合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1860 年开始的美、英、法等国外国侵略军与清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1900 年 9 月 7 日以后清军联合帝国主义侵略军公开镇压义和团运动，都是显著的例证。而这三种主要矛盾形式所反映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一是国内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大众。考察中国近代主要矛盾性质的某些变化就要从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孙守任正是从这样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他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它们使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的基础，它们决定了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状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1840 年至 1894 年，外国侵略者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其中在 1864 年前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形成与农民反封建革命的高涨期，之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巩固和加深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1894 年至 1919 年，外国侵略者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其中在 1905 年前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农民反帝运动的高潮、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发动时期,之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继续加深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封建革命的高涨及其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孙守任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内,外国侵略者的性质前后发生了某些变化,中国社会的性质前后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将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一个标准。孙守任还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的人民大众所开展的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运动,“除去有高潮低潮的形势变化外,也有性质的某些变化”。他根据毛泽东“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sup>[23]</sup>的论述,强调指出由于中国人民大众反抗运动性质的某些变化,可使前后分为三个阶段:其一,1840至1894年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其二,1894至1905年是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其三,1905至1919年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性质都存在着某些程度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时间上还有一定的相近性,所以孙守任就把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某些变化看作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标准了。

范文澜也主张以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准。他认为,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找出了这个主要矛盾,划阶段就有了可靠的根据。他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sup>[24]</sup>

对于孙守任分期标准的主张,金冲及、戴逸、章开沅、黄一良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金冲及认为孙守任的分期“主要标准,应该是主要矛盾性质的某些变化”的观点虽然正确,但是如何分析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孙守任却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经济中

去探求”来进行分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模糊的、混乱的。实际上,“他对社会性质变化的分析是以对阶级斗争形势阶级关系演变的叙述来代替了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具体分析的。这样就使人无法看清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也就使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无法得到真正清楚的理解。”金冲及也不同意孙守任在划分阶段时特别强调“是否具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及是否和侵略国殖民政策相适应”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这样,“实际上就成为只能跟随侵略国的殖民政策的演变来划分了……如果不是主要来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具体分析,而单纯将外国殖民政策的演变及清朝统治者对外国殖民政策是否适应作为分期的标准,那就是以外来因素的演变发展代替了内在历史规律的分析,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sup>[25]</sup>。

戴逸对孙守任的观点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首先认为孙守任的“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是一个特殊过渡性的社会,因而在考察这个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阶级斗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而不能只拿阶级斗争的高涨和低潮作标准来考察”的观点既没有为这一基本观点树立强有力的论据,也没有明确指出为什么过渡性社会必然具有社会性质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性质的变化。戴逸承认有渐进性飞跃的过渡性社会,但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视为这样的社会。不能把任何过渡社会都混为一谈,每一个过渡社会都有其具体性和特殊性。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有某些变化的论点还值得再研究。另外,孙守任还有一个基本观点是: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社会,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戴逸认为这个观点是片面的,他指出:

这个观点的谬误是在于片面地理解“矛盾论”中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论点,而抛弃了同一论文中关于外因内因相互关系的论点。

我们不能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纵然在旧中国形成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外国侵略势力性质变化这样的外部条件要对中国社会有所影响仍然必须通过中国社会自己的规律性,亦即必须通过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才能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同样性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侵略印度、中国、日本时却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结果(印度变为殖民地、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日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有这三种不同的结果呢?我们只能从印度、中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来找到解释,而不可能从外来侵略势力本身的发展找到解释。由此可见,直接用外国侵略势力性质的变化来解释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带有外因论的色彩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章开沅认为孙守任观点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把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决定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力量这二者混淆起来了。谁都知道,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着事物的性质,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可是必须指出,决定中国近代社会变化进程的力量却主要是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斗争。问题很清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想把中国最后变为殖民地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才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帝国主义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孙守任同志所强调的“全面”,实际上是仅仅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那一面。列宁说:“革命的阶级斗争乃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所谓“革命的阶级斗争”当然是指人民大众,特别是由先进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所展开的反抗斗争。我们所强调的正是这一方面,而且强调与之直接相联系的新的经济、新的阶级和新的思

想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我们与孙守任同志在具体解释和运用分期标准时的原则分歧。第二,孙守任同志忽视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规律而发生作用。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可是孙守任同志却将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简单化了。他曾强调指出:“侵略与压迫如不存在,亦将没有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一说法的本身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进一步研究这种“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行动”的性质究竟是为什么因素所决定的。同样是遭受外国自由竞争制资本主义的侵略,印第安人的反抗具有较原始的性质,而中国人民的反抗则是有组织的农民战争,市民斗争以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同样是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垄断资本主义侵略的反抗,“五四”运动以前及以后也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些当然都不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形态的变化所能解释得了的,而必须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重要因素来求得解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黄一良对孙守任的观点也进行了批评。黄一良认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时期。而孙守任却想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个阶段来代替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时期,所以在进一步考虑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的时候,就把视线片面地集中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上,而把中国人民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十分勉强地纳入这个既定的框子中去。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谁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历史。可是,孙守任在考察中

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时候,却首先着眼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这就抹煞了作为中国历史的创造者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孙守任之所以得出上述错误结论的根源,除了是由于他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忽视了中华民族在不断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过程中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向前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外,还因为他对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解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例如,他在观察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时,虽然也认为在革命高涨中,“中国的主要地区或主要部分的社会矛盾曾经有了转化”,但因为“主导的规定的经常是前一方面”,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以前一方面的变化作为依据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的。所以他就根据外国侵略者“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政策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主要是商品市场与原料地问题,在帝国主义时期,主要是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与原料地的独占问题”,而把中国近代史也分成两大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在这两大阶段内,中国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究竟有什么显著不同呢?孙守任没有明确地加以说明。总之,黄一良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以贯穿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sup>[26]</sup>。另外,夏东元指出:“孙守任同志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历史的标准,但他没有把握不同类性质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分水岭——阶级斗争运动,使他所讲的理由很不充分。”<sup>[27]</sup>

3、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作为分期的标准。这一观点主要以金冲及为代表。金冲及认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适应或相互矛盾),决定着政治生活、社会意识等相应的变化。因此,解决历史分期问题的标准,首先必须从生产方式中、社会经济中、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中去考察。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阶段,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变革最深刻的反映,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最显明的标志。因此,决定历史分期的标准,同时又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表现中去考察。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思考,金冲及认为“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发展各个阶段中的具体特点”<sup>[28]</sup>。金冲及还引用了经典理论,如:“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经济中去探讨。”“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sup>[29]</sup>以此作为支持他观点的理论依据。

戴逸、章开沅和王仁忱等人对金冲及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戴逸指出:金冲及把“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的这个建议作为划分时期所应注意的方面来说是没有不对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是跟经济基础密切相连的,我们若不弄清历史发展过程的经济基础,则阶级斗争的开展就成为无法理解的,划分历史时期的任务也将无从着手进行。问题是怎样才算把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相互结合,金冲及实际上是把两者并列起来而有了划分时期的两个标准——经济(生产方式)的标准和阶级斗争的标准。金冲及责备别人只注意阶级斗争的表征,抛弃了社会经济的表征,其实正像金冲及自己所说“阶级斗争的阶段,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变革最深刻的反映,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最显明的标志”。既然这样,那么基本上用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就不但没有将经济抛开不管,而且恰恰是最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变化。问题是很清楚的,或者是认为阶级斗争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变化,因而基本上可以用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或者是认为阶级斗争不能反映经济的发展变

化因而需要把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并列起来。金冲及的建议正是属于后者,但又和他前面的论述自相矛盾。戴逸认为,阶级斗争反映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此划分时期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忽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sup>[30]</sup>。

金冲及不同意戴逸的批评,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说: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引起一定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影响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二者是统一的,这并不是如戴逸所说的把“二者并列”,更不是分期的“两个标准”。而恰是戴逸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sup>[31]</sup>。

章开沅认为金冲及的“阶级斗争只有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时才能用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的提法是一种多余的忧虑,因为参加讨论的人都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指标来考虑的,并没有谁孤立地谈论阶级斗争。金冲及的提法实质是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割裂开来了,造成他在分期标准上的混乱。并指出:“戴逸同志怀疑他企图提出两个分期标准,平心而论,这并没有误会他的原意。”<sup>[32]</sup>

王仁忱对金冲及分期标准的论点亦不赞同。王仁忱认为理解阶级斗争及其表现,必然要从生产方式去找物质的根源,但阶级斗争的激烈及复杂的情况,有时上层建筑的作用也能影响阶级斗争的变化及表现的形式,同时阶级斗争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最本质的表现他批评金冲及在分期的标准上强调社会经济的变化,是模糊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作用<sup>[33]</sup>。夏东元也指出:“金冲及同志把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第一个着眼点’,是似是而非的。”<sup>[34]</sup>

马鸿模对金冲及的观点也提出了疑问,他认为:金冲及主张分期标准应把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但问题在于如何结合?在具体划分时期时又如何运用这个标准?金冲及没有把问题交待清楚。马鸿模说:基本上把阶级斗争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是在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丝毫没有忽视社会经济的意思。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以巴黎公社为

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断限,这正因为巴黎公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人提到阶级斗争都不应当把它和社会经济分开<sup>[35]</sup>。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标准问题,除上述几种主要观点外,还有其他几种观点。比如,夏东元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帜,是最恰当的,但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要矛盾,三者是内在统一的,不能执其一端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划分历史时期,应该以生产方式为考察的起点,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线索,以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革命的或政治的运动为阶段的标帜。而作为划分历史时期标帜的革命的或政治的运动,以它是否能改变构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某些重要条件为准,以这些被改变的条件是否能促使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不同类性质的主要矛盾为准。这是否有把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三者并列的嫌疑呢?没有,因为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都是被阶级斗争制约的<sup>[36]</sup>。再比如,李荣华认为,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目的就是借助它来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形成、加深、崩溃的历史规律。他根据苏联学者在划分俄国封建时代历史分期时得出“从考察生产方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的发展出发,同时注意到外来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sup>[37]</sup>的观点,认为应该在当代历史科学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全面考察,按照它的特点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形成、加深、走向崩溃等三个发展阶段,李荣华认为这就是分期标准<sup>[38]</sup>。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标准,学术界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提出的观点也比较多,这其中既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也有某些相近似的观点。讨论中,既有针锋相对的争辩,也有温和谦逊的商榷。通过讨论,学术界加深了对中国近代历史分期标准的认识,虽然不能完全取得共识,事实上不可能也没必要一定取得共识,但对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和基本线索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并对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讨论分期标准的过程中,金冲及还提出应该把分期标准和断限的界标区分开来。他主张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的标准;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的界标。但并不是任何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作为界标,只有反映了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发展新阶段开始的重大阶级斗争事件才能被用作界标<sup>[39]</sup>。对于金冲及的这种区分,来新夏表示了赞同的意见,认为这个意见把“标准”和“界标”两个概念区分开,是有助于讨论的<sup>[40]</sup>。戴逸不同意把分期标准与断限的界标区分开来的意见,他指出:既然有了一个社会经济与阶级斗争结合的分期标准,但不拿它来划分时期,还得求助于阶级斗争作为断限界标。把分期标准和断限界标分开,就使分期标准成为悬空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无用之物<sup>[41]</sup>。章开沅也不同意金冲及的看法。他说:我们所理解的分期标准,实际上就是选择断限界标的标准。如果否认分期标准与具体断限界标的统一性,那便等于是取消了分期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可以随意选择断限界标,因此也就很难真正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各阶段间的深刻差异<sup>[42]</sup>。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争论双方的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在如何表述的方式上存在着分歧。邵循正就认为:在分期标准问题上,戴逸与金冲及的意见并非完全对立,但对标准的理解则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标准问题。目前对各历史时期内容的理解还有不小的出入<sup>[43]</sup>。来新夏也认为胡绳与孙守任的观点,若从主要矛盾应该是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那么,这两种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sup>[44]</sup>。就连戴逸也说过,如果不是停留在纯概念性的争执,孙守任所主张的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与胡绳所主张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基本内容是相同的<sup>[45]</sup>。这些见解确实有一定道理,论辩也就是在这样的默契中于1957年告一段落。

注 释:

- [1]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 [2]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编辑凡例”第五条,光明书局1950年11月新9版。
- [3]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258页。
- [4] 华岗:《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光明日报》1952年3月15日。
- [5] 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
- [6] 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
- [7] 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本书内容提要》,中华书局1952年4月初版。
- [8] 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4月初版,第4页。
- [9]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 [10] 参见来新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阶段问题》,《天津日报》1956年10月27日“学术专刊”。
- [11]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259页。
- [12] 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129页。
- [13] 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4月初版,第8页。
- [14] 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4月初版,第9页。
- [15] 戴逸:《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 [16]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 [17] 荣孟源:《对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 [18] 王仁忱:《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 [19]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20]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21]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2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1-55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2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

[25]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26]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

[27]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6期。

[28]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29]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26页。

[30]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31] 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32]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33] 王仁忱:《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34]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6期。

[35] 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36]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6期。

[37] 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4月初版,第87页。

[38]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39] 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40] 来新夏:《读〈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笔记》,《天津日报》1956年10月27日。

[41] 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42]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43] 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44] 来新夏:《中国近代史述丛》,齐鲁书社1983年9月第1版,第8页。

[45]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 第二章 | 近代史的分期方法

### 一、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

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史分期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有胡绳、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他们所持的分期标准基本相同,但在具体的划分时期上又各有自己的意见,甚至相互之间也有一些争辩,反映了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走向的不同认识。

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和七个具体阶段。如果用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那就要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中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革命运动高涨时期是社会力量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其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高涨时期的特征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逐步形成的,在这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历史的推动力量仍然是农民阶级;开始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个别知识分子对农民革命表示了微弱的同情并表现出利用农民革命的企图;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趋向于更密切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他们在不损害封建统治势力的范围内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的外壳。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革命运动的



高涨。这一高涨时期的特征是：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国内已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在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后，立即在全国许多地区的群众中出现了骚动不安的严重状况，与太平天国不同的是，其锋芒主要对着外国侵略者；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是用从上到下的改良办法来抵制农民革命。1905年后，开始了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这一高涨时期的特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但是他们提出了革命的理想并付诸革命的行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民主革命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发动武装起义中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和保持革命政权。以上是胡绳对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的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基本看法。在此基础上，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可以划分七个时期：（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前，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有关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二）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南京陷落，这是围绕着太平天国革命而展开的各种斗争的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属于这一时期。（三）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和政治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开始投资新式工业，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对外国教会的群众自发斗争。（四）从1895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和美帝国主义恶毒的“门户开放政策”，私人企业的初步发展——这些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背景。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五）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渐次形成的时

期。在这期间,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政权进一步结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渐渐趋向革命,孙中山开始了革命活动。(六)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三次革命高涨的时期。(七)从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过渡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时期。<sup>[1]</sup>胡绳的上述分期主要是从五四运动前八十年的时期内着眼的。

对胡绳的观点,戴逸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戴逸指出,我虽然同意胡绳同志所说“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分期标准”,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阶级斗争的表现也带有很多特点,革命的来潮、去潮可以说是一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但在中国近代社会中,阶级斗争这一广义概念包含着锋芒对内对外的区别,也就是说存在着阶级的和民族的两个根本矛盾。这两个根本矛盾更迭地起着主导作用,有时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有时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近代社会中主要矛盾的这种转换关系也应该说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此外,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曾经由三种社会力量担当着革命的领导责任,即19世纪的农民,20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和五四运动以后的无产阶级。虽然社会性质以及革命之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无变化,但由于革命动力的变化,就使阶级斗争的面貌全然改观,因此,革命动力的变化也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我虽然同意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的标准,但这个原则应用到中国社会上,就应该考察阶级斗争表现的各个方面,既要考察其高涨低落,又要考察其主要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中的转换,也要考察革命动力方面的变化而不能有所偏废。胡绳同志的具体分期,只着重考虑了革命来潮去潮,在三个高潮的前后划分出四个低潮,而形成了七个时期,这样划分,不但略嫌烦琐,而且也没有充分照顾到近代阶级斗争的特点。<sup>[2]</sup>

章开沅也认为胡绳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七个时期这种烦琐的分期模糊了中国近代史几个主要阶段间的质的差异。例如,胡绳把

1951年到1964年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这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在6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未正式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没有产生,历史的主要动力仍然只是一个农民阶级,我们并不能发现1851年前后的历史有什么特殊差别。再如,他把1901—1905年作为一个独立阶段,也同样看不出它与前一阶段有什么显著差别。总括来说,胡绳所划分的第一、三、五时期,实际上只有作为三次革命高潮的“准备时期”或“酝酿时期”才有独立存在的理由<sup>[3]</sup>。

戴逸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他指出,要恰当地划分近代史的各个历史时期,首先要认清近代社会八十年间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他认为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近代八十年间始终存在着持续的革命形势。即使在革命低潮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时刻表现着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姿态。八十年的近代史存在着持续的革命形势,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封建经济结构解体,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时代里,引起革命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且日益加深,反动统治始终处在不稳定的情势中,不可能把革命势力完全镇压下去;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面临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强大反动联盟,反动势力对付革命的策略和工具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在1840—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出现了长期持续的残酷的革命和战争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特征。假使从阶级斗争的来潮去潮、锋芒趋向以及参加斗争的动力三方面来考虑,八十年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形势很明显地呈现出三个阶段。革命形势的第一个阶段大约从1840年到19世纪70年代之初,这个革命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封建社会历来的农民战争相仿佛,主要锋芒是对准本国封建统治者,参加斗争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城市平民,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发展的最高潮。革命形势的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初延续到19世纪末,这个革命形势是由外国掠夺中国邻邦和中国本土的危机引发起来,主要锋芒对准着外国侵略者,斗争的主力军

仍然是农民群众,但这时已能看到微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义和团是它发展的最高峰。革命形势的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个革命形势的斗争锋芒又是直接对准封建统治者的,但这时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彻底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个斗争归根到底又必然是打击帝国主义,斗争的动力不仅有农民,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和领导,辛亥革命是它的最高峰。上述革命形势的三个阶段,约略相对于胡绳的三个革命高潮。戴逸认为,胡绳关于近代史上三个革命高潮的论点,提供了一个研究近代史的线索,但是仅仅从高潮着眼,还不能指明三个高潮之间在锋芒趋向和斗争动力方面的差异,不能指明其他低潮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方向,用革命形势三个阶段的论点,似可较全面的概括八十年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假使革命形势三个阶段的说法成立,那就应该把它视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基础。断限的具体年代则要求能够充分反映这三个革命形势相互连续和相互区别的关系。因此,戴逸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73年云南、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从1873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辛丑条约》订立,这是外国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邻邦与本土和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三)从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这是资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sup>[4]</sup>

章开沅也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近代史的分期标准,他着重考察了社会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和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1840—1873)。这一时期有如下主要特征:1、在鸦片战争前夜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封建末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自然经济虽然仍占支配地位,但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自然经济的分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2、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以商品倾销为主。随着商品市场

的扩大,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增长,个别近代民族工业在后期已经出现,但作为经济成分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未产生,封建自然经济的分解还是有限度的。3、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买办阶级,部分军阀、官僚逐渐买办化,形成所谓“洋务派”。在为数不多的中外近代企业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但严格说来,在6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产生。4、清政府曾领导了两次民族战争,但始终表现腐败动摇,以失败和屈服结束对外战争。5、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封建统治者。爆发了长达23年(1851—1873)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其主流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下,终于血腥镇压了这次革命高潮。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至此初步确定下来。6、社会思想在此期间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中少数开明知识分子公开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采用新机器并提出发展工矿企业的建议。但是,维新思想还没有发展成较为广泛的社会思潮。(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和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1873—1905)。这一时期有如下主要特征:1、由于逐渐向帝国主义转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进入殖民地政策猛烈的伸张,它们凶狠地侵略中国的边疆和邻邦,并且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展开瓜分中国的争夺。甲午战后,外国资本对华输出也迅速增加,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财政命脉。2、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和封建束缚的缝隙中,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在70、80年代已经开始向近代工业投资,甲午战后民族近代工业更有所增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3、由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暂时的低潮,同时也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加强了争夺,中外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加强了。在清政府和侵略者之间、“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利益的各派军阀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立和纷争。“自强新政”实质上就是很大一部分封建势力为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而进行的“自我改造”。到了19世纪的结束,“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对立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因为“顽固派”通过《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它与“洋务派”在买办

化的程度上已经非常接近了。4、经过三十年间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急剧变化,中国在 20 世纪最初的年代里已经完全具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5、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也没有中断过)。三十年间,零星分散、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终于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战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农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仍然是强大的主力,但在中法战争前后无产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斗争。不过无产阶级当时还处于自在状态,农民的反帝战争仍然是自发的。6、幼弱的资产阶级没有敢于领导各地的“反洋教”斗争,资产阶级的爱国救亡行动主要表现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是这个运动发展的顶点也是衰落的起点。孙中山在 1894 年创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开始一些起义策动,但它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微弱。国内甚至海外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大多数都拥护改良派的主张,这不仅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幼弱,而且还说明资产阶级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与第三次革命高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酝酿时期(1905—1919)。这一时期有如下主要特征:1、震慑于义和团斗争的雄伟力量,同时也因为忙于内部纠纷,帝国主义列强暂时中断了武装瓜分中国的行动,转而通过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侵略。中国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地位进一步加深了。2、民族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初年,特别是在 1905 年以后,获得较显著的发展。旧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显著地激化起来,这就是 1911 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主要经济背景。3、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锋芒已经从帝国主义转到封建统治者身上,国内阶级诸矛盾显出特殊的尖锐性。人民大众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满汉地主阶级之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都充满了深刻的对立与斗争。辛亥革命于是爆发并且一度取得胜利。4、无产阶级仍然没有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只能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力量坚决地加入了斗争。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全国范围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没有彻底地发动和依靠农民群

众,这是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致命的弱点。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并且代表封建专制政体的清王朝,可是不久代之而起的却是更恭顺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地主政权——北洋军阀和其他各派军阀的统治。5、随着民族近代工业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日益壮大。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个别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前提条件正在积极酝酿,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乃是这些条件的综合结果。历史决定地要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5〕

荣孟源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意见。他指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再细分为几个阶段。他赞同胡绳以阶级斗争为分期标准的意见,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至1864年。这二十五年中,历史上有两次对外战争(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和一次太平天国革命。从鸦片战争起地主阶级开始了变化,少数官僚地主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一派后来发展成为维新派;另一些官僚地主开始勾结外国侵略者,在英法联军之役之后形成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始向外国侵略者投降,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勾结外国侵略者来镇压人民革命。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以农民为主体)开始了反帝斗争,凡是侵略军所到的地方,当地人民都群起反抗,广东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影响尤大;太平天国革命主要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可是也担负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任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但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成为主要矛盾了。第二阶段从1864年至1901年。这一时期有三次对外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一次戊戌维新运动,一次义和团反帝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益深入,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竟妄想瓜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

出现,从而也就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是他们人数很少,希望进行从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就是维新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中国工人阶级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企业,随着洋务派经营官办工业就出现了,他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还要老一些。但是,这时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阶级斗争纲领,也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这时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各地小规模起义以及义和团反帝运动都是以农民为主体而进行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三十几年中几百起的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的反帝斗争,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救亡图存也是反帝斗争,三次对外战争是反帝斗争,义和团反帝运动更是普及于全国的反帝斗争。第三阶段从1901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是辛亥革命。十二三年中间,阶级力量的变化很大,帝国主义不是以军事侵略为主,而是以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为主,所以,中国内部的斗争也就特别尖锐。八国联军以后,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和从前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不同,而是依靠帝国主义来维持封建统治。义和团运动逼迫清政府不能不变法,固然这个变法是假的,但到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点便利的条件。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普遍于全国,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民国成立以后,以袁世凯为中心,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和立宪派的资产阶级重新组成了反革命阵营。中华民国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但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还是主要矛盾,这表现为1905年以前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反对美约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收回利权运动等方面。第四阶段从1913年至1921年。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篡权,他禁止国会开会,废止临时约法,使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从此结束,此后虽然保留着“民国”的名义,实质上却是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大地主和大买办的封建专制。他们和清政府的区别,在于北洋军阀的



买办性更大一些。这时进步党和国民党曾经进行过“护国”和“护法”的斗争,但都失败了。他们都不能领导革命。这一时期欧洲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相对地缩减了,但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却扩大了。特别是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使中国陷于沦为殖民地的险境。因此,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反对“二十一条”成为斗争的中心问题,从1915年开始,到了1919年,以“二十一条”为导火线爆发了五四运动。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表现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方面。这一时期,由于辛亥革命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又碰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机会,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一时发展很快,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发展得也很快,由自在的阶级逐渐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时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日益增加,出现了类乎近代工会式的工人团体。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坚的革命力量。到了1921年7月就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阶级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社会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sup>[6]</sup>

上述是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的几种具体分期意见。其代表人物虽然都认可阶级斗争是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但是在进行分期时,每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差异的,反映了学者们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完全等同的,甚至有一定的不同。其实,各自的意见作为一种参考,对人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 二、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守任和范文澜。

孙守任根据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参考主要矛盾形式的转换和革命运动的形势变化,认为中国近代历史

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840年至1864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形成与农民反封建革命的高潮期。英国正式发动侵略战争不仅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方式和性质有了变化,而且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统治阶级部分买办化,与侵略者勾结,吸取洋枪洋炮,加强了对革命的镇压,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失败,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被镇压下去,中外反革命建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巩固下来。(二)1864年至1894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巩固和加深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天京陷落说明革命陷入低潮。侵略者侵略方式由“战争的”转入“比较温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式,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了,但和上期比较没有性质上的显著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积蓄力量,但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变法思想在广泛传播,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三)1894年至1905年,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农民反帝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发动时期。甲午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开始占了主导地位,标志着帝国主义用“战争的”方式代替了“温和的”方式。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引起了第二次革命高潮,农民自发的反帝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激烈开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初步发动,统治者在“新政”破产后开始进行假维新,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革命与改良运动。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干部条件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四)1905年至1919年。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继续加深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的高潮及其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比较更完全的意义”的开始,标志着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开始。1905年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日、俄、英侵略军决定自东北及西藏撤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转入了“比较温和的”形式。帝国主义侵略比上期深入了。大批小生产者失业破产,要求革命;民族资本在1905年至1908年及

1914年至1923年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充实;这样便形成了1911年至1912年的革命高潮,并为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高潮准备了一些条件。反动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伪立宪和假共和的统治策略。把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sup>[7]</sup>

范文澜也根据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近代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一)1840年至1864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开辟世界市场,侵略中国,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这个战争是清政府领导的军队和民众以及自发的民众团体反抗英国侵略的民族战争。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反动性,战争失败了。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使得中外民族矛盾缓和下去。同时,人民大众反封建的矛盾迅速地普遍地发展起来,到了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外国侵略者终于和清政府相勾结,支持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在这个时期里,前后有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两个主要矛盾。1842年至1851年是两个主要矛盾的交替期间,因为《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开始起破坏作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的迅速发生,主要也是受它的影响,所以这一期间可以附属于鸦片战争成为一个分阶段。(二)1864年至1895年。捻军、西南回族、西北回族、苗族在太平天国灭亡以前,已经纷纷起义,太平天国灭亡后,清政府才发动全力来镇压。这些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主要起义军多是国内少数民族,所以也可以称为国内各族反对满族压迫的民族战争(自然也是反封建战争)。1864年至1873年,国内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清政府在外国的支援下消灭了起义军,暂时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清政府在两次国内战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实际力量大大削弱,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都是清政府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清政府进行反抗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中国军士和一部分将领忠勇作战是符合民族利益的。

但是,在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领导下的战争,决不能有好结果,1885年的《中法新约》,1895年的《马关条约》,暂时缓和了这个主要矛盾。(三)1895年至1905年。《马关条约》的订立,中国不仅丧失了东北方屏障,而且连台湾行省也被日本夺去了。帝国主义野心愈益炽烈,侵略行为又深入一步,主要是强占沿海要港,划分所谓势力范围。1895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给予天津、汉口两处租界,法国强迫清政府割让云南省猛乌、乌得两地。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作军港。同年,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湾,以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1898年,法国强占广州湾为军港。同年,英国强占威海卫为军港。帝国主义以这些军港为据点,划分所谓势力范围,互相承认。当时形势非常险恶,清政府自甲午战败后,抵抗力几乎完全丧失,只能用卖国手段来应付这个主要矛盾。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在这段时期里,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就是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方面进行了顽强地反抗。(四)1905年至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后,对封建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一种是采取革命的态度。前者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后者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主张推翻满族统治,“恢复中华,创立民国”。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是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革命自从有了同盟会的领导,开始出现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这个革命达到了顶点。1912年,军阀买办的代表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夺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标志着这个革命失败了。1915年袁世凯宣布帝制,企图恢复名实相符的封建专制制度。自从1912年袁世凯夺得政权,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在这一段时期里,只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其过程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局部胜利(推翻清政府,解决满汉矛盾和取消皇帝名号,建立共和观念)后遭受失败,接着遭受彻底失败,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而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

总起来看,中国近代史第一时期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

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时期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时期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时期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sup>[8]</sup>

### 三、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 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的代表人物是金冲及,他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从 1840 年至 1864 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以及农民反封建运动的高涨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表征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承认了五口通商和关税协定,外国商品输入迅速增加,东南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是就整体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地主、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农民大众,农民生活痛苦不堪,封建主义和农民大众的矛盾依然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

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表征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内部各阶级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外国侵略者,这次战争以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对外投降而告终。战后,外国侵略者以加强商品输入的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压迫,而中国社会内部原来的封建主义和农民大众的矛盾却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更加尖锐化了。这样就爆发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国内各少数民族起义就其实质而言,也是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这次革命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封建势力,而其规模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

是空前的。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入侵,这一次农民运动也就带上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色彩(如初期上帝会教义中的平等思想、进入长江下游后对工商业的“轻税”和“保护”政策、洪仁□的“资政新篇”等)。在农民革命的烈焰面前,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以打为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取得清廷更大的让步后,就和中国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了,汉族的地主阶级和清朝封建皇朝也进一步结合起来了,它们共同对农民革命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但是由于单纯农民革命先天的各种弱点,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二)从 1864 年至 1894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以及反动统治秩序暂时稳定的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表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扩大至北方沿海和长江内地,外国资本主义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利用他们对中国海关的控制,税轻货廉;利用他们对中国航运的控制,运输方便;利用在华新设银行的资金,利用新兴买办的中介,不断扩大自己在华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搜刮。外国商品的输入在三十年中增加到 276%。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传统的茶叶逐渐为棉花、大豆、生丝等工业原料所代替。技术作物耕作面积增加。中国农村的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日益卷入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成为其农业原料附庸。清朝统治阶级也开始创办新式的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的统治秩序,而在经营上也依然是腐朽的官僚制度,对社会经济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被破坏和农民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看到新式工业的有利可图,开始进行投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这一时期都渐次形成。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起,就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压力和封建官办企业垄断的排挤,不能自由地

成长起来。

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表征是：清皇朝、汉族地主和外国侵略者在共同镇压国内农民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农民群众经过上一时期中外反动派共同进行的大量屠杀后，暂时没有力量重新发动起大规模的斗争；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处在萌芽状态，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反动统治秩序取得了一个暂时的稳定局面——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的背景。但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感受到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开始通过地主阶级中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提出了微弱的改良主义要求；农民大众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渐深入内地，也在各地展开了此伏彼起的以反教会为特点的群众性斗争。

(三)从1895年至1900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资产阶级倾向改良主义运动和农民自发的反帝运动高涨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表征是：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一面大大加强对华的资本输出（政治借款、铁路借款、工厂投资、矿山投资、银行投资等），一面纷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以取得势力范围内投资和原料的垄断权。《马关条约》中，清廷承认列强在华直接投资的合法权利，更便利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帝国主义加深在华经济侵略的结果，使正在进一步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愈加感到窒息；也使北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等大量破产，社会秩序发生了骤然的变化。全国各社会阶层都承受到帝国主义的直接压力，中国进一步堕入于半殖民地的社会中。

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表征是：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列强倡议瓜分中国，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中日战争的失败，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于是，在上层士大夫中，以康有为为首的地主阶级中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展开了维新变法运动，实行了“百日维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

宪,反对绝对专制;在经济上主张奖励和发展民间企业,反对官办企业的垄断和对私营企业的排挤;在对外上主张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些主张都反映了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的救亡运动,在当时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并且还没有在经济上和封建势力割断联系,因此这个运动只能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不能充分地发动群众,提出革命的主张。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攻下,终于失败了。在下层农民中,由于直接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受到深入内地的外国传教士的压迫,也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人民反帝运动迅速高涨的强大压力,和帝国主义积极准备瓜分,已危及清朝统治的存在,这些就推动了又一次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但是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依然是自发的农民运动,特别是由于北中国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使它以比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更为落后的形式出现。在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进行武装进攻和清朝统治的叛卖下,结果也归于失败。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这种英勇反抗,加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无法解决,终于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在这个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已经由改良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兴中会业已成立,并在华南各省开始组织反满的武装起义。

(四)从1901年至1914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加深,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表征是:1901年后(特别是1903年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中国重要的新式工业如纺织、面粉、缫丝等此时均初具规模;民生日用品可使用机器者如火柴、水泥、烟草、造纸、制糖乃至瓷业、玻璃,此时亦均有大量新式工业之兴办;甚至重工业及大规模农场中亦有民族资本主义之投资,汉冶萍公司即于此时成立。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已有显著增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数量亦急剧增加。但是辛丑条约缔结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形式转到加强对华的经济侵略。这个时期它



们的侵略有两个特点:1、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有最大的比重(1914年的统计,交通运输业投资及政府借款占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而交通运输业投资中主要为铁路借款),这种借款不仅为帝国主义食利者提供极为优厚的高额利息,并且通过这些借款还可以直接地控制中国的交通、财政和政治。而工矿生产事业之投资则所占甚微,1914年仅占帝国主义投资的百分之十点六。因此,这种外资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破坏作用特别大。2、《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缴纳巨额赔款,本息共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每年需缴本息二千万两。这样帝国主义就成为牢牢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吮吸膏血、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寄生毒瘤。清封建皇朝财政日益困难,更加加紧对农民进行各种苛捐杂税的勒索,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表征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潮迅速高涨,小资产阶级群众迅速革命化,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的青年留学生成为传播这种思想的急先锋。1905年,同盟会成立,正式揭示了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发展实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粉碎了君主立宪派在革命青年中的影响;组织了多次革命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仍起了重大的革命宣传作用。国内的与封建势力关系较密切的资产阶级,展开了收回利权运动和请愿立宪运动,这种运动发展的顶点就是1911年的四川保路风潮。农民群众在各种苛捐杂税下,掀起遍及全国的抗捐暴动;会党在这种暴动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并和同盟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又从军事压迫转为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压迫,在幕后积极支持清廷。清政府自1900年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完全破产。他们一面对外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对内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为了缓和国内的革命危机,又扮演了假立宪的骗局,并对资产阶级作了一些微弱的让步。但是,革命时机已完全成熟了。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新的民主共和国。但是,领导革

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这个革命也失败了。政权仍然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反动军阀手中。

(五)从 1914 年至 1919 年,这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表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卷入战争之中无暇东顾,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着得到显著的发展和壮大。但在辛亥革命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完全未被触动。日美帝国主义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而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英法二国在战后又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灾难。

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表征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还继续领导进行了微弱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实际上只是说明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破产。在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下,思想界产生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强大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的日益开展,工人阶级逐渐准备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1917 年十月革命炮声一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所接受。从 1919 年五四运动起,中国历史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sup>[9]</sup>

#### 四、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的代表人物是刘大年。他认为,如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应当有一个客观的标志。考察这个标志,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基本上从阶级斗争表现来划分;其二,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来划分;其三,从外国入侵或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这三者应当是统一的,不是互相排斥或彼此平列的。一定的社会经济产生相应的社会力量。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演变,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变革引起的。从来也没有与社会经济相隔绝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所谓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只能是这八十年间主要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矛盾论》上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sup>[10]</sup>。这里所讲矛盾的阶段性,当然就是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高潮低落、外国侵略和国内斗争为主为次的转换、革命动力从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反侵略斗争中地主阶级的不同态度等等变化的阶段性。这些都是阶级斗争,并且这些斗争变化又是统一的整体,不是各自孤立的。刘大年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鸦片战争至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是第一个时期。这二十五年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封建经济开始破坏,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在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上有两个主要方面、两个完整的过程。一是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从对抗到结合的过程,一是农民战争从高潮到低潮的过程。二者紧相结合,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太平天国失败而成为定局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由于有外国的侵略,这个阶段里贯穿着两类战争。一类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一类是农民战争。前者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1842年以后广东等处人民的武装反英斗争也属于这一类。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英法联军是英法出面,俄美两国参加发动的。英法俄美是资本主义或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强国。这类战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与外国资产阶级侵略者的矛盾。后者有遍布全国的反清起事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农民与地主间阶级矛盾的爆发。

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从对抗到结合、农民战争从高潮到低落的过程,具体表现为这两类战争不断演变的过程:第一步,外国发动鸦片战争,代表地主阶级的清政府最初出来组织抵抗,人民群众支持清政府,农民和地主阶级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暂时的一致。这个短时间里主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种战争。但地主阶级很快发生动摇,“平英团”的活动使对外斗争中的两条道路明显揭露出来。第二步,农民与地主展开激烈搏斗,鸦片战争期间已经有酝酿,至太平天国达到高潮。侵略者经过鸦片战争,远未满足奢望,并且开始认识到要完全支配中国,主要敌人不是地主阶级的清政府,而是广大群众。侵略者利用局势再次、三次发动战争,目的是要驯服清政府,使它遵循自己的路线。农民和地主阶级间的战争是生死斗争,没有妥协余地。在受到外国武装侵略威胁的时候都分别进行了反抗,但它们是各自孤立进行的。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这时对外仍限于自发性反抗,不是对外国侵略势力有明确的认识。太平天国对第二次英法联军进行了大规模斗争,但并未缓和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则极力避免与外国冲突,只是由于对外国资产阶级还缺少了解,当然也还不甘心屈服,被迫打了两个回合。这表现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而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正因为如此,第三步,在外国侵略和农民战争打击下,地主阶级宁肯向侵略者屈服,也决不肯向农民让步。经过《北京条约》,借用洋兵,中外反动势力完全结合起来。这时由原来国外国内两种战争再变而为地主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合作来反对农民革命的一种战争。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农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趋向低落,近代史明显地在这里成为一个段落。这时没有新的社会力量,推动历史的仍是农民这一个阶级。

(二)1864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是第二个时期。第二个时期里的社会经济生活有许多特点。欧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有了早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这个阶段最后形成的。除了农民分散的反封建斗争,有几个新兴的社会运动贯穿

着这个时期:1、洋务运动,60年代兴起,1895年中日战争后结束;2、改良主义思想运动,大约在70年代出现,1898年维新变法达到顶点;3、反洋教运动,60年代兴起,70年代大盛,义和团运动达到最高峰。洋务活动是地主阶级中最早带有买办倾向的一部分人主持的。洋务活动先标榜“求强”,后标榜“求富”,是地主阶级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活动有其发展过程。它的初期是有两方面作用的:有投靠外国的一面,有从封建统治利益出发与外国抗争的一面。越往后,这种活动的买办性质越明显。洋务派人数不多,实力不小。60年代以后清政府应付局势的权力、办法,主要不是掌握在最顽固守旧的那一派人手,而是掌握在买办化的官僚手里。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因为这时只有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找到支持的力量。改良主义思想运动来源于初露头角的资本主义。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国家独立,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成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维新派虽然没有找到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他们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了这两个根本问题。反洋教斗争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直接反抗外国侵略的活动。其中农民是主要力量。这三个性质各异、作用不同的社会运动却有两个显著的相同点。第一,都是以半殖民地加深,中外矛盾加剧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明确要求民族独立,抵抗瓜分危机,洋务派的求强求富都是半殖民地化加深的结果。清政府被迫连续组织、参加了中法、中日、八国联军战争三次民族战争,把这个时期民族矛盾处于主要地位表露得更加清楚。第二,几个运动都是从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以失败而告终的。三个运动都经过三十多年陆续的发展,至90年代末达到了一个决战阶段。结果是地主阶级彻底屈服在侵略者面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很快宣告破产。农民发动的反帝斗争有重要意义,但无法阻止中国在半殖民地轨道上滑下去。从此清政府与抵抗侵略绝缘,旧式的农民、新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抵抗不住外

国的侵略,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标志这个阶段的完结。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对中国资本主义很有影响。外国由商品输入进而为资本输入,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以后有迅速增长。这些都很明显。但是从经济斗争的整个局势来看,农民的和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两大运动,到甲午战争都还没有结局,高潮还都在后面,在这里不能切断。因此不需要从甲午战争划一个时期。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由于对象不同,分期可以有同有异。研究近代经济史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在甲午战争划一个阶段,也许会恰当一些。

(三)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第三个时期。写在这十九年上的是资产阶级发动革命、走向高潮、到最后失败的历史。民族资本主义也主要是在这个期间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引导出阶级关系一系列新的变化。统治阶级方面,经过义和团斗争,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公开倡言“瓜分”中国,只能像窃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瓜分。地主阶级的清政府对外完全屈服,彻底变成了外国统治中国的工具。在它内部存在了几十年的抵抗派和投降派、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歧最后消失了。这个统治势力因此进一步孤立起来,成为反抗的集中目标。以“反满”相号召进行反封建斗争是这时新的特征。前一阶段农民集中反抗帝国主义,北方义和团主张“扶清灭洋”,南方哥老会抱“顺清灭洋”宗旨。义和团运动以后,农民群众已认识到要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必须反对清政府的统治。河北广宗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湖南邵阳贺金声建立“大汉灭洋军”,四川巴县一带群众发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号召。这并不是重又回到了太平天国时代,而是进到了把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统一起来的时代。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变化。资产阶级这时开始革命化,过去农民分散自发的斗争,开始让位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前,资产阶级只要求清政府作些改革,并不反对这个政权。地主阶级顽固势力用流血政变答复资产阶级的要求。这以后顽固派恢复了政变所取消的全部新政,以觅求与资产阶级妥协。后者用迅速开展起来的爱国、革命活动答复清政府,要求根本推翻这个政权。

兴中会、武毅会、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是这时更积极地开展斗争或这时出现的,激烈的反满宣传是这时蓬勃兴起的。以前,资产阶级和农民分道扬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极力诋毁农民的活动。1901年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出崇敬义和团斗争的议论,并在实际行动上开始联合以会党为组织形式的农民群众。1905年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已趋向高涨。这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由于它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60年以后,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虽然资产阶级还很幼弱,它已经成为一种最成熟的足以发动一场革命运动的力量。发动这个革命的主要成员和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大有区别。据1905、1906、1907三年加入同盟会、现在可以查出本人成份的379人统计,有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为绝大多数。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各占2%多一些。资本家、商人6人,占1%多一些。贫农1人,占百分之零点几。中国资产阶级中,有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有中小生产者,富有革命要求的一部分。这个革命运动明显是代表中小生产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那些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部分则坚决反对革命,只要求实现立宪政体,让自己分得一杯羹。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最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是为争取资本主义最广泛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最后,农民仍是革命的主力,但多少是在资产阶级的发动下活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sup>[11]</sup>。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时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贯串1901至1919年的,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议会政治的斗争。前者是所谓“国体”问题,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后者是所谓“政体”问题,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1902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策划的“大明顺天国”,主张“由人民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同盟会正式高举“建立民国”的旗帜,宣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

共击之”。辛亥起义第一次实现了建立共和国的目标。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挽救议会政治破产的努力。1916年的“护国运动”，是护辛亥革命草创的民主共和国。善观风色的大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乘机挤进了这次活动。1919年孙中山参加的“护法运动”，是护辛亥革命所产生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而残存的“临时约法”。这些活动意义大小不同，但本质并无差别。与此相反，地主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拚命要求保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实质，尽可能多地保持地主阶级统治的形式。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努力失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原封未动，但是推翻了众叛亲离的清政府，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政体。从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并且也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历史的步伐到底是蹒跚地向前移动了。不从辛亥革命划一个时期，并不是忽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因为它没有引起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没有触及封建实质的变动。毛泽东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sup>[12]</sup>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是不需要从此划一个阶段的理由。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自觉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阶级力量起了新的变化。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为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代替，历史由此走进一个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sup>[13]</sup>。

#### 注 释：

[1]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2]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3]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4]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5]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6] 荣孟源：《对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7]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8]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学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史学”第54期。

[9]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66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13]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 第三章 | 近代史上限与下限的讨论

### 一、关于上限的三种意见

#### (一)视 16 世纪中叶或稍后的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50 年代有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与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观点不同的说法,即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已经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使那个时代具备有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特征,因此,以鸦片战争以后的时代为近代的说法不适用了,划分中国近代的标志不在 19 世纪中叶,而在 16 世纪中叶。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尚钺,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的序言中阐明了这种看法<sup>[1]</sup>。

尚钺认为,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一社会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他认为不阐明 1840 年以前封建社会胚胎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及其到 1840 年以前所达到的水平,就不可能了解 1840 年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的和民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历史基础和物质基

础。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影响到农业商品性质的发展,改变了农业经营,而且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与形式上,在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的斗争上,也反映到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制度的赋役上。尚钺认为,这种变化,是从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即16世纪前期开始的。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在16世纪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商品经济有了某些发展,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如苏、松、杭的三角地区等城市手工业中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自此以后,这些新的经济萌芽,一直成长着。到16世纪中叶以后,渐渐发展成比较有力的社会势力。因此,就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影响到对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无论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以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妥当的,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譬如,以太平天国这一个近代史上伟大农民革命战争来说,就其性质说,已经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天朝田亩制度》、平等和平均观念的发挥,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及其内容,如果不与明清之际的市民斗争及其参加农民斗争的现象联系起来,特别是不把它作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政策的一个发展来看,就无法解决。同时,如果不把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想,作为从明末清初经济思想上的均田、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平等平均的观念(由地主与农民平等,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儒释道封建宗教的束缚)等等反封建特权及反封建大地主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的继续和发展,并将它在人民群众的革命纲领和实践行动中具体化,也是无

法理解的。许多史学家把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归结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而来的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种理解并不妥当。因为外因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而且这样的论断仅仅是就上帝会的形式来观察的。实际上太平天国所提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与产生于明清之际一直到太平天国时始终不停、继续发展着的社会矛盾之上的新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乃至社会问题,如市民运动,特别是其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的斗争,在苏州开始以阶级的集团的形式出现,以及民主的和民族的思想的发展,都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才是西方的原始基督教义能够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sup>[2]</sup>

尚钺之所以强调以 1840 年划作一个分界线并不妥当,是考虑到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形成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渐进过程和社会内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黎澍和刘大年对尚钺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黎澍认为:尚钺把中国近代开端提前三百年的主张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改变最初为马克思所指出而后来为毛泽东所论证过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看法,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看法而产生的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长期性的理解。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原则问题。尽管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早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策略路线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仍旧不能放弃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则立场,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是必要的。用某种社会制度的萌芽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这本身就包含着否定它自己的谬误。因为任何社会制度的萌芽都是很早就存在的,它的表现形态是很微弱和很不分明的,不可能成为划时代的事件。一定要这样划分时代,那将等于否认有划分时代的可能性。尚钺用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划分中国近代的主张,即使仅仅从这一点来说,已经是站不住了。何况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已经不同了。黎澍对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特征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指

出,把中国近代的开端推前到明末的主张是倒退到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完全忘记了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血腥侵略的后果。黎澍接着指出,也许有人要问,用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不成了外因论者了么?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外因的作用,但是外因的作用只有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影响中国内部发生变化,这就表明,中国社会内部有发生变化的条件,这条件就是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所达到的高度发展。如果在外国资本侵入的时候,中国社会同原始民族差不多,那就不会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会出现任何有觉悟的人们,也不会出现有觉悟的革命运动。西方一些政客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完全归因于西方侵略者“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是彻底错误的。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中国革命的内部条件。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单纯的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乱,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这个反抗是指有觉悟的反抗,它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用鸦片战争来作为划分这以后的伟大革命时代的标志是合理的。如果尚钺认为这样划分历史是斩断历史的线索,那么,可以肯定的说,有的历史发展的线索是明显地被斩断了,例如,封建主义的历史发展线索是无论如何在这里开始被永远斩断了,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余地了;还没有摆脱行会控制的旧式手工工场的历史发展线索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斩断了,只有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这些都只能是中国近代应当断自鸦片战争的理由。至于斩不断的历史发展线索,例如中国农民战争所特有的持久性和广泛性,是个有二千年历史的不断发展着的传统,决不可能因为划分时期而斩断。为了要有个不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名义,把新出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说成古已有之,因而否定中国近代始自鸦片战争,这在实际上是完全否认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特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根本看法。这样的研究,不管做得多么辛勤,究竟有什么意

义,是值得怀疑的。<sup>[3]</sup>

刘大年也指出,中国近代史始于16世纪或明清之际以及始于鸦片战争这两种主张分歧的实质在于:16世纪或明清之际以后的中国社会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到底是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呢还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对此,刘大年主要考察两个问题:其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从16世纪或明清之际开始的还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通过考察分析,他认为是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一步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下产生的还是从16世纪发生发展而来的。通过考察分析,他认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的变化具有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因此,从16世纪或明末清初来划分中国近代史,事实上是混淆了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性质,抹煞了它们的根本区别。那些反对的理由,不论是正面论述应当从16世纪分期的,还是反过来指责从鸦片战争断代为不当的,都显得顾此失彼,无法自圆其说。刘大年对这两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评判。他指出:正面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今天的近代是指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近代史当然应从有资本主义萌芽的16世纪算起。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着否定自己的谬误。马克思说,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sup>[4]</sup>。恩格斯说,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在农民后面还有近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嘴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sup>[5]</sup>。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认为应当根据这些“萌芽”或“先驱”来改变封建社会和农民战争的性质。至少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各个社会的萌芽都是很早就存在的。如果可以从萌芽区分历史,那就再也无法区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再有就是认为16世纪欧洲已经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与欧洲不应相差太远。持这种理由的出发点有二:一是欧洲为世界中心,二是各国社会的发展在时间上也应当整齐划一。作为世界史分期当然要有统一的标准,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却是国别史。

各国历史本身从来就不是按照人们所想象的某种单纯整齐的步骤子进行的。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进入了封建社会,那时希腊还是奴隶制。四十年以前苏联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今天还处在资本主义的残暴统治之下。假使谁认为可以把希腊的奴隶制和中国的封建制、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从某个年份起看做是同一时代,人们会指出那是绝顶荒唐的。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的近代向欧洲的近代看齐,正是同一道理!反过来指责从鸦片战争断代为不当的理由,一种是认为从鸦片战争分期是斩断了历史发展的线索,并认为封建制度发展的线索从此开始被永远斩断了,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线索也明显地被斩断了。对此,刘大年认为:这些都只能成为中国的近代应当始于鸦片战争的理由,不能成为否认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中国社会有根本区别的理由,相反的,从16世纪划分近代史,那真正是斩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再一种是认为外国侵入只能形成半殖民地,不能形成半封建,其所以成为半封建是由于中国有了近代资本主义<sup>[6]</sup>。这是试图从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一性,来达到否定近代中国始于鸦片战争的目的。虽则拐弯抹角,还是矛盾毕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外国侵入只决定半殖民地,只干涉中国资本主义,不决定半封建,不干涉封建经济,或者是相反,这就必须承认社会生活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在一个社会里可以截然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世界,确实这比任何诗人所敢于想象的情景都来得奇异。不承认外国侵略有破坏封建经济的一面,恰恰就是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有促进中国封建经济解体、给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的一面。外国侵入既不决定半封建,又不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云云,就成了一句响亮的空话。这种

论点本来只是要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一性,结果却走到了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端。试看何等矛盾!要想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一来反对从鸦片战争分期,必定要被这个矛盾的绳索紧紧地捆住,无法摆脱。不用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是外国的侵入,毕竟引起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反面效果。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正视中国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征,抹煞它、轻视它都是不行的。还有一种是认为拿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就是外因论者,这更缺少根据。“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sup>[7]</sup>。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影响中国内部发生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提供了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是由于社会生产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构成的。其中有资本主义因素,但不只是资本主义因素。从鸦片战争揭幕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新的时代,无论从哪方面来的反对理由,都不足以改变这个合理的结论。<sup>[8]</sup>

尚钺在接受黎澍和刘大年的某些意见后,认为他们的批评也有不足的地方,即在他们批评的文章中,缺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与中国丰富的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把1840年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与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具体的阐明。尚钺认为自己的某些主观性片面性的缺点,虽然暴露出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并认为刘、黎两人在解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间联系问题的时候,没有很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方法,特别是学习运用毛主席在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密切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光辉成就,来给以令人信服的说明。<sup>[9]</sup>



## (二) 视 1839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孙守任曾经说,“1839—60 年间连续发动的三次战争及其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推销和原料掠夺开放了整个中国”。他在叙述中国近代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整个过程时又说:“1839—64 年,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势力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sup>[10]</sup>这里似乎承认以 1839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孙守任没有作明确说明。是来新夏公开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的。他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从反侵略的意义上看。中国社会在进入近代的前夕,虽然已届封建社会的后期,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不甚需要外来商品;而英国当时已是一个有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需要向外扩张,首先是开辟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但是它的对华贸易却总处在入超地位。因此,更需要有能改变这种局面的输入品。18 世纪中叶后,它找到了“鸦片”,于是使用各种非法手段,大量输出。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终于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使自己居于对华的出超地位了。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加,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之毒品的残害身体和贿赂的腐蚀官僚机构,引起了整个社会反对那表现在“鸦片”形式上的外国侵略。广州人民在 1838 年底和 1839 年初曾两次进行反对鸦片和英国破坏中国禁烟的斗争,而后一次有八千到一万的群众参加了反对侵略的示威队伍。地主阶级中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如包世臣、朱樽、许球、袁玉麟、黄爵滋、林则徐等都讨论到这个问题,指出鸦片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清政府虽从雍正以来,即曾颁布过若干禁烟法令;但到这时,才把禁烟问题看成政治上的大事,在政府内部展开“弛禁”和“严禁”的争论;最后,更由于全社会的要求和政府本身感到“银荒兵弱”的威胁而决定采取“严禁”政策。道光十八至十九年间,它进行了各种禁烟活动;道光十九年(1839 年)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39 条,本身固有很大缺点,但毕竟是集清朝前此百余年来禁烟法规之大成;同年,林

则徐奉命到广州与侵略者展开正面的斗争。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关系至此发展到了高潮。必须指出,“禁烟运动”决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反对鸦片。因为一则英国“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是经过大不列颠的国会准许的”,鸦片贸易的本身,也是经英国的“最高当局准许的”。再则“鸦片……是大不列颠对印度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手段,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与蚕丝,并且使这贸易均衡,有利于英国”。因而,“禁烟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一种斗争,这也就是英国为什么要破坏中国“禁烟运动”的道理所在。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应该以1839年的“禁烟运动”作为开端。2、从英国发动的事实来看。当中国一开始“禁烟运动”时,英国就坚持不放弃鸦片贸易的立场,进行各项挑衅活动。在林则徐到广州积极推行“严禁”政策的具体步骤——缴烟、销烟、具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便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反对、制造纠纷,积极准备挑起侵略战争。1839年7月7日,他制造了“林维喜事件”,作破坏中国主权的挑衅性试探。同年8、9月间英国派来兵船“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样,便增强了义律的侵略野心,积极图谋实现武装侵略。9月4日,义律竟然带领兵船等以索食为名,进攻我九龙口岸来挑动战争。11月3日,英国新派来的这两只兵船又在穿鼻洋向中国保护正当贸易的水师进攻,接着,从11月4日到11日,中英又在官涌一带接仗六次。六次都是中国获胜。这种进攻事实已是明显得无可讳解了。因此以1839年作为英国发动战争的正式开端,更能切合历史的实际。至于有人说,英国是在1840年才正式出兵,我则认为,1840年英国大量派遣侵略军只不过是1839年军事进攻的继续和扩大。如果一定要从1840年才作为侵略战争的开端,那么无形中替英国侵略者把自1839年即已开始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事实从历史上轻轻地抹掉了。3、从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决定侵华政策的时间看。侵略中国是英国资产阶级久已感到极大兴趣的事情,因此当义律破坏“禁烟运动”和进行武装挑衅等侵略活动时,他们都非常活跃,欢呼机会的来临,并且表示了积极支持这种侵略活动的态度。从1839年9月以后,英国各地资产阶级纷纷给政府上

书,他们用种种理由来论证对中国应该采取的态度:曼彻斯特、伦敦、里滋、利物浦、卜赖克卜恩、布列斯特各地商人都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方法”。伦敦商人在当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应巴麦尊请求而写的意见书中,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主张对华侵略的凶狠面目。意见书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侵华的必要性,他们主张“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他们提出一些对中国的要求,而认为“这些要求,只有表现充分的武力,才能有希望得到”。他们又提出与中国订约的七项具体内容,如开放口岸、废除洋行、协议关税、割让岛屿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在日后的“江宁条约”中都明文规定出来了。在附件中,这些资产阶级更“热心”地为政府规划了一个军事装备和进军方略的草案。所有这些主张都是 1839 年 9 月至 11 月间发表,可见,英国资产阶级的态度是 1839 年就完整而具体的表露出来了。至于英国的决策时间,在丁名楠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一文中曾指出,1839 年 10 月 18 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曾以密函通知义律说:“英政府已决定派遣海军‘远征’中国,届时将封锁广州与白河,占据舟山,并拘捕中国的船只”。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早在 1839 年 10 月就已确定了对华侵略政策。4、从清政府对外态度的变化来看。清政府自穿鼻、官涌等战役连获胜仗后,即于 1839 年 12 月 13 日下令停止中英贸易。道光皇帝的这个措施虽然含有对敌情缺乏正确认识 and 虚骄的成分,但清政府反对英国的基本态度和那时全社会反对侵略、反对鸦片的要求仍是一致的。从那时起,英国方面在积极准备扩大这次侵略战争,而清政府方面除林则徐等在闽粤一带有所准备外,其他各地则均未设防。这时,清政府依然抱着拒外的基本态度。1840 年 6 月间,英国侵略军进犯闽粤沿海不逞,乃又继续北攻浙江,7 月 6 日攻陷定海,清政府立即表现了张皇失措的态度。8 月 11 日,英船至天津,清政府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命令投降派直隶总督琦善负责交涉。琦善在其向清政府的各次报告中,一直主张投降。他认为反对英国侵略有种种困难,况且“本年

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他向英国侵略者保证对林则徐等“重治其罪”,只要求他们立即“返棹南还”,来解除皇帝的紧张。从此,清政府就开始改变过去“严禁”和拒外的态度而走上妥协和投降的道路。清政府为使英船离津返粤时,免于在沿途遭到意外,而特谕沿海督抚:“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清政府对外态度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如上所述,来新夏认为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定为 1839 年,较为确切些<sup>[11]</sup>。

### (三)视 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而在 50 年代比较系统地阐述这一观点的有黎澍和刘大年。

黎澍在《历史研究》1959 年第 3 期发表的《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一文中指出: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才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任务。这个任务曾经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所忽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在《六评白皮书》一文中,毛泽东又从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指出这个时代的特征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满清朝廷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满清朝廷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革命为止的近代中国史。”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乃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他分析这个变化说:“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野蛮的方法改造世界。在这个冲击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

家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为中国人介绍新观念’。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懂得现代技术的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它表明在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具有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可见,把这个时代称为中国的近代是合理的。中国共产党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正是以对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为基础的。黎澍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势力,以致事事处处都离不开它。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与外国资本相矛盾的,但是由于它本身的软弱,又与外国资本相依存。资本的积累过程、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本来就是广大人民破产的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的发展是同欧美殖民主义者的最残忍的暴力掠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带给人民的灾难也就成为人类历史的最惊心动魄的血和火的篇章。这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反映出来的特点。由于有这样的特点,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时代便成为一个特别的时代,它不同于封建主义时代,如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一样;也不足以称为资本主义时代,因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确立;它的适当的名称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从前中国人民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国人民要解放自己,就不仅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而且必须彻底摧毁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经把近代中国的问题看作是与明末清初相同的,有许多人自以为是明末遗老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都以推翻清朝统治为职志,认为只要把它推翻了就可以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孙中山的失败正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纠正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看法,认为必须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问题当作中国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来认识,必须把它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认识,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所以也是划分近代中国历史的标志。<sup>[12]</sup>

对于黎澍的观点,尚钺与之进行了讨论。尚钺当初提出中国近代历史始于明清之际的主张时,黎澍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尚钺也表示自己的某些考虑不十分全面,对于近代史的起点问题,认为黎澍等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对的。但是尚钺同时认为,黎澍等人对中国社会“半封建”性质的阐述不清楚,忽略了毛泽东从全面研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中国社会逐渐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因而中国社会才起了性质变化,成了半封建社会的明确指示,因之,黎澍等人的说法就不能是很全面的,同时也就不能说明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尚钺还认为黎澍的观点没有很好地运用毛泽东两点论和外因与内因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为黎澍的观点表明了,不仅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变化是由“外国资本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所引起,而且中国社会“半封建”性质的变化,也是由“外国资本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所引起,即中国社会内部变化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由于内部原因了。尚钺对黎澍的批评并未就此结束,通过层层的分析之后,他指出:黎澍虽然在表面上极力强调,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对于作为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本质矛盾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反帝反封建的实质,却极力避免提及和阐述,就是不得不提的时候,还以“中国人民革命”的笼统术语来代替,就使我们深刻感觉到黎澍的这种作法是与他选择这个题目——《中国近代始于何时?》极不相称的。尚钺说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学习者,是欢喜阅读历史科学上一切新学说的先进成果的。但对黎澍这个新学说,由于他无视大量正面史实、否定许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忽略经典著作大师们的

原理和方法,而仅从撷拾中世纪习俗残余的个别冷僻材料,又在“不求甚解”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之就不仅不符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从而就很难不发生一些不健康的成分。<sup>[13]</sup>

刘大年也阐发了中国近代历史始于鸦片战争的观点。刘大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及其开始没落、消灭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中国从此开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指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占有控制地位,原来的封建社会遭到了破坏。而这种控制、破坏是外国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各种形式的掠夺等等来实现的。16 世纪起,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有交往,也有过早的冲突。整个 18 世纪里,中外贸易上发生过许多争执。稍后一点,还有战争行动。那时外人要求增辟通商口岸,清政府只准在广州贸易;外商要求减低税额,清政府要求征收较高的税额;外商反对官商监督,清政府坚持外人的活动要由官商监督。这些争执都是一般的,不具有后来那种不平等的性质。马克思指出:“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在 18 世纪的时候,还带有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各种争执所共有的特色,但从 19 世纪开始起,这个斗争则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sup>[14]</sup>19 世纪初,英国开始大量输入鸦片,中国对外贸易由此逆转。在英国大炮打开门户之前,中国社会生活遭受着鸦片这种特殊武器越来越重的打击。然而这根本说不上外国有什么半殖民地控制,中国封建经济也并无显著变化。社会阶级还很简单,主要是农民与地主的对立,中外矛盾尚未成为那么严重的矛盾。只有鸦片战争是剧烈变化的发端。中国由一个独立国逐渐地变成了半独立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呈现出一幅新的复杂的图景。1、封建经济独立发展的进程改变了,广阔的自然经济开始破坏,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分别破产衰退。2、外国在中

国自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中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3、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有了近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在外国资本主义极力阻碍、压迫下,新生产力停滞不前,民族工业得不到自由发展。4、自然经济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把封建剥削制度变成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支柱。这种根本改变面貌的变化,比起16世纪或明末清初那点变化来不知要大过多少,深刻多少。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是对这些事实最好的概括。刘大年还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它的特殊过程,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影响下产生的。16世纪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无疑地比前代发展得更高些。手工业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某些地区、某些行会手工业的行东开始脱离原来的地位而变为工场主,另外的师匠则变为雇佣劳动者。手工业与城市贫民的数目有了增加。封建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明显存在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不承认这一点就说不上科学的历史分析。但是这时的中国是个封建的中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广阔基础,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当资本主义萌芽还远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结构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截断了它的前进道路。资本主义是在中国出现了,但是它不是16世纪以来萌芽状态的扩大,而是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直至这个世纪的末期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最初出现的近代工业,大部分是有买办倾向的地主、官僚、商人的投资,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兴办的为数极少。这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产生的,是欧风美雨波及的结果。半殖民地半封建规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都有矛盾,又都有联系。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个软弱无力的阶级。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证明先天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取得一个革命胜利的结局。毛泽东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



长了资本主义因素,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这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特点。不承认这个特点就更说不上科学的历史分析。原有的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以后到哪里去了?回答是那些手工业因为所处的地位、条件不同,归宿也不同。鸦片战争以后,它们破产了一些,被买办化的商人控制了一些,也保留和发展了一些。没落破产的是广大群众生活所需要、而外国工业又特别发达的部门,这是大量的。如棉纺织业、制铁业、染制业等都是。买办化商人控制的是一部分,起初主要的是提供出口货物的缫丝、制茶等行业。如浙江南浔镇号称“四牛八象七十二只狗”的丝商,广东香山等处丝茶买办,多半是以经营丝茶贸易起家,后来又投靠外商积聚起了更巨额的财富。保留下来的是有长远历史的著名手工业。如有的陶瓷业、丝织业也在新的条件下采用机器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化的工业。不过这一部分数量既少,而且也不是经济生活里在最主要的部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是对立统一的两面,也是构成中国近代社会最基本的两面,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具有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把中国的近代看作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并不是认为在这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永远停留在那里,没有前进,只有因为遭到外国的侵略,才开始了变化。同时把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线,并不是认为社会生活将从此一刀两断,一切都毫无关系了。世界现实从来也没有那么玄妙。指出鸦片战争是近代的起点,目的只在于说明这以前和以后的社会本质有区别。不承认这个区别,就会不可避免地要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等许多重大问题作出错误解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sup>[15]</sup>。

## 二、关于下限的两种意见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下限;一种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1956年以前,未涉及到对下限的讨论,人们按照以往的习惯,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近代史终结的标志,近代史的下限似乎已成定论。对于这种观点本文不作更多的介绍。而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5月26日至6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会上林敦奎提出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长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认为,目前一般意见将1919年以后划为现代史部分,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让位于中国无产阶级,因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和性质在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他认为1840年以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会上马鸿模认为林敦奎的意见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机似乎还不成熟。杨遵道也同意林敦奎的意见,但指出从1840—1949年的历史是否叫做近代史,值得商榷。因为说近代史、现代史实际上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含义;什么时候算近代,什么时候算现代,似乎很难说。有的同志也许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这样拿生产方式更替来区别时代,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国别史就不一定适用。五种生产方式从全世界来说是普遍的,是按顺序发展的。但有些国家的发展不一定完全都经过五种生产方式,所以就国别史

说,由于每个国家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不能机械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变来表明历史时代。杨遵道建议把 1840—1949 年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史<sup>[16]</sup>。荣孟源赞同林敦奎的意见。他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 110 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假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目前止作为现代史,那么所谓近代史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一半,而现代史却包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其科学性来说是不妥当的。中国近代史应当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前,特别是 1949 年以前,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现代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近代史,那时中国革命性质没有变化,按两段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来区分历史是应该的。但在今天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改变,中国革命性质改变了,再保守着旧日的样子划分历史阶段就不妥当了<sup>[17]</sup>。1956 年 7 月在高教部召开的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上,一些专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并为会议采纳,写入了教学大纲<sup>[18]</sup>。

撰文系统阐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是李新与陈旭麓。

李新指出,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我国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逐步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止,这个社会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没有理由把它划分为近代史(1840—1919)和现代史(1919—1949),而应当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当然,把这部通史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写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部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方便起见,把它称为近代史也是可以的。有人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世界带入了新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现代),因而中国自十月革命或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也应算作现代史了。不错,从全世

界看来,十月革命以后确实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但每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并非同时,俄国是1917年,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是在1945年以后,而中国则是1949年。这正如世界史从17世纪起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但法国、美国的进入资本主义却在18世纪,而德国、俄国和日本则直到19世纪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因此,这种论点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应该包括1840—1949年全部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一样,在原始社会处于蒙昧的时期,在阶级社会受尽了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只有新中国的建立才获得真正的解放,开始了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以创造历史的新时期。有人主张把五四以后连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并写成为现代史,这样就无形中把新中国成立的意義贬低了。新中国的历史是人民作了主人成了历史的自觉的创造者的历史,它与旧中国千百年的历史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需要历史学家特别着重地加以研究,另外写成专门的历史。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分期问题,李新主张采用胡乔木同志关于中共党史的分期。他认为这并不是套用党史分期于通史,实在是因为这段时间内通史和党史的阶段性完全吻合,因而没有必要另外分期的缘故。至于每个时期的小段落,由于通史和党史确有不同之处,就不能强求一致了。其具体分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1949)。<sup>[19]</sup>

陈旭麓认为,如果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是五四运动,而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同时对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着重地分析。他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那就是说这110年的历史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历史,它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它的社会生产关系始终是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关系,这种过渡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搏斗。长期搏斗的结果,虽然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但社会生产一直是在曲折的途程上变化和发展的。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些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印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等书,所辑资料的内容,都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这说明了这一百年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为二的连锁关系。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和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的根本特点之一。中国的民主革命完全取得胜利,是在1949年推翻最后一个反动王朝——国民党政府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大陆才实现的。五四运动虽然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但它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那么,把新旧民主革命都包括在一部近代史中,是不是混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界线?我以为问题不在于从旧民主到新民主的联系会混淆了两者的界线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在于写作和讲授者思想认识明确与否。苏联的现代史是以十月革命为起点的,然而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俄国革命是早就开始了的,伟大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不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苏联的历史却把它写在近代历史的范围内。世界史的现代始于十月革命,中国史的现代如果不以紧接着十月革命的五四运动为起点,是否会造成局部和整体的不一致?当然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首先是否定了资本主义世界,宣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此大踏步前进了,鲜明地划出了两个世界和两个时代。然而历史的进程,不可能强求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

的步伐都一样,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它们还有自己的近代和现代。譬如世界史的近代始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却晚至1868年的明治维新才由中世纪的历史正式进入近代,中国的近代也是至1840年开始的。虽然有人想把中国的近代上推至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里我不想把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对比,而只是说明世界历史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所跨进的时代有先后。苏联现代史偶合世界现代史的起点的完全一致,是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在那里实现的。一般和特殊在它的自身获得了统一。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除了就社会形态和革命性质来区分外,就时间的意义来说,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现代就是今,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当1949年中国宣告独立自主的那一天,即中国近代历史的宣告结束,也就开始了另一性质的伟大革命,跨入了现代历史。因此中国的现代还才开头,是正在发展中的历史,它的内容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更加丰富起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不是会割断我们党的历史或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我想应该把“通史”和“专史”区别开来。作为“中国近代通史”的整体来说,它应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纵的方面,以民族民主革命的反复斗争和不断发展的历史为主干,横的方面既要写汉族的历史,也要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既要写社会经济的变化,也要写思想领域的斗争;就是比较刻板的政治制度,也不能完全略而不谈。这样才能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至于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是属于专史的范围,当然这样的专史,它又是革命实践的普遍真理的记述,必然是以伟大的五四运动为起点。另一种性质的专史如近代经济史一类,它的起迄就完全可以和近代通史一致。由于各种专史有它自身的特点,我们既不应以专史去范围通史,也不应以通史来要求专史。这是一般和特殊必有的差异。由于近代史下限的延伸,它的年限将由80年变为110年,这就牵涉到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关系。两三年前我们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有些阶段的意见比较接近,有些

阶段的划分是极不一致的,如甲午战争以后的分歧就特别大。我感到没有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考虑,把五四运动设想为近代和现代史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对问题展开讨论的局限是有影响的。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我以为从1912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可以划作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旧民主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失败后的继续挣扎;另一方面是新民主革命的由开始酝酿到展开第一个重要的战斗回合,这是新旧民主革命换防和接防的阶段。如果“朝代”的兴灭还可作为分期的参考,那么这个15年恰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在前面引述到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就是把1912到1927年作为一个时期来编辑资料的,也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客观存在的阶段性。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如果以片面的理论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sup>[20]</sup>

虽然一直有些学者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而且多少年来编写的教科书和大学课堂上也一直沿用着这一观点,但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以及近代革命的任务来看,李新、陈旭麓等学者的意见更贴近历史实际,所以当予肯定。

#### 注 释:

[1]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2]《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1版。

[3]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4]《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

[5]《自然辩证法·导言》,第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6]尚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

[8]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9]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10]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11]来新夏:《略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天津日报》学术专刊,1957年3月22日。

[12]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13]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14]《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5]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16]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7]荣孟源:《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18]祚新:《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简况》,《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19]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同时参见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新第1版。

[20]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 第四章 | 分期引起的其他论辩

### 一、近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还引发了其他一些近代史问题的讨论,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引起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分期的讨论。正像有些参加经济史分期讨论的学者所说:“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sup>[1]</sup>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吸收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作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如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史的分期必须以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的标帜。……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上,实质上反映了在经济史中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我认为要确定经济史的分期,必须把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和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统一的客观发展过程,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个过程,才能正确地确定经济史的分期。”<sup>[2]</sup>可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具体问题上。

### （一）分期的标准与标志

分期的标准与标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茅家琦撰文指出:在处理国民经济史分期问题时,必须分清两个概念:分期的标准和分期的标志。分期的“标准”所回答的问题是:叙述国民经济史的“主要的任务是在说明什么,以什么来做基本的线索”。而分期的“标志”所回答的问题是:按着分期的标准,用来区分两个不同时期的具体“界标”是什么?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但是有区别。特别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不能混淆。在一些讨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著作中,往往没有分清这两个不同的概念<sup>[3]</sup>。伍挺锋也认为“标准”和“标志”是两个含有不同内容的概念,不能笼统地把它们混淆起来。但是他又同茅家琦的观点不尽相同,他说:茅家琦关于“标准”和“标志”的说法是不明确的。国民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在说明什么呢?又如何来回答“叙述国民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在说明什么”呢?这真是有些令人不解。这些东西,怎么能说成是标准了呢?我的意见,分期标准是指分期的根据,因而标准应当是指内容,而不能是什么“任务”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分期的标准(根据),就是被分期的事物的内容。标准不能是别的东西。至于分期的标志,同样不能含糊其词地说成“按着分期的标准,用来区分两个不同时期的具体的‘界标’是什么”。他认为标志就是标准的表现,就是该事物所通过所借助来反映表现其自身的东西。所以要区分标准和标志,是因为在分期中它们有不同的用处,而且要区分它们的不同用处。他还认为,标准是第一位的东西,我们以此来确定该分多少时期;标志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东西,我们在运用标准确定了该分的时期以后,再以它来找出这些时期起止的年代<sup>[4]</sup>。由于人们对标准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所以产生了各自对标准和标志的内容与概念的不同理解。

1、经济史分期的基本标志<sup>[5]</sup>是经济这个最根本的因素的质的变化,而经济因素本身是包含阶级关系的。陈绍闻持这种观点。这里所说的经济因素实质上就是指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两个方面。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经济时期不是以生产什么来划分，而是以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来划分的。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并且是劳动所在社会关系的指标”<sup>[6]</sup>。马克思的话说得十分明白：首先，经济时期是按生产方式分的，包括生产关系（怎样生产）和生产力（用什么劳动工具生产）两个方面。其次，生产力是最活泼的因素，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有跟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只有生产方式的变革（或者说经济因素的质的变化）才是经济史分期的基本标志，这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史分期的基本标志是经济因素的质的变化，丝毫没有否定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的意思。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是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的。经济史分期的基本标志是经济因素的质的变化，也不排斥以某一重大阶级斗争作为一个经济史时期的起点，只要这个重大阶级斗争确实表明经济因素起了质的变化。陈绍闻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是根本因素，并不认为经济因素是惟一因素。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因素是包括阶级关系的。属于阶级社会的几种生产方式，剥削阶级都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甚至完全占有或不完全占有劳动者本身，向被剥削阶级——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的情况决定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突破旧的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因素是根本因素，但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则是阶级斗争。他进而反对那种误解或故意歪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把经济因素当作惟一的因素，又看不到或者有意抹煞经济因素所包含的阶级关系，企图否认阶级斗争的主张。<sup>[7]</sup>对于陈绍闻“基本标志”的主张，丁日初提出反驳意见。下文我们将加以阐述。

2、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赵德馨在提出这一主张时强调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他指出这些重要的表现是：其一，在一

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与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决定经济史分期必须考虑的因素。其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社会。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和发展,各经济成分间关系的变化上。而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sup>[8]</sup>茅家琦虽然同意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分期标准所作的界定,但是还是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他指出:赵德馨提出的两种重要表现是不明确的,赵德馨认为第一种表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第二种表现“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本质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从封建经济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研究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时必须以这个变化过程作为基本线索,以这个变化过程中

所呈现出的特点作为分期标准。基本线索只有一条,分期标准也只有一个,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主要因素”或“重要的表现”等问题。我们看到赵德馨在最后的小结中又说:“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的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个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等等。”这里,赵德馨却又从原来的见解倒退到强调以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等等作为分期的标准。大家知道,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新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及生产力的发展、停滞和危机仅仅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这两方面才是中国社会经济从封建经济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完整的过程。<sup>[9]</sup>

3、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基本线索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变化和特点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而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以“中国从封建经济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过程”作为基本线索的,这是茅家琦对分期标准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分期的标志则是预示着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阶级斗争<sup>[10]</sup>。对此,郭庠林提出商榷意见,他撰文说:用什么标志来显示这一时期和另一时期的不同呢<sup>[11]</sup>?茅家琦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期标志,这是正确的,我们同意茅家琦的说法。但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一标志在不同的学科中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是否只是指划时代的革命呢?(即指通过一次革命,使得某种生产方式占到确立地位的革命)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茅家琦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按照茅家琦的说法,作为历史科学分期的标志只是指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革命。我们觉得茅家琦将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历史科学分期标志的见解,解释成为划时代的革命,是一切历史科学分期标志的说法,是值得讨论的。从理论上来说,阶级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革命只是阶级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

而已。虽然划时代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却不能说,阶级斗争只是划时代的革命。从历史分期的实践上来说,这也是行不通的。谁都知道,作为历史科学分期标志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具体科学中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哲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就不一定相同。同样,在哲学上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更是不同的。为什么会不同呢?这是因为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因此,问题是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各门具体科学中来划分时期呢?特别是在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发展中如何以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划分不同时期呢?每一门科学都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确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sup>[12]</sup>

4、伍挺锋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对象和内容,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客观的、必然的变化过程,也就是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分期的标志应当是这个变化的表现,阶级斗争是这个变化的最明显、最集中和最主要的表现,因而阶级斗争就是分期的标志。他说只有这样看待分期的标准和标志,才符合经济史的内容,也适合于历史情况和国民经济史这门科学的特点。但同时必须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的标志,否则就不能解决分期的具体年代问题,就会陷于不能自释的矛盾之中。<sup>[13]</sup>

5、丁日初提出,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应当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化。所谓生产关系的重要变化是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应该是基本的生产关系的根本质变;而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的各个阶段之间,则是基本的生产关系的相对地属于量变性质的部分质变,或各种关系的显著消长。进而他对陈绍闻和郭庠林的分期标志提出了意见。他撰文指出:陈绍闻虽然说“划断”不同经济时期的“标界”是社会经济的“质的变化”,但陈绍闻所说的质的变化,却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出现”。郭庠林也坚持“划分

经济史上不同时期的标志”是“新经济成分的出现”。他们说,新经济成分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它开始出现的时候虽然不占统治地位,可是它终将成长壮大,最后一定战胜旧经济而占统治地位。这种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新经济成分的出现”和社会经济的“质的变化”是两回事,主张以前者作为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就不能不否定后者,反之亦然。同时主张两者就不能不自相矛盾。我们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不断发展论者,我们承认在前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内部就有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使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又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sup>[14]</sup>。如果人们按照陈绍闻、郭庠林提出的分期标准来划分经济时期,就会把不同质的社会经济形态互相混淆起来。<sup>[15]</sup>

对于分期的标准与标志问题,除少数人外,基本上是将两者区分开的,这样做应当说更科学一些。那么,对标准和标志的认识有些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强调的重点内容不同,所以产生了一些分歧,并由这些分歧而引发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更多地体现在具体分期的问题上。

## (二) 近代与现代经济史的分界

关于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分界线,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1、1914年分界说。持这种主张者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便于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情况作对比;第二,中国民族工业因战争期间帝国主义的相对减轻而得到进一步发展,曾一度形成“黄金期”<sup>[16]</sup>。吴杰曾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不能作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分期点,是很显然的。把分期点放在这个年份的人,想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意图。那么,把分期点放在1914年,主要是

为了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样的推断正确,对于这个分期法,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否标志着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经济发展中的质的变化?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否是在1914年开始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吴杰认为,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看,中国民族工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开始有了初步发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较大发展。后者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有一定意义。但是,这只能说是量的变化,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构成中,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占主要地位。如果把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构成中起了质的变化,那就夸大了当时的民族工业。我们必须在肯定它有一定意义的同时,充分认识它的局限性。当时,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侵略,而日、美两个帝国主义正乘机扩大它们的侵略范围,除了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以外,美帝国主义进行了种种投资活动,日帝国主义在中国添设了相当多的工厂。当时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仍然是尖锐的。因此,从经济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构成并没有起质的变化。如果纯粹从经济现象来分析,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经济史分期必须以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为基本标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国国内没有出现这样重大的阶级斗争。若把1914年作为分期点,企图用民族工业的量的发展当作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期的标帜,是不妥当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吴杰认为,目前的科学研究已经判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开始于1914年,而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两年。如果把1914年作为分期点,就好像是根据历史的预见,而不是根据历史的事实。<sup>[17]</sup>

2. 1919年分界说。吴杰持这种说法<sup>[18]</sup>。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强调要理解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的意义:首先,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



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以来,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标志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其次,从五四运动起,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毛泽东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要特别着重研究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快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比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壮大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单从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着眼,是只看到一部分的经济现象,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忽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再次,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世界分为互相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对我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是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上,实质上反映了在经济史中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吴杰认为要确定经济史的分期,必须把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和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统一的客观发展过程,只有正确的分析这个过程,才能正确地确定经济史的分期<sup>[19]</sup>。郭庠林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郭庠林认为吴杰根据的三点理由,只能得出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或者中国革命史的起点,如果硬要说中国现代经济史亦是由此起点的话,那么,显然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建立

的原理完全忽略了。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史实的<sup>[20]</sup>。赵德馨对吴杰也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五四运动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五四运动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在此,赵德馨也不同意吴杰把现代经济史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观点。赵德馨说:吴杰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而“终点”,吴杰没有直接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他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以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sup>[21]</sup>。郭庠林也认为,那种要把解放以后同样划入中国现代经济史范围的说法(吴杰将1919—1959年或以后更长的时间称之为中国现代经济史),是抹煞了两个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将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等同起来的观点,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sup>[22]</sup>。

3. 1927年分界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陈绍闻和郭庠林。陈绍闻以1927年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的理由是:首先,经济史分期的基本标志是经济因素的质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阶级斗争;只有体现这种变革的重大阶级斗争才适于作为经济史分期的起点。五四运动诚然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阶级斗争,可是,它并没有使中国经济发生质的变化,虽然在阶级力

量对比和阶级关系上已经起了变化。其次,1914—1927年期间,我国民族工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压力减轻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一度出现了“黄金期”,但战争结束以后又复衰落。1919年乃至其后的二三年,当民族工业还正处于“黄金期”的时候,在1919年是划不断这个时期的。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再次,中国革命的确在五四运动起了质的变化,中国革命史把“五四”前后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导致中国近代与现代经济史必须在此分期的结论。各门专史可以根据各自发展的过程分期,而不必采用一律的分期标准,统统以某一年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的起点。最后,经济因素是根本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通史是综合史,通史的分期要考虑经济史的分期;但是它不只是考虑经济史的分期,而要综合各种专史的分期。通史和经济史的分期一致最好,如果两者不能一致,也就不能勉强。经济史的分期总是要以经济因素的质变为基本标志的。总而言之,1927年比1919年更适合于作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南昌起义、苏区的建立、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经济制度的出现等等,表明这一年不仅爆发了重大的阶级斗争,建立了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而且经济也开始起质的变化了<sup>[23]</sup>。郭庠林也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应是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以后:其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将其划分成若干不同时期时,是以旧的东西的衰亡为标准,还是以新的东西的产生为标准,抑或以旧的东西看起来还是很强大的时候为标准呢?我认为应以新经济出现时为经济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起点(尽管还是很微弱)。1927年红色根据地建立以后,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了。它的产生,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序幕。因此,1927—1949年是中国经济史的现代部分。其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经济。但并不由于这一点而影响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胜利是中国现代经济史时期。这正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一过渡的经济并不影响其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时期一样(这里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加深时期)。其三,至于

说到 1927 年时新民主主义经济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这一点,也同样不能否认 1927 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史起点这一事实。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亦是逐渐形成的,它并不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一仗后,即已在全国范围内占到统治地位,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经济史上的不同时期,只能是不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为什么 1840 年可以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起点,而 1927 年不可以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呢<sup>[24]</sup>?

对于陈绍闻和郭庠林的 1927 年分界说,茅家琦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经济的出现”能不能作为经济史上新的时期的起点?茅家琦认为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私有制社会中,新的经济成分总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自发的成长起来的。在封建制度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新经济的出现”作为经济史上新的时期的起点,那么,当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我们说,这时是封建主义经济时期,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呢?这样,我们也就无法区分封建主义经济时期和资本主义经济时期。诚如郭庠林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早在明末时,即已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按照“新经济的出现”是经济史上新的时期的起点的说法,明末中国社会经济就应该是资本主义时期了。郭庠林虽然没有正面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却隐隐地承认这个结论,他说:“这(引者按:指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呢?是指这个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时期的转折点,那还不明白吗?可见,以“新经济的出现”作为经济史上新的时期的起点,在理论上是不通的,它无法区别历史时期,而且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事物发展中,从新质要素的产生到事物的质变,两者之间是有一段过程的。新质要素的产生不等于事物已经起了质变。需要经过一段量变过程才会发生质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说 1927 年后中国社会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茅家琦认为是不能的。从 1840 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经济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经济。1927年以后,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在根据地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事实。可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按照郭、陈两人的主张,把1927—1949年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而1927年以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时期,并且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了质的变化”,这样,在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1927—1949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他们看来,1927—1949年的中国社会经济既然是新民主主义经济,那当然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了。可见,郭、陈两人的分期主张,不是一个什么“以旧的东西的灭亡为标准,还是以新的东西的产生为标准,抑或以旧的东西看起来还是很强大的时候为标准”问题,实际是对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错误看法问题<sup>[25]</sup>。赵德馨也认为以1927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是不妥当的。他指出: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整个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sup>[26]</sup>。

郭庠林和陈绍闻对茅家琦的批评不能接受,并撰文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郭庠林指出:根据我国近百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来看,自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由封建的经济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道路。在这里出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买办经济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里,显然不能将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买办经济的产生,说成是由中国封建社会内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至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亦不完全是由中国封建社会内自发成长起来的。1927年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某些地区产生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

社经济,以及排除了或者基本上排除了封建剥削的个体经济。我们认为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在这些地区掌握政权的事实,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它并不是从旧的生产方式内部自发地成长起来的。按照茅家琦的意见,实质上是认为:一定要到新质要素占到统治地位,亦即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后,才是一个新的时期的起点。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变成了的。而这个过程在19世纪50、60年代以前其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到50、60年代以后,才迅速地进行。这不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吗?但是,茅家琦同样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起点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即是量变的开始,而不是质变的时候),而不认为是19世纪的50、60年代之后。何以茅家琦可以从事物的量变——即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占有地位时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起点,而我们倒不能以事物的量变——即新的经济成分的出现作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上新的时期的起点呢?我们认为茅家琦虽然在批评我们,说我们在理论上讲不通,但实质上茅家琦和我们的看法又是一样的。那么,茅家琦的理论不是处于自相矛盾中吗?因此,我们还是认为,以新经济成分的出现,作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上新的时期的起点,是可以的。郭庠林在阐述这一意见时,对以前把1927—1949年说成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这一提法作了一个改动。他说:我至今仍主张将1840—1949年这一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分成1927年前和1927年以后的二个时期。1840—1927年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形成和加深期。1927—1949年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胜利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崩溃时期<sup>[27]</sup>。陈绍闻从四个方面强调自己的观点,来进一步与茅家琦商榷:其一,新生力量初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不占统治地位的。可是,它终将成长、壮大,最后一定战胜旧势力而占统治地位。其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斗争中成长的。它的发生、壮大过程,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过程。它的发生、壮大过程有助于

我们认识解放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说新民主主义经济自 1927 年产生而发展、壮大,并不否认蒋介石统治地区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仍然存在,甚至继续加深。其三,1927 年以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蒋介石统治地区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蒋介石统治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确更加深化了,这真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吗?我们认为不是的。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崩溃的开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崩溃的开始。其四,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但是,它却不能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它没有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什么质的变化。新民主主义经济是 1927 年开始产生的。只是在 1927 年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支配。1919 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起点,1927 年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的起点。我们说 1919 年不能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的起点,丝毫不贬低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只不过说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经济史可以各按本身发展特点来划分历史时期和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的界标罢了。<sup>[28]</sup>

对于郭庠林和陈绍闻的观点,伍挺锋和丁日初进一步提出商榷意见。伍挺锋指出:郭庠林把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误认为是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的开端。这一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尽人皆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 1949 年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如果把这个统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灭亡过程腰斩为近代和现代两半,是不能使人信服和接受的。近代和现代并不像郭庠林所说的,好像是字眼上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完全不同。在中国,前者(近代)乃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

系,后者(现代)乃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经济关系<sup>[29]</sup>。丁日初进一步指出:陈绍闻根据“新的经济制度的出现”就作出中国社会经济起了“质的变化”的论断,这是把萌芽的东西当作“支配的东西”,显然是不妥当的。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某些地区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这是事实。可是,革命根据地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并没有占支配地位,因而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那么,把1927年以后作为我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是不妥当的<sup>[30]</sup>。

4. 1949年分界说。持此说的学者相对多一些,正如伍挺锋所说:“现在已经有一点是被大多数人所同意的了,即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指由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这一百多年期间的中国国民经济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sup>[31]</sup>赵德馨比较显明地提出这一观点,他说:“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sup>[32]</sup>50年代编著的一些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材或专著,大部分也是以1840—1949年为时间段的。比如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吴杰撰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以及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都是采用这一时间段进行编撰。系统阐述1949年分界说的是丁日初,在论述中他还特别提出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他撰文指出: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



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sup>[33]</sup>。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使我国经济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同时,“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经在1949年开始了”<sup>[34]</sup>。这就是说,从1949年10月起,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时期。因此,1949年10月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时期的终点和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的起点。现阶段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以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具体地说,主要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由于1927年以后在革命根据地就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因而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以后的革命根据地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以它们作为自己的起点。为什么中国现代经济史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起点不相一致呢?丁日初认为,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以外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使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以后才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一产生立即在社会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因此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生的时期是一致的,如果这些国家的现代经济史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它的起点同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起点自然是一致的。可是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武装斗争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前就有了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逐渐地扩大,最后才解放

了全中国。在革命根据地中,早就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这就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取得支配地位以前,是经过了一段发展过程的。因此,如果我国现代经济史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起点,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就必须以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产生为起点。接着丁日初进一步指出:陈绍闻和郭庠林主张把1927年以后划作现代经济史,这样就会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割裂开来,把它分属于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这是不妥当的。他们又主张,把1949年以后称作社会主义经济史,这又会造成把192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从它当中割裂开去,这同样是不妥当的。因此,丁日初认为应当把1927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的起点,而把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sup>[35]</sup>。

### (三) 几种具体的分期法

无论是把中国近代与现代经济史的分界线放在哪一个年份,很多学者还对近现代经济史作了具体的阶段划分,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划分法。

1、郭庠林认为,划分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不同阶段,必须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彻底胜利的全部过程。第二,殖民地经济(大陆)的形成和崩溃过程。第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过程。根据第一个因素,1927年红色政权的成立,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期。1927年起,国民党发动了反人民内战,从此,新民主主义经济就一直在战斗中成长发展着,最后终于彻底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根据第二个因素,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以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一大块地区上出现了殖民地经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国民党的不断卖国,殖民地经济逐步扩大。直到1945年才结束这样一种局面。从第三个因素来说,自1927年红色政权建立以后,即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崩溃的开始。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大侵略,殖民地经济的扩大,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在加速。

1945年开始,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总崩溃开始。直到1949年,就彻底地崩溃了。郭庠林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要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27—1931年,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崩溃期;1931—1945年,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殖民地经济(大陆)的形成、加深与崩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加速崩溃期;1945—1949年,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全面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总崩溃时期<sup>[36]</sup>。后来,郭庠林在分期上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动,三个阶段分别划分为:1927—1930;1931—1945;1945—1949<sup>[37]</sup>。

2、赵德馨把中国近代经济史划分为三大阶段九个时期。第一大阶段从鸦片战争(1840)到甲午战争(1895),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两个时期:1840—1864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0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与鸦片战争以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与60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1864—1894年为第二个时期,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个时期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广大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第二大阶段从甲午战争结束(1895)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三个时期:1895—1911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主要命脉的时期。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1912—1919年为第二个时期,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发展的时期。1919—1927

年为第三个时期,这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中国在这个时期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新民主主义道路。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第三大阶段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崩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四个时期:1927—1931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1931—1937年为第二个时期,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1937—1945年为第三个时期,这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1945—1949年为第四个时期,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总崩溃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准备了条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我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sup>[38]</sup>对于赵德馨的上述观点,伍挺锋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指出:赵德馨在分阶段时,把1895年以后的经济变化和1927年以后的经济变化等量齐观,这是低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出现的意义的结果。诚然,1864和1895这两个年代的前后,经济关系是起了某些较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变化总跳不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范畴,这是

不能与 1927 年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平列看待的<sup>[39]</sup>。茅家琦对赵德馨的分期法也提出了商榷的意见,这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3、茅家琦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应分为四大阶段九个时期。第一大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形成阶段(1840—1864 年)。其中分为 1840—1851 年和 1851—1864 年两个时期。第二大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完全形成阶段(1864—1895 年)。这一大阶段可以作为一个时期看待,不另分时期。第三大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一步加深阶段(1895—1927 年)。其中分为 1895—1901 年和 1901—1927 年两个时期。第四大阶段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统治阶段(1927—1949 年)。其中分为 1927—1931 年,1931—1937 年,1937—1945 年,1945—1949 年四个时期。茅家琦的分期法与赵德馨的分期法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茅家琦对与赵德馨意见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商榷和说明。商榷和说明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关于 1864 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能不能作为划分大段的标志。赵德馨不主张在 1864 年作为划分大段的标志,从社会经济来看,1864 年以前和以后是有重大差别的,应当在此划一大段。第二个是关于 1901 年、1911 年和 1919 年能不能作为划分时期的界标。茅家琦主张以 1901 年为界标。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夺取侵略基地、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急转直下地向殖民地经济沦落。义和团运动制止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却挽救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仍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滑下去。因此,以 1901 年为界标,划分为两个时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11 年辛亥革命能不能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呢?茅家琦认为是不妥当的。从政治上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并无显著的变化。所以,不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辛亥革命都不能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1919 年五四运动能不能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呢?从社会经济的特点来看,五四运动以前及以后,也是没有

显著的差别的。在北洋军阀政府整个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仍然是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因此,没有必要将 1919 年前后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三个是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于何时?赵德馨认为 1927—1931 年就已经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时期”,茅家琦认为不妥。1927 年蒋介石反动集团掌握政权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日益上升。封建剥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优势。蒋介石反动集团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换取美帝国主义的军火和物资来维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统治。集中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 22 年中疯狂地进行掠夺,集中了价值 100—200 亿美元的巨大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高峰。可见,在 1927 年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仍然是处在不断加深的过程中。1927 年不能表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已经走向崩溃时期。茅家琦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走向崩溃灭亡的转折点不是 1927 年,而是 1947 年,而不是 1927 年<sup>[40]</sup>。对于茅家琦的分期法,伍挺锋提出了商榷的意见,因与对赵德馨的商榷意见相同,这里从略。

4、陈绍闻 1960 年在《略论经济史的分期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一文中曾经同意“以 1927 年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1961 年又在《也谈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提出最好不用近代或现代经济史这些名词,主张把中国近代经济史正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时期,中国现代经济史正名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进而提出了他的两大时期五大阶段分期法。第一大时期(1840—1927 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加深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我国的门户,取得许多特权,迫使封建统治者屈服依赖他们,先进行商品侵略,继之以资本侵略,由列强竞争而英、美、日争霸;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仅无法充分发展,甚至难以生存;农业和家庭手工

业牢固结合的自然经济最初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顽强地进行对抗,终于逐步分解,农村经济濒于破产。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894年)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以商品侵略为主,后期开始了资本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第二阶段(1895—1927年)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了更多的特权,以便进行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并且已转变为以资本侵略为主,帝国主义迫使封建统治者完全屈服,由各帝国主义争夺变为英、美、日争霸;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后趋于衰落;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地,自然经济的分解扩大和加深,农村经济将近破产。第二大时期(1927—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发展、胜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崩溃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个政权、两个地区与两种经济的对立斗争,革命的一面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最后取得胜利。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1937年)的主要特点是革命政权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革命的一面在和反革命的一面进行斗争中成长、壮大。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占我东北,使之成为殖民地,并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妄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蒋介石统治地区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衰落,农村经济破产。第二阶段(1937—1945年)的主要特点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抗日战争,不断揭露蒋介石政府投降妥协、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坚持八年抗战,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建立了拥有一亿多人口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最后在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的协同作战情况下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对支持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伪占领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掠夺,在蒋介石统治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遭受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摧残。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千百万人贫穷饥饿,流离失所。第三阶段

(1946—1949年)的主要特点是蒋介石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的反革命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战,由弱转强,从防卫转为反攻,终于击败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蒋介石军队,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取得胜利。美帝国主义妄想通过支持蒋介石政府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倾销大量美货,掠夺我国重要资源,控制工业交通等事业;蒋介石政府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疯狂进行掠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不断高涨,生产停顿,人民无以为生,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高涨。美蒋统治被推翻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束。<sup>[41]</sup>

5、伍挺锋认为应当以1927年为分界线,把中国近代经济史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大阶段(1840—192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成和深化的阶段。第一个时期(1840—1864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时期。自1840年以后,原先是完整的封建性的中国,便一步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了。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封建经济开始遭受破坏,但这个过程是极度缓慢的,而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通商口岸出现了买卖商人。第二个时期(1864—1895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本形成的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在一起;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入侵,大量地倾销其商品和掠夺原料,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商品推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地;自然经济迅速解体;由于这些原因,促生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随之出现。第三个时期(1895—192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加深化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开始了大量向中国输入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它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变成了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特别是纺织和面粉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殖民化;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有了



显著的壮大,革命随之由旧民主主义阶段转向新民主主义阶段。第二大阶段(1927—1949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崩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第一个时期(1927—1931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走上崩溃的时期。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叛宣告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创立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基本上排除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此后,它在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与此相对,也产生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但它的出现,正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经腐朽不堪,临近末日了。第二个时期(1931—194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腐朽至极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壮大的时期。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的殖民地经济,但它在194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而消失;国民党统治区内,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密切结合的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迅速扩大,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更为殖民地化,经济危机极端严重;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力量急遽壮大,势必将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地位。第三个时期(1945—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总崩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全面胜利的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四大家族的买办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后,达到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而终归覆灭;新民主主义经济日益繁荣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和全国的解放而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sup>[42]</sup>。

##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一)甲午战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完全形成  
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学者们就对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重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其一,从1840年至1850年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从1864年至189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形成的时期”<sup>[43]</sup>。其二,从1840年至1864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时期。从1864年至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从1901年至1919年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时期<sup>[44]</sup>。其三,从1840年至1864年,“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是从整个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从1864年至1894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时期。从1895年至1901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时期。从1901年至1914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加深”时期<sup>[45]</sup>。其四,1840年至1864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形成”。1864年至1894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巩固和加深”。1894年至1905年,“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形成”。1905年至1919年,“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继续加深”<sup>[46]</sup>。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例如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定在1873年至1905年等。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以后的若干年里,在一些有关论文或专著里面,一般地都采用了上述的第一和第二两种说法。例如丁名楠等人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就将1864年至1895年划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形成时期;其他一些专著或大学教材,则将1864年至1901年划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sup>[47]</sup>。

1956年,顾林提出了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完全形成的学术观点。他撰文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经过三十年的过渡期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就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瓜分世界的斗争;而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帝国主义在远东进行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开端。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并订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其第六款第四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意各项

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承认外国在中国设厂投资为合法。这正表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转化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后,紧接着在中国便出现了割地狂潮、划定“势力范围”、投资竞争——严重的被瓜分的危机。虽然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却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中完全形成。为什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了呢?主要由如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一,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现在专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来说,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也正是这个方面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个特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侵略者开埠通商、协定关税、扩大了外国商品的输入数量使侵略势力伸入到物产最富饶的长江下流地区,而开其端绪;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在中国内地扩大商埠、控制中国海关、掌握中国航运,而使之逐渐形成。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即完全为帝国主义所操纵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一个主要项目,是通过投资完全支配了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乘清政府为了交付对日赔款向其他外国举债的时机,展开了俄、法、英、德诸国间激烈的投资竞争。最后成立了三笔贷款,即俄法洋款、英德洋款、和续借英德洋款。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另一个主要项目,就是通过投资垄断了中国的重要交通事业和夺取了矿山的开采权。中国航运事业在甲午战前随着开埠通商和内河航行权的丧失而为资本主义侵略者所支配。而甲午战后,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说明帝国主义已经垄断了中国航运事业。甲午战后在交通事业方面除航运外,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另一个新目标就是对铁路投资,开始公开掠夺中国铁路权益,开展了对中国铁路的投资竞争。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再一

个主要项目,就是扩大进行了工业投资,以操纵中国的国民经济。甲午战前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便利其进行不等价交换的贸易,已经非法设立了不少工厂,但当时这些投资对进出口贸易来说还是从属品。甲午战争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帝国主义迅速地改组和扩大了一些已经开设的重要工厂,使之逐渐变成垄断性的大企业。其二,与买办、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封建剥削制度占据优势。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sup>[48]</sup>。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又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跟随着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掠夺而逐步完成的。但到甲午战争以后至20世纪初期,这个特点则表现得更为显著。原来列强侵入中国之后,为了达到它们的侵略目的,即注意到一方面培植其买办势力,另方面还要利用封建势力,并且不断加强这两者的联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这种企图基本上已经完成。在沿海一带通商口岸,买办阶级已经形成,而且买办阶级政治上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已经掌握了清政府相当的权力;国内的封建势力也已经基本上低头屈服,而且中国封建势力的最集中的代表者清王朝已经同意在中国广大地区中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而开放。至此,侵略者在中国不但已经制造成一个吸取中国人民血汗的有力工具——买办阶级,而且还掌握一个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封建统治者。甲午战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深化了。按照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要求,特别是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广大农村经济变成它们的附属要求,买办阶级便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向广大农村进攻。他们凭借帝国主义所掠夺的政治特权,促进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与地主阶级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也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因而,在这一时期,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于是,中国广大农村中农产品当作原料而

被帝国主义掠夺走了。再一方面,就是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已经融合起来。首先,是帝国主义列强经济利益与清政府的经济利益相互结合。清政府的收入要看帝国主义的赏赐,而帝国主义又靠着清政府的存在及其对人民的压榨,而获取利益。其次,是各帝国主义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发展其买办势力,特别是以经济力量加强各地方的买办地主的封建统治政权,使各地方的封建势力的经济利益也与它们结合起来。再次,是地主阶级与买办经济的互相结合,这种结合是很明显的。甲午战前很多买办阶级代表人物一方面是大买办,另一方面也是大封建地主,如曾、左、李和盛宣怀都是如此。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个特征更出现在中国的更广大的地区中。往往一个地主也是一个买办:一方面表现为地主身份,表现为土地的垄断者,但另一方面又时常表现为买办的身份,表现为市场的垄断者。其三,民族资本的软弱性与依赖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再一个特点,就是“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sup>[49]</sup>。这个特点也是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完全形成的。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这样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就具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特点——软弱性和依赖性。先从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来说,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才有初步的发展,由于这时帝国主义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这就使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碰到帝国主义的更大的阻碍。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要表现出发展不足的情况。中国民族工业只能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中发展的。这种种情况,都在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自始就很软弱。再从中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来说,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软弱,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压迫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民族资本主义中一大部分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关系,首先表现在有些中国的资本家同时具有封建地主官僚的身份,一方面他们从事于企业活动,一方面也从事于封建剥削。这是因为当时民族资本家多是由地主、官僚转化而来的关系。其次,还表现为民族工业部门中存在着企业管理上的很显著的封建因素,在那时资本家不乞灵于旧的封建势力,往往就不能维持其生产。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首先表现为有些中国的资本家,同时具有买办的身份。这是因为买办阶级出现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的关系。另外还表现为往往要依靠外国银行贷款或买办势力,以维持生产。在那时资本家不与帝国主义和买办保持联系,其发展也是非常困难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这种依赖性,在甲午战后中国资产阶级出现时,就已经具备了。其四,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sup>[50]</sup>。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是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确定的。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争夺着在中国投资,争夺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筑路开矿,这就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几个主要象征明显起来。第一是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明显了。如20世纪初英、德、俄、法四国在华资本总额占各帝国主义总额86%,英、德和俄、法各占其半。而美、日两国远远赶不上这四个国家。第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上不平衡的情况也明显了。帝国主义资本主要在几个通商口岸发展起来,而民族资本也就先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而广大的内地仍旧保持着旧式的生产,几乎没有新式工业。这也就使中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不平衡。第三是在中国买办性的金融和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民族工业,而且外国在华资本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民族资本。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由于中国经济形态中已经具备了上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所以我们才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已经完全形成,自此中国才完全变成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真正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sup>[51]</sup>。

## （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

胡思庸提出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是由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直接引发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 1954—56 年，史学界曾进行一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规律及其阶段性等等许多问题，都作了有益的探讨。在 1960—61 年，学术界又开展一次关于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这两次讨论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仍有些重要问题，似乎存在着某种混乱和模糊的地方，有待澄清和解决。例如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问题，就是如此”<sup>[52]</sup>。胡思庸提出商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它的形成阶段的问题，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的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的问题。胡思庸认为以往的说法都能找出自己的一些理由，但似乎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欠。比如金冲及的说法，虽然也承认 1840—1864 年是“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却断言那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从逻辑上看，这是自相矛盾，从实际涵义上看，这是倾向于否认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孙守任的说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形成了，以后又巩固加深了；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却又形成一次，又加深一次。同一社会形态竟然形成两次，似乎于理难通。关于胡绳的说法，虽然比较合理一些，但是它们都没有例外地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的上限，划在 1864 年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不管持这些说法的人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会自然地引起下面的问题：既然已承认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而又把 1864 年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划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的上限，那么，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前上溯到鸦片战争（即 1840—

1864年)的这一段历史,难道还没有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对于该二十多年的社会历史应如何理解?难道是一个“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萌芽状态”吗?当然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形成,和通常的社会形态不同。从它的前身看,它没有一个准备的阶段或萌芽的阶段。它的前身是封建社会,但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就被突然扭转了,封建主义的历史发展线索是无论如何在这里开始被永远斩断了,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余地了。必须注意,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斩断”的涵义,就是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外国资本主义暴力侵入的结果,而不是从其前身——封建社会母体上面准备或萌芽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从它开始侵入的时候起,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之主要方面,就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中国社会也就从这时候起,在本质上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这是一个爆发性的、根本性的质变,决不是什么量变。在近百年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期间,有人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来说,“是量变的开始,而不是质变的时候”;而到1864年以后,中国社会才发生了质的变化<sup>[53]</sup>。又有人说,“1840年不是划分我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界标”。只是为了“某种经济的发展过程包含有它的萌芽、发展与衰亡等各个阶段,因而以研究这个发展过程为任务的某种经济史,也必须包括上述各个阶段。中国近代经济史是要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整个过程的。……从而1840年可以作为研究上述过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起点”<sup>[54]</sup>。显然,在他看来,1840年以后的若干年间(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完全形成”以前),中国还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只是因为1840年以后开始有了这种经济因素的发生或萌芽,我们方才把它列入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上面这些说法,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一方面笼统地承认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或中国近



代经济史)的起点,一方面却又否认鸦片战争后数十年间的历史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只能导致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无论距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还有几步,但1840年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开始了它的形成过程。有人虽然也承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形成过程,但是他们强调“这个过程在19世纪50—60年代以前其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到50—60年代以后,才迅速地进行”<sup>[55]</sup>。从而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中国社会量变的开始,而不是质变。从而否认那一段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且不说过程的缓慢是否就等于事物只是量变不是质变;就单从鸦片战后十几年间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看,其过程决不是“极其缓慢的”。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呢?它无非是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以至于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迅速、非常直截了当:《南京条约》以后中国随即就丧失了独立地位。即令在经济上,表现得也是十分猛烈和显著的。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在五口通商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首先开始解体,开始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漩涡,这些例证已经用不着列举。事实上,连一些内地的省份,也相当快地、程度不同地被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买办商人所撒下的剥削网连接起来。我们只有充分估计了鸦片战争的意义,才能够真正理解在此以后不久,为什么爆发了那样一次伟大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正是鸦片战争影响深刻之一种尺度(当然,这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中所酝酿已久的土地集中的因素)。而在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期间,有人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说成是“这次规模浩大的战争和白莲教起义可说是出于同样的经济原因”<sup>[56]</sup>。这种结论恰恰忽视了鸦片战后中国社会性质的严重变化,因而很难令人同意。由此可见,只有充分估计了鸦片战争的重要意义,一部中国近代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矛盾斗争的历史——才可以讲得通,才会穷本溯源地找到根据。鸦

片战争不应该单是笼统地理解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且应当明确地肯定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形成的开端。不单是简单地承认它是这个形成的开端,而且应当明确肯定自此以后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这里一点也不能含糊。过去许多人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上限划在1864年,尽管在主观上,有人并没有否认鸦片战后的若干年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至少在理论上,恐怕有欠严密。不严密就有可能引起误解和混乱。这种形成时期的上限只能有一个——1840年。

第二个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完全形成”问题,就是“形成时期”的下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分期和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讨论期间,曾出现很多划分法,例如1894年、1895年、1901年、1905年等等。几年来,对此问题理解不同,划分的标准不同,各行其是。但是,终归应该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什么是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的统一标准呢?当然,像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民族资本主义的因素、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控制等等,都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根据,都是正确的标志。但是,自然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因素、帝国主义控制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度上也越来越深化;而随着个人对其程度深浅的取舍不同,也就会出现标准和划法的分歧。那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的统一理解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综合出六个特点:1、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里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主权是被推翻

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以上六个特点,是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全面综合。具备了上述六点,当然就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已经完全形成。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完全形成的下限,只有划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最为适宜。主张划在1895年的人(在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讨论中,这种主张占着绝对优势),其理由不外乎: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对华的侵略方式,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转入帝国主义时期,从而大大加深了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另外,在60、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已经产生,而经过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以后,由于外国资本输出的刺激,由于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等等。诚然,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确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关键。但是,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疯狂的领土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是在《马关条约》以后《辛丑条约》以前的事情。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只是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的侵略特点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特点的一种契机,一种起点。而从契机到现实,从因素到事实的暴露,则是1895—1901年的事情。我们划定事物发展过程的“形成阶段”的下限,当然不应以因素或契机为界标,而应以现实的暴露为界标。质言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形势是在1895年以后而不是以前形成的,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不应该断在1895年,而应当断在1901

年。第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例如资本输出也是一样,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只是一个方向性的起点,不等于事情的实现。帝国主义通过政治贷款和企业投资而“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是在甲午战后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才形成的。第三,从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说,也是通过1901年《辛丑条约》前后才正式实现的。虽然早从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一打一拉的手段已经使清政府统治者有了很大程度的屈服和顺从;虽然早从60年代以来就生长起了一批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洋务派军阀官僚,但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还掌握在“顽固派”手里。直至《辛丑条约》以前,帝国主义还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清朝政府。《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政府的完全投降。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上谕,从此以后被当作清朝政府的外交总路线了。到了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不仅可以呼来挥去地操纵清政府,而且也更进一步地操纵了地方的买办军阀和官僚。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敢于公然和清政府对抗,进行“东南自保”的分裂活动,完全是帝国主义撑腰支持的结果。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它是以后军阀割据的信号。第四,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说,截至甲午战争为止,固然也产生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则是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的。尤其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来说,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这一点,甲午战争时期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是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标志的,从此以后,才能够说它“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尝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又取而代之。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单纯的农民起义的时代便结束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以上是从小数显著的方面,和毛泽东提出的六个特点对照之后的结论。至于六个特点当中的其他几点,如自然经济的变化情况、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的情况、人民生活贫困和不自由的情况等,从1901年

前后的中国社会里,都可以得到说明。至于其中的第三条:“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乃是就政权的性质而言的,我们似乎不能机械地理解。清朝皇帝在 1901 年虽然还没有推翻,但是代之而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封建地主的代理人,它们之间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封建官僚政府早就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来压迫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在 1900 年的战争失败以后就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这种情况,在 1912 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历届军阀政府之下,也没有发生任何基本变化”<sup>[57]</sup>。综合上述,如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下限划在 1895 年,则有许多地方与“六个特点”比较起来不能符合,而划在 1901 年,则基本符合。至于划在 1894 年,更是太早了些,划在 1905 年,又嫌稍晚了些,失去了作为界标的准确性。<sup>[58]</sup>

注 释:

[1] 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 年第 4 期。

[2]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 年第 7 期。

[3] 茅家琦:《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 年第 8 期。

[4] 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 年 2 月 6 日。

[5] 陈绍闻这里用的“基本标志”一词改为“基本标准”更准确些。

[6] 《资本论》第 1 卷第 195 页,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7] 陈绍闻:《略论经济史的分期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复旦月刊》1960 年第 2 期。

[8] 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 年第 4 期。

[9]茅家琦:《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8期。

[10]茅家琦:《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8期。

[11]郭庠林在这里所说的“标志”与“标准”相同,他没有将两者作出严格的区分。

[12]郭庠林:《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意见》,《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

[13]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2月6日。

[1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6页。

[15]丁日初:《关于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

[16]参见陈绍闻:《略论经济史的分期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17]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7期。

[18]吴杰在编著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曾将1840-1949这一期间称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他又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7期)一文中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7期。

[20]郭庠林:《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几个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21]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

[22]郭庠林:《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几个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23]陈绍闻:《略论经济史的分期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24]郭庠林:《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几个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

2期。

[25]茅家琦:《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8期。

[26]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

[27]郭庠林:《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意见》,《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

[28]陈绍闻:《也谈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1期。

[29]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2月6日。

[30]丁日初:《关于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

[31]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2月6日。

[32]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

[33]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34]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的胜利》上册,第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版。

[35]丁日初:《关于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

[36]郭庠林:《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几个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37]郭庠林:《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意见》,《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

[38]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

[39]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2月6日。

[40]茅家琦:《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8期。

[41] 陈绍闻:《也谈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1期。

[42] 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2月6日。

[43]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44] 《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天津日报》1956年7月12日“学术”第1期。

[45]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46]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47] 参见胡思庸:《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第1期。

[48]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4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4、625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

[51] 顾林:《试谈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完全形成》,《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

[52] 胡思庸:《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53] 郭庠林:《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意见》,《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

[54] 丁日初:《关于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

[55] 郭庠林:《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意见》,《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

[56]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57]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58] 胡思庸:《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 第五章 | 近代史分期论辩评述

### 一、共同的理论方法与着眼点的差异

5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学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方法,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指导,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对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他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时,虽然着眼点不同,进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

参加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之所以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成为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思想武器,使中国人民能够洞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结果,是这种理论在中国实践成功的标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个胜利给全体中国人的震撼是巨大的,给全体中国人

的鼓舞是巨大的。这是中国人包括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能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实基础,也是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能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实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已有了相当的学术成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能够受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因。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促使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产生的,也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巨大作用,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品格与战斗风格。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奠基作。到了30年代至4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特别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在这个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得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此后,中国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就是当时最突出的标志。这对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发展的影响很大。

新中国建立后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与学术发展的结果,是百年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可以说,是几千年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学习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基本上成了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自觉,不说全部至少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在主观上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从全局上说,是没有争论了。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础工程。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历史问题,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

展<sup>[1]</sup>。新中国建立初年,就有史学工作者撰文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史学工作者在建国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情况。如郑鹤声于1951年就撰文指出:“先进的社会理论,先进的观念,起着最伟大的动员的组织的作用,而反动的观念,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先进的观念愈加亲近的和深刻的反映自己的时代要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他们便能在历史运动中起更加重大的作用。马恩列斯不但为西方国家革命的伟大导师,也是东方国家革命的伟大导师。……因为马列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一切劳动人民自求解放的思想武器和伟大旗帜,是各国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对于他们的革命理论,应当深切研究而加以实践的。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实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除阅读毛主席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外,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两书,尤为重要。前者系汇录马、恩两位人类大思想家关于中国的专门论文及其他著作中关涉到古代东方与中国的片断文字而成,后者系汇录列宁斯大林从1900年到1927年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报告信札而成,都是便于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而有助于中国近代史上问题的解释的。”接着郑鹤声还举例说明用唯物史观指导而撰写的几部著作,“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华岗先生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等,理论精辟允当,足以启发的地方很多,实为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先驱,大有助于吾人研究这个阶段历史理论的指导,学者必须加以参考”<sup>[2]</sup>。华岗的《五四运动史》的“引言”(作于1950年8月)中曾高度赞誉过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及一切劳动人民自救解放的思想武器和伟大旗帜,是各国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没有忽视过东方,他们对于中国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

运动的深切关怀,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列宁对于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深刻分析,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特点以及革命路线的英明指示,直到现在还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而它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密地掌握社会发展规律”<sup>[3]</sup>。这些论述反映了建国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史学工作者在指导思想上有变化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开始接受唯物史观。华岗在1952年又撰文指出:“过去的史学大都为腐朽的反动阶级服务,为了适应它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要求,根本的宇宙观便是唯心论,运用到历史科学内便是唯心史观。唯心史观在反动统治时代是占‘正统地位’的,以为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精神,甚至是神,一切史学的研究、著作教学都是根据了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他接着说,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历史学者感到唯心史观的错误,接受了符合客观事实和真正的历史,愿意重新学习,除坚持错误的反对派外,大多数人都进行着自我改造,两年来这个趋势已十分显著”<sup>[4]</sup>。这些学者对唯物史观的信仰是真诚的,这既表现在他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往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学术观点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批评他人的学术观点时也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的。

尚钺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中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并表示“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完全正确”。这本身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倾向。下面我们再举例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是怎样运用经典理论来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服务的。

首先,正面引用经典理论来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服务。孙守任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上主张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为此他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论述。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sup>[5]</sup>。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近代的中国

曾存在过三种不同的主要矛盾的形式及三种不同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的复杂关系。毛泽东说：“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sup>[6]</sup>。孙守任以上述毛泽东的论述为理论根据，进而为自己提出的观点服务<sup>[7]</sup>。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应当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中的具体特点。他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经济中去探求”；“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规律，社会发展底规律”<sup>[8]</sup>。根据斯大林的论述，金冲及认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适应或相互矛盾），决定着政治生活、社会意识等相应的变化。因此，解决历史分期的标准，首先必须从生产方式中、社会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去考察<sup>[9]</sup>。戴逸主张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为此他找到了几点理由，在论述这些理由的时候，他是以经典理论为根据的。如戴逸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动力，接着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更，是不依人们

的意志为转移而自发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期为止。而当新生产力已经成熟时,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即只有经过新阶级自觉活动,只有经过新阶级强力行动,只有经过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sup>[10]</sup>历史上先进阶级依靠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这一客观法则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戴逸认为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生是基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和剥削。接着他引用列宁的话说:“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没有权的、被压迫的、劳动的大众反对特权阶级、压迫者和寄生者的斗争。”<sup>[11]</sup>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剥削加紧,也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地位愈趋低下、生活愈趋恶化,这是导致阶级斗争高涨和爆发的一个基本条件。阶级斗争不是别的,它是劳动人民争取劳动权利和生存权利的行动,仔细地考察阶级斗争就能发现每一时期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戴逸认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都和阶级斗争相关联,发生在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内的斗争,其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接着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sup>[12]</sup>戴逸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是最能够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够揭露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够显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最能够反映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为此他引用了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论。”<sup>[13]</sup>戴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是要证明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观点是正确的,是要说明列宁所指出的这条基本线索正是应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的<sup>[14]</sup>。

其次,正面引用经典理论来为反驳他人的学术观点服务。例如黄一良在反驳孙守任的观点时就是这样。孙守任利用主要矛盾

方面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黄一良认为孙守任在运用经典理论时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认为这是孙守任对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孤立片面静止地理解造成的。进而黄一良又用毛泽东的理论进行了反驳。他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互相斗争并互相转化着的,“……矛盾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sup>[15]</sup>。因此,当我们具体考察一个矛盾的任何一方的时候,必须同时与其他一方联系起来考察,不能抛弃了这一方而孤立地去看另一方。可是孙守任在考虑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时候,却首先着眼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这就抹煞了作为中国历史的创造者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sup>[16]</sup>。金冲及在批驳孙守任的观点时说:孙守任指出了“分期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主要矛盾性质的某些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阶级斗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如何来分析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经济中去探求”<sup>[17]</sup>。孙守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模糊的、混乱的。然后金冲及根据斯大林的经典理论对孙守任没有到社会经济中去探索而产生的模糊和混乱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地剖析<sup>[18]</sup>。戴逸对孙守任的“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是一个特殊过渡性的社会,因而在考察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阶级斗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而不能只拿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作标准来考察”的论点进行反驳时,运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

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等等特殊的情形”<sup>[19]</sup>。这里是用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的论述来反驳孙守任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的观点。由此戴逸认为,孙守任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某些变化的论点还值得研究。另外,戴逸在反驳孙守任“把近代史分成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大阶段”的观点时,认为孙守任直接用外国侵略势力性质的变化(即外国侵略势力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性质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性质)来解释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不能不说带有外因论的色彩。接着就引用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列宁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底发展与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sup>[20]</sup>。毛泽东说:“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sup>[21]</sup>戴逸引用这两段论述,是要说明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进而指出孙守任把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当作社会性质的变化的论点是不恰当的<sup>[22]</sup>。我们再来看章开沅对戴逸的批评也是运用经典理论作武器的。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到,章开沅认为:戴逸根本否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质



的变化,根本否认在近百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着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逐渐死亡这一渐变过程。在戴逸看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便立刻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人们就没有必要来深入探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诸阶段间的质的差异似的。章开沅认为戴逸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戴逸过于狭隘地理解了质的规定性,只承认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过程的根本性质的规定性,只承认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过程的根本性质的规定性,而不承认这一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某些质的规定性。在这里,章开沅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进行了辩驳,他引用了如下论述:“唯物辩证法的经典作家还指出了在某一社会的范围内一种质态过渡到另一种质态的飞跃式的转化。例如,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化,就是在同一资本主义形态的范围内由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飞跃”<sup>[23]</sup>。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范围内指出其发展各阶段间的某些质的差别是有必要的。第二,戴逸抽象地理解了质变和量变,因此只承认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而不承认其中有着新质要素的积累和旧质要素的死亡(不是最后死亡),这样就把质变和量变截然分开了。在这里章开沅又引用了毛泽东的论述:“自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sup>[24]</sup>他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正好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通过渐进的量的积累的途径来进行的。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因素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既表现为量变,也体现了质变。章开沅指出:显然,戴逸的结论与历史是格格不入的<sup>[25]</sup>。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 50 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们都是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不管是自己的立论还是对他人的驳论,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得出来的,所以不怀疑自己的结论。这是当时学者们共同理论方法的充分体现。为什么运用共同的理论方法会

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呢？这是由于针对不同的问题，经典理论的论述各有侧重，学者对经典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掺和了各自不同的主观意识，进而导致着眼点差异。经典理论论述同一个问题时，由于角度、场合、目的、针对性不同，所以表述的中心思想不尽相同，而学者们往往把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合的经典理论只视其为一般的结论。例如，社会发展的历史，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有着不同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sup>[26]</sup>斯大林则有着另一种说法：“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sup>[27]</sup>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指阶级社会而言）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和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社会是生产方式发展史并不矛盾，两者主要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再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脉络，毛泽东有过多种表述方式：“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28]</sup>；“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sup>[29]</sup>；“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sup>[30]</sup>。毛泽东阐释上述思想的时间、场合、目的、针对性是不同的。苏双碧曾对这一现象作过分析：毛泽东的有关表述是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作为编写历史的线索，自然还必须有的补充和归纳<sup>[31]</sup>。正是这样，如果没有别的补充和归纳，没有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仅仅以经典理论的某种表述进行解释，这样的研究工作显然缺乏深刻的学术意义。苏双碧在文章中说，究竟应抓住怎样一个线索来贯串中国近代的历史，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sup>[32]</sup>这种主要矛盾

的斗争、发展和变化,就形成了矛盾而又统一着的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33]</sup>。要把这两个过程做最基本的分析,大体是这样: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独立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并竭力保存其封建的基础的过程。一方面,中国人民大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中国削弱了封建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破坏封建主义的作用,封建主义为维护统治有抵抗侵略的作用,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主导的规定的经常是前一方面,它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并停滞在落后的半封建社会,而后一方面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方面。由于人民大众反抗力量的增长,由于中外反革命力量的分裂削弱,近代史上出现了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潮。在革命高潮中,中国的主要地区或主要部分的社会矛盾曾经有了转化,人民大众曾经占了主导地位;但当革命运动内部犯了错误,敌人加强了勾结,增强了力量,往往又使前一方面恢复了主导地位。这种矛盾过程则以后一方面取得了主导地位的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基本告终。中国近代历史分期就不能不从整个矛盾而又统一的过程的发展去考察,尤其着重过程的某种性质上的变化<sup>[34]</sup>。黄一良在思考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黄一良在论述中也引用了毛泽东“两个过程”的理论,但是显然与孙守任在理解的侧重方面是不同的。黄一良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又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

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sup>[35]</sup>因此,我们的任务正是要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各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是怎样进行英勇的斗争,经历了各个阶段,而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进而向着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前进。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我们也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的发展作为主要线索进行考虑<sup>[36]</sup>。孙守任与黄一良都引用了毛泽东“两个过程”的理论,但孙守任把“两个过程”的理论与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在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而黄一良则把“两个过程”的理论与“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的理论结合起来,就得出了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的发展作为主要线索来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结论。可见历史学家主观上如何理解经典理论对他们认识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结论分析问题,固然重要,这样做也可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不但要注意其一般的结论,更要注意应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说,要真正掌握经典理论的精髓,就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经典理论的思想本质,以这样的思想本质为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更加深入,更加科学,更加具有创造性。

##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及其学术局限

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然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它打破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促进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教材编写的实践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是重大的。当然,仅仅靠几年的讨论,要想解决更多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这次论辩的学术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一)理论意义。通过这次论辩,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这是最早由胡绳提出的,也是论辩的各种观点中,能为多数人接受并较为通行的一种理论。胡绳指出:如果用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那么,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是: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中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五年,开始了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sup>[37]</sup>。“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三个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前后十四年,震惊华夏,建都天京,占据了神州大地的半壁江山,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第二次革命高涨的五六年时间,既有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又有以农民为主自发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前者为中国实施改造封建专制体制的开端,后者则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六七年时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最终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三次革命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们却是中国近代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迈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三次革命高潮的历史意义绝不能低估。2、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现实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凭空任意杜撰的。整个中国近代史,从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列强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造成中国的贫困落后,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罄

竹难书的罪行。不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就不能独立,就站不起来,何谈走向富强。所以反帝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根本的任务。清朝政府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20世纪初年,清朝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彻底地腐朽了”<sup>[38]</sup>。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中国人民就不能迎来自由民主,何谈走向富强。所以反封建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3、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史观则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往的撰史者也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诬蔑太平军为长毛贼、义和团为愚昧的乌合之众,进而也就否定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三次革命高潮”理论全面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其二,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的理论。根据毛泽东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三种主要形式的理论,孙守任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重要观点包括有:1、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统治者,两者相比,外国侵略势力起决定性作用。2、19世纪末,外国侵略势力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种性质的变化,导致外国侵略势力侵略中国性质的变化。鸦片战前,外国侵略方式是以掠夺为主,鸦片战后是以不等价交换进行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1860年至1894年,侵略者直接出兵协助清廷镇压了起义,并对清廷的藩属和边疆进行了吞食。但大体说,侵略者是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除短期的中法战争外,基本上维持了“中外相安”的局面。侵略程度加深了,但性质的变化是较少的。1894年至1905年,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从甲午战争开始占了主导地位,标志着帝国主义用“战争的”方式代替了“温和的”方式。1905年至1919年,虽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式转入了“比较温和的”的形式,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比以前更深入了。3、外国侵略中国性质的

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表现在四个时期:1840年至1864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形成与农民反封建革命的高涨时期;1864年至1894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巩固和加深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1894年至1905年,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农民反帝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发动时期;1905年至1919年,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继续加深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封建革命的高潮及其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sup>[39]</sup>这四个不同时期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某些变化。

其三,“生产方式”决定论的理论。金冲及根据斯大林“社会发展中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的论述指出: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适应或相互矛盾),决定着政治生活、社会意识等相应的变化。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金冲及撰文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不是在1840年后就立刻完全形成的。相反,它是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内部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社会如何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如何逐步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如何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如何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同时帝国主义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残酷地统治中国,使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切都应当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找原因。为此,金冲及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革的五个不同阶段。从1840年至186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地主、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农民大众,农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政府承认了五口通商和关税协定,外国商品输入迅速增加,东南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开始走向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是就整体来说,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和农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从1864年至1894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外国资本主义以通商口岸为据点,不断扩大自己在华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搜刮。中国农村的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日益卷入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成为其农业原料的附庸。清朝统治阶级也开始创办新式的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的统治秩序。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看到新式工业的有利可图,开始进行投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这一时期都渐次形成。从1895年至1900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一面大大加强对华的资本输出,一面纷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更便利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也使正在进一步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愈加感到窒息,中国进一步堕入半殖民地的社会。从1901年至1914年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已有显著增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形式转到加强对华的经济侵略。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有很大比重。《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缴纳巨额赔款。这样帝国主义就成为牢牢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吮吸膏血、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寄生毒瘤。清王朝财政日益困难,更加加紧对农民进行各种苛捐杂税的勒索,农民生活痛苦不堪。从1914年至1919年为第五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着得到显著的发展和壮大。日美帝国主义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而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英法二国在战后又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遇到严重的障碍,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灾难。<sup>[40]</sup>

其四,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的理论。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学者,无论持怎样的观点,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的标准,还是以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准,



甚或以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作为分期的标准,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都是非常关注的,并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这些基本内容总括说来,就是所谓的八件大事,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可以说,这几件大事基本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反映了中国近代史最基本的内容。这些大事从某个层面基本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它们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阶级斗争发展的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状况。所以无论怎样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也无论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都不能脱离和无视这几件大事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事实上,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要摆脱上述几件大事,我们都将无所适从。

其五,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形成的理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和对中国政治经济实权的操纵,中国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0年代,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讨论中,有人运用大量的经济事例,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对中国工农业侵略、剥削的事实,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阐述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50年代,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有人提出,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完全形成并进一步阐述了理由。那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操纵了中国的财经命脉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起来保持住了封建剥削制度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形成了软弱和依赖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长期落后的状态。因而,在这时就整个中国来看,已是几个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局面;就列强在中国所划分的“势力范围”来看,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又进行着分别的统

治。在政治上封建政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已开始成为列强的农业和原料的附庸。在甲午战后到 20 世纪初年,由于中国经济形态中已经具备了上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所以我们才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已经完全形成,自此中国才完全变成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真正半殖民地。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就包括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买办企业、封建地主占有制下的小农业、民族工商业、小商品经济,而以帝国主义经济成分居于支配地位,以封建制的经济成分在比重上占居优势。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阶级也有了变化,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中国又出现了外国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工人阶级。进而,随着这些阶级先后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就迅速地变化和发展的,1905 年以后同盟会就领导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在 1919 年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sup>[41]</sup>。

通过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但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近代史学理论,而且一些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又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和课堂教学,使其产生了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实践意义。5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然最终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过不同意见和观点的论辩,在理论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对深刻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意义重大。特别是“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主张,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为大中学校近代史教材和一些论著所采纳,这无疑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进而破除了旧有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有专家分析,旧有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第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迭,就是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

铺陈。但无论采用何种体系,旧有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和主流的把握;第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绵延不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正从根本上抽掉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脊梁;第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唯心主义的<sup>[42]</sup>。与此相反,以“三次革命高潮”说为代表,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有力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生动体现在近代通史著作的重新编写上。出版的这些通史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是就其编著的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帜的近代史学科的新特点。甚至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下面我们几本主要著作为例,了解一下新学科体系的特征。

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4 月第 1 版)。我们可以根据作者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了解这部书的特点。作者在《前言》说:“近年来,我国史学界热烈展开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迄目前为止,虽然在划分时期的具体界限上尚有异议,但却一致肯定,正确地采取分期的办法去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才能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作综合的探讨,找出贯串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线索,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全面的系统理解。本书的体例和结构,就是编者吸取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尝试着按照分期的办法来处理的。关于分期的具体界限,编者赞同目前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划分标志,将中国近代 1840—1919 年的 80 年历史分为 1840—1864 年、1864—1901 年和 1901—1919 年三个时期。在本书中,这三个时期分别列为三编,每编之下,有若干章。每章也系以年代的起迄界

限,可以视为该一时期内的不同发展阶段。为照顾每章所系各阶段的特点,举凡在同一阶段内的历史事件,大体上均按照年代的顺序,纳入该章之内。虽然上述的三个时期各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仍有一条基本线索。这一线索,即是毛泽东同志所曾指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交错影响,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基于此,本书的编排和叙述,即以这样两个交错影响的过程为主干,作为各编各章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虽编者掌握材料有限,但始终力求充实,务求能够真实地还原中国人民在各个阶段上从事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为了阐明近代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期内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时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及其相互关系,掌握这一基本线索曲折演变的运动轨迹,因此,编者也尽自己所知,并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上,对经济情况和文化动态作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的政治事件史。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串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sup>[43]</sup>从作者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如下最主要的几个特点:第一,该书是受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影响,并吸取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按照分期的办法来编写的;第二,该书以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划分标志,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并列为三编,每编的标题都是以教学大纲的意见来确定的。这实际上是按“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来编写的;第三,该书各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为标志,重点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体现了该书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理论的接受。仅从上述三点来看,该书的出版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最直接的成果之一,是这次讨论所产生

的实践意义的一种体现。

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第 1 版)。这部著作的编写既受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形成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影响,又受到作者本人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过程中所阐述的某些学术观点的影响。该卷主要叙述了 1840 年至 1864 年这一期间的中国近代历史,即中国近代史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未见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估计这两卷的内容是要分别撰写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内容。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戴逸也主张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但第一个时期他是从 1840 年划到 1873 年云南、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而不是 1864 年太平天国的失败。按照他自己的分期,该书应撰写到 1873 年,然而却只写到 1864 年。这大概是作者根据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要求来处理的。可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而形成的“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影响之大,并被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所采纳,进而影响到有关著作的编写,以致持不同意见的学者编著教材时也要按其思路去作。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在评价有关历史现象时,该书还直接受到了作者本人在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时所发表文章中的某些观点的影响。在此我们可以举例加以说明。如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一支资产阶级队伍,但是判断革命的性质却不应该仅仅从革命队伍的组成因素着眼,而应以产生革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所担负的任务着眼。太平天国革命就其参加的成员来看可以称为农民革命,但这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民战争客观上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次战争称作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段话的意思在《中国近代史稿》中有相同的描述:“太平天国革命正发生在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这就不能不使这次农民革命带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农民群众不仅严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势力,同时也英勇地反击了穷凶极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他们在遍地荆棘中为

行将发展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太平天国革命既是一个农民战争,又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样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正是非常合乎历史的逻辑的。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支资产阶级的队伍,太平天国革命就其参加的成员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判断革命的性质却不应该仅仅从革命队伍的组成因素着眼,在这样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以反封建反侵略为其任务的农民革命,客观上必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sup>[44]</sup>讨论过程所形成的理论与著作撰写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清楚的。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版)。该书共分三章。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封建经济的破坏,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和农民战争”,时间段为1840年至1864年;第二章的标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形成。中国人民为反对列强的统治和瓜分中国而斗争”,时间段为1864年至1901年;第三章的标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及其失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段为1901年至1919年。该书从标题的设置和时间的划分,很清楚地看出,是按“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来撰写的。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该书共分三章。第一章的标题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农民革命”,时间段为1840年至1864年;第二章的标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农民反帝运动”,时间段为1864年至1901年;第三章的标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时间段为1901年至1919年。本书编写的结构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基本是相同的。

以上我们介绍的四部著作,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但是就编撰的基本思路、编撰的体例、编撰的内容来说,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示了受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积极成果。

这种影响的时间范围不仅仅限于 50、60 年代,实际上它一直影响到 80、90 年代,一直影响到今天。80、90 年代出版的通史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为数甚多。可以说绝大部分著作和教材的撰写思路基本相同,还没有脱离“三次革命高潮”的基本线索和“八件大事”的基本内容。下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书目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9 月第 1 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 1 版);苑书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 1 版);章开沅的《中国近代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 1 版);陈振江的《简明中国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 1 版);陈旭麓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杜经国的《中国近代史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赵矢元的《简明中国近百年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第 1 版);龚书铎的《中国近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王承仁的《中国近代八十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徐凤晨的《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 1 版);魏宏运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尹湘兵的《中国近代史》(群众出版社 1999 年版)。以上所举的著作,有的是 70 年代末出版的,有的是 90 年代末出版的。虽然时间相距较长,但基本框架相同。可见,50、6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力之大。不仅如此,在通史性中国近代史著作以外的专史性著作也同样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丁名楠等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8 月第 1 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一书,共分三编:第一编的标题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时期”,时间段为 1840 年至 1864 年;第二编的标题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形成和边疆危机普遍发生时期”,时间段为 1864 年至 1895 年;第三编的标题是“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时间段为 1895 年至 1919 年。这里除第二编与第三编的分界线不

在 1901 年外,其余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是吻合的。

从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领会到,50 年代以来通史性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某些专史性著作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在课堂教学方面,我们同样也能领会到这一点。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和高等师范学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采纳了三大革命高潮的分期方法,那么,学生们使用的教材和老师们授课的思路,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一书 1979 年再版时,在“重印说明”中有这么两段话:“本书于 1958 年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些高等院校还把它作教材使用”;“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历史著作的出版,读者需要的历史书籍目前还很缺乏,特将这部《中国近代史》重印,以应急需”。由于 80 年代以前,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缺乏,也由于这本教材在理论与史实方面有较高的信誉度,所以可以想见这本书当时为何如此备受欢迎了。

(三)学术局限。关于 50、60 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理论进行指导的。由于指导理论与方法的正确,取得的成绩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它对建立崭新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以及对中国近代史规律的认识意义重大,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其取得的成就。然而也应当承认,其学术成就之后所隐藏的学术局限在以下几方面显露出来:

1、运用理论的局限。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诸多问题有过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对于中国近代史更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他们的论断,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但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有些学者往往忽视了经典理论具体时空的意义。经典作家作了某个论断,有时是在某种历史条件和某种具体时空下从某种角度分析某一个问题时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全面的理解和贯通的思考,就容易随意强调某个论断而置其他论断于不顾。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断由于带有历史的烙印,很难说一定都是绝对真理,何况对历史



的认识还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次,对待经典理论,我们主要是正确领会和把握其精神实质,主要是正确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切忌只是关注个别的词句和论断,甚或去做只为经典作注释的工作。在讨论中还有用经典理论直接代替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内容的现象,有些没有做到真正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史。再次,经典理论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经典作家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他们虽然对中国近代史作过一些原则性的结论和提示,但是这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尤其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系统研究,包括对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别研究和综合研究。

2、研究内容的局限。50、60年代,史学界加强了对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明资产阶级不能使旧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50、60年代,人们刚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建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研究内容的匮乏是难免的。用“三次革命高潮”和“八件大事”去规范中国近代史,在当时是一个创新,但是它不能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从中国近代通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并不完善,而且还存在不少空白点,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造成学科内容不够丰满。有学者认为,假如从清朝历史发展的延续出发,以近代社会包括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变化为基点,融大事件于其中,也许是一种突破目前中国近代史格局的办法<sup>[45]</sup>。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探索的难度很大,要想取得成绩非下大气力不可。

3、思维方法的局限。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趋势,首先要考虑近代史发展的合力问题。社会的发展是靠合力作用的。只有在思考合力的基础上,再继续思考这其中的主要动力,而找到了这个主要力量,进而才能纲举目张,也就可以找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

5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时,缺乏思考近代史发展的合力问题。缺乏这样的基础,直接思考主要的动力问题,所以容易把很多重要的历史因素排斥在研究的视野之外。这是思维方法的局限造成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这样一个涉及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问题,企图通过几年的讨论就能够解决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今天把这些局限揭示出来,目的是为了作为以后研究的借鉴和参考。

#### 注 释:

[1]参见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46-76页。

[2]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

[3]华岗:《五四运动史·引言》,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版,第1-4页。

[4]华岗:《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光明日报》1952年3月15日。

[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7]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8]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26页。

[9]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10]《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169-17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1]《列宁全集》第6卷第110页,俄文版。转引自《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4月版。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13]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14]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16]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史学”63期。
- [17]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26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
- [18]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303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2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22]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 [23] 阿历山大罗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第171页。
-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25]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 [27] 《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153页。
-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3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31] 苏双碧:《朝夕集》,第2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 [3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62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3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34]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 [36]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史学”。
- [37]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 [38]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9]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40]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41] 顾林:《试谈中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完全形成》,《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

[42]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43] 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2版。

[44]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513-51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45]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291页。



中 编

---

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  
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 第六章 | 近代史基本线索 讨论的再度兴起

### 一、再度讨论的历史时代

我们在上编阐述了 50、6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辩,这场论辩到了 70 年代末再度兴起,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这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至“文革”前,史学在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时期史学受到来自越来越“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教条主义有所滋长。研究历史往往从概念出发,缺乏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而代之以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和结论。这种被称为“以论带史”的主观主义方法是以主观规定的框架来剪裁历史事实的一种学风。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干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使历史学受到了一次灾难性的破坏。“四人帮”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搞儒法斗争,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从根本上糟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工具,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四人帮”一方面把历史学当成“封资修”的东西来批判,一方面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历史学成了伪



科学、“影射史学”，教训相当深刻。

“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了。1978年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破除了人们头脑中的迷信思想和教条主义，对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创新史学，使史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成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史学界开始清算“四人帮”否定中国历史的反动言论，开展了对“影射史学”和唯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澄清过去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重新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得到正确的运用。由于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双百方针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因此，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使历史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展现了新的风采。

这种新的风采，体现在史学工作者的思想领域，就是开始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并开始对以往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在中国近代史学领域，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对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查找以往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评价，普遍存在着拔高的倾向，只能歌颂，不能一分为二，甚至对某些明显的错误也不能加以分析，致使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某些问题搞得面目全非，不能真正地反映这次农民革命的真实面貌，自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了。再如洋务运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洋务派和顽固派是否是一丘之貉？洋务派后期办的民用企业是否也有资本主义因素？洋务派办学堂，派留学生，建译书馆是否对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也起过一些作用等等。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是否该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过多的否定？如何评价在义和团运动中为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清朝将领聂士

成等人?如何科学分析义和团迷信落后,组织松散,笼统排外,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等等。如何正确分析立宪派的两重性?如何分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上问题的提出,是针对新时期以前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发的。以前在这些问题上,多半不作辩证的分析,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不能给历史以真实的反映。新时期这种反思现象的出现,表明史学工作者在思想深处开始砸碎精神枷锁,突破禁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深入思考以往已经定论了的问题,这对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思考,所以新时期一开始,中国历史研究就有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这其中主要包括:重新学习和认识唯物史观;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加强了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军阀史、抗日战争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各种学术团体纷纷建立;新的刊物和著作大量出版;全国各地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一个接一个,等等。这是思想解放给史学界带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近代史学界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绝大多数论者都在竭力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纠正和克服对农民反抗斗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评价上的简单化和绝对化:诸如义和团是农民的自发斗争,一开始就使用了暴力手段,矛头对着外国侵略者,有反帝爱国的一面;但是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维新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时有人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主流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黎澍当时撰文指出:

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学者认为,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6月第1版)

与此同时,同中国近代史主流问题相仿,“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

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sup>[1]</sup>。下面,我们还将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状况作一全面介绍。

## 二、基本线索讨论概况

自从 50、6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形成第一次高潮之后,由于“文革”前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学术界正常的学术探讨偏离了正轨,很多学术探索中断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末。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也是在 70 年代末又重新开始了讨论,并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形成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论辩热潮。这个时期仅以“基本线索”和“近代分期”命名而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百余篇,而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竟达到了二百多篇<sup>[2]</sup>。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参与这一主题探索的史学工作者也有上百人,使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成为二十年来近代史学界几个重要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各种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述。除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外,还形成了“四个阶梯”说、“民族运动”说、“两个过程”说、“双线”说与“三个阶梯”说、“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等。通过这次讨论,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和基本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纵观二十余年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来把握和认识。

### (一)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主要指 1978 年范文澜遗著的发表到 1985 年曾景忠发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前后的这一段时间。1978 年《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发表了范文澜的遗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一文章的发表,透露出近代史学界在渡过了“文革”之

后,开始重新注重学术研究和关注近代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信息。1979年《昆明师范学报》第4期发表李永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一文,这篇文章是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下限问题讨论的继续,实质是赞同李新和陈旭麓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到1949年的观点的。而真正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深入讨论的是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1984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使论辩进一步展开。这一时期胡绳、章开沅、刘大年、戚其章、苏双碧、苑书义、荣孟源、胡滨、张海鹏、徐泰来、陈旭麓、汪敬虞、张耀美、周清泉等人先后发表文章,阐发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和看法,参加了论辩,使得论辩比起50、60年代更加热烈,观点也更加鲜明,基本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几个重要论点。上述学者的重要观点以及相互间的论辩,我们将在下文专章论述,此不赘述。

这一阶段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继续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这是继5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热潮。1980年王庆祥在《史学月刊》第2期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讨论》一文。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牵涉到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牵涉到对近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牵涉到近代专史的研究和编纂,是近代历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文章对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分期标准、具体分期法作了总结和评述,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法。他认为,只有用近代中国社会中处于革命指导者地位的阶级之成败作为划阶段的标准,才能最本质地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根据这个标准,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864年天京陷落。这段时期内,农民阶级是处于革命指导者地位的阶级。第二阶段始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终

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期。这段时期内,资产阶级是处于革命指导者地位的阶级。第三阶段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内,无产阶级是处于革命指导者地位的阶级。至1985年发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下限和分期的文章达二十余篇。曹平、刘春昌、钱念文、杨策、李侃、张宪文、冯智、张海声、陈纯仁、陆文培、李新、修海涛、曾景忠、李婉、侯玉山、龚家骥、吴肇庆、李鸿生、任关华、来新夏、饶怀民等人先后发表文章参加分期问题的讨论或对讨论进行评述。有些重要学术观点,我们在后文还将论及。此外,黄希源、史全生、杨宪邦、乌恩溥、孙文范、孙健、陈碧笙、张琢等人还对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经济史、哲学史、华侨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次,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在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过程中,涉及对历史重大事件的评价,而洋务运动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70年代以前,近代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基本是持否定意见的。70年代以后,学术界以重新审视的眼光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新的研究,并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到80年代中期,谢方正、段本洛、史澍、刘小光、李时岳、胡滨、姜铎、夏东元、李一氓、黄逸峰、徐泰来、周谷城、丁日初、苑书义、汪敬虞等人撰文参加了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问题上。第一,洋务运动的评价标准。第一种意见认为,对洋务人物、集团、事件的评价应有一个政治标准,具体地说,视其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如何;对封建主义的态度如何;对人民大众的态度如何。从此出发,认为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在“两个过程”中处于反动派一面,因此应取否定的态度。第二种意见认为,惟有“生产力”的标准才具有惟一性与稳定性。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洋务运动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开了头,标志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值得肯定。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把上述两种标准结合起来考虑,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规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而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既要考察阶级斗争,又要考察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民族资本和官

僚资本。第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国近代,除外国资本主义以外,开始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形式”可以有两种,即主要由国家资金、国家经营的一种和私人投资的一种。不管是国家或官僚、军阀、商人办的,都是民族资本主义,都具有对外国侵略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具有民族性。我们过去往往把形式当作内容来定性。对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乱用官僚资本的概念,到处去找买办性和垄断性。既说它是官僚资本,又说有进步性,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第二种意见认为,洋务派所办的企业是早期的官僚资本,强调这种资本与政权相结合的特点。就世界范围而言,封建社会中出现资本主义都必须得到政权的支持,但悲剧在于,中国的封建政权太顽固了,它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来改变政权性质。中国的官僚资本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洋务时期军用、民用企业构成一个资本主义整体,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官”去管理和督办企业,使封建性、买办性渗透其间这一方面来说,它有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抵制的天然性格,并且这种性格在当时还是主要的这一方面来说,它有可能完全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第三,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关系。第一种意见认为,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竭力想成为支配中国社会的一种外部力量,这就决定了尽管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两个历史事件的导演者分属不同的阶级,却都有抵御外侮的共同历史任务;两个运动都主张学习西方知识和长技;还要看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果,一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二是导致封建关系的松懈,洋务运动是在太平天国革命促成的社会畸变的基础上兴起的。也就是说,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上考察,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太平天国革命则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了某些条件。第二种意见认为,历史不能间断、跳跃,从社会发展来看,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近代发展的四个阶段,它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其联系贯穿的线索。第三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

亥革命的阶级属性完全不同,不能把洋务运动与其他三者并列为进步的运动。第四,官督商办的作用。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中国国情,官督商办乃是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商办是民族资本主义从低级向高级的逻辑发展。有人还认为判断一个企业的性质,主要是考察这个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决定于官股、商股的大小、比例。第二种意见认为,企业的性质决定于谁是企业的控制者,用人理财的大权大都在“官”,这就决定了企业的封建官办的性质。第三种意见认为,所谓官(督)办,并非国家在办,往往是少数官员在办。一些官督商办的民族企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基本上没有按照资本主义规律进行管理,往往失去生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第四种意见认为,必须对官督商办的形式进行历史的考察,既要看到它的产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洋务运动前期有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在洋务运动后期这种形式对民族资本的严重摧残。<sup>[3]</sup>

再次,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在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年的时候,丁名楠曾把八十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到新中国建立前夕,除个别外,几乎都咒骂它为拳匪、拳贼。第二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肯定了义和团反帝的正义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后来又尽量拔高,把义和团的革命性说得比无产阶级还坚定。第三阶段是近期,有一种提法是义和团运动是“奉旨造反”。这个提法好像又回到第一阶段去了<sup>[4]</sup>。丁名楠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在新中国建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蒋廷黻就说,义和团运动是顽固势力的总动员。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戚本禹写文章,别有用心地利用颂扬义和团来煽动群众,达到为帮派利益服务的反动目的。他们要无产阶级继承和效仿义和团的落后行动。竟有那么多受蒙蔽的红卫兵上街,大搞像义和团那样的活动,像当年整“二毛子”那样,整所谓“走资派”、“黑五类”。还进而把红卫兵比之为红灯照,火烧英代办处



比之为攻打使馆区。到了 80 年代初,有人又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义和团运动。1980 年王致中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民众多的国家。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从而也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起到如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重,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义和团运动由自发到被控制,显然表明他们对控制利用自己的封建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蒙昧主义,在近代史上是引人瞩目的。这篇文章较多触及了义和团运动的消极方面,作者虽然表示并不否认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但对义和团评价的基本倾向是否定的。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1980 年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邀请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举行了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专题座谈会。《光明日报》1980 年 5 月 27 日以《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为题发表了座谈纪要。章开沅、丁名楠、戴逸、汤志钧、李侃、林增平、陈庆华、阮芳纪等人在座谈会上先后发了言。座谈会上,专家们表示要公正地评价义和团运动,要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客观的分析,作出历史的判断。正如李侃所表示的态度那样:对义和团的评价有人说现在有高调、有低调,当然不能以调子高低去评价历史的是非得失,不过既然有“高调”、“低调”之分,那么我就想来个“中调”。实际这是代表与会者的一个共同的心态,要公正、客观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戴逸的评价就具有这种性质,他指出:义和团的丰功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是民主革命的奠基石。但不是说它没有缺点。两点论就是既要看到它的主流方面,斗争的正义性和历史功绩,也要看到运

动有严重的弱点。一是组织性差,散漫无纪律,没有形成统一的队伍,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策略;二是笼统的排外主义,凡是外国人、外来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排斥;三是愚昧落后,迷信宗教,反对新事物。这些弱点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义和团的致命弱点,是运动很快失败的原因。很多学者也都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林增平从历史分期和基本线索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他改变了以前也赞成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说法,认为那种说法妨碍了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etc 历史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有所失真,稍近浮夸。但是,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革命高潮,并不意味着抹煞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击退瓜分狂潮的伟大历史意义。林增平的观点在座谈会上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看法。陈庆华就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革命高潮,不过可以不把它单独算为一次,时间可以拉长一些,从 1898 年戊戌变法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合起来算为一次高潮。座谈会上对义和团运动的不同评价,对深入探讨义和团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都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最后,对资产阶级的评价问题。80 年代以来,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也形成不少讨论的热点。1983 年 8 月 18 日至 23 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来自全国的七十余名专家学者聚集复旦大学,在周谷城和黎澍的主持下,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抱着求同存异、探求真理的态度,就近代中国八十年关于资产阶级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认真而又热烈地讨论。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中国资产阶级的起点问题。过去一般的著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其依据是,这一时期,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开始发生、发展。这次讨论会有人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的起点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表现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有了发展,买办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增多,商业资本在发展。也有的

同志认为,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不够全面的。中国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就意味着有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关系和资产阶级分子。第二,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一开始就有两种资本主义”,由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并存”,“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一开始就形成两种资本、两个阶级。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否具有如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那样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等一些问题。第三,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在近代八十年间,时代的要求是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压迫,发展资本主义。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的,只能是政治上渐趋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二种意见认为,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未能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多中心时期,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时代中心。1840—1864年,时代中心是农民阶级;1864—1894年,时代中心是地主阶级洋务派;1894—1912年,时代中心是资产阶级;1912—1919年,时代中心是北洋军阀。第四,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三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潮流。另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四个阶段,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潮流。两种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前者认为它奉行的是一条对外投降侵略者,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路线,不是救亡图存运动。后者认为洋务派的“变事”与维新派的“变法”是相承的,不是对立的。对于义和团的评价,前者认为它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后者则认为它不是农民战争,而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此外,还有人主张以“一个过程两个方面的斗争”

作为基本线索,来建立近代史的体系。“一个过程”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过程,“两个方面的斗争”指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sup>[5]</sup>

## (二)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主要指1986年姜进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到1990年胡绳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发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学者仍然很多,其中陈旭麓、夏东元的学术探讨影响较大,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这一阶段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进一步研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这一阶段继续讨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文章有二十余篇。赵春晨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产生到消亡的变化过程”,而这条基本线索的突出表现当然只能是那些深刻反映社会形态变化的重大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事件了。在1840至1919年的八十年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属于这种重大的阶级斗争事件。黄佳也撰文指出: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应该将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沉沦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作为贯串性的线索和主干,还必须辅之以它的两条分支,一条分支是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腐败所激起的中国人民反帝民族斗争和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另一条分支是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进行的中华民族自身的变革图强。这样,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三股中国近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都依据历史的客观规律,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各阶级持续不断的抗争过程,形成了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李双璧则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来解释基本线索问题,认为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

索”不应该只有一条,而应该有若干条,他指出:

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全过程的“线索”主要有三条,它们构成了近代史立体图景的“三维空间”。一是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一个起伏跌宕的过程;二是在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影响下,中国步入近代化——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使中国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裂变——一个奇谲诡异的过程。这三条“线索”并非平衡发展,它们往往呈交织、耦合状态;任何一条都不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反而是时隐时显,有时在这一历史阶段成为主要的,而在另一历史阶段则是次要的。而且,它们的表现层次也不一定局限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以上这些特点,不但贯穿于整个近代史的全过程,而且在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历史演进呈急剧变化状态时,常常会同时反映出来。……历史画面是由多种线条、由多样色彩所构成,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必须摒弃只凭单一线条、单一色彩勾画历史的线性思维方式,在这方面,现代系统论能给我们以很多启示。(《大文化系统:观察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新视角》,《求索》1988年第3期。)

这一阶段,曹维琼从趋向、线索、主题的视角,王恩重从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视角,杨立人从爱国主义的视角,张凤翔从进步潮流的视角,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此外,涂鸣泉、姜铎、俞政、丁日初、沈传经、郑云山、徐松革、张海鹏等人也都撰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sup>[6]</sup>。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及与现代史的断限问题上,有很多人撰文进行讨论。比如余意明把辛亥革命划作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高升斗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当是同盟会的成立;殷方勇把辛酉政变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夏东元把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分为前后两段。高新战、葛仁钧、牟安世、陶用舒、丛广玉、田海蓝、唐建增、沈寂等也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的

讨论。另外,张静如、谢大伟、蒙子良、时广东等人还对中国革命史的体系以及上限和分期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的同时,人们还特别关注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刘耀、杜经国、李时岳、谢本书、伍云山、徐宗勉、宾长初、吴颖、陈华、顾真等人都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sup>[7]</sup>。这一问题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其次,注重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使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思维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上都有了进步。改革开放以后,在关注和了解西方的基础上,中国学者的眼界进一步扩展,一些新的方法被引进和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兴起,也影响了历史学界,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注重研究方法的变化,借以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的社会全貌。这一阶段姜进、何晓明、阳晓天、张炳清、沈其新、李双璧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探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或用新的方法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发展。

姜进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探讨了历史研究方法论变革的重要意义。作者通过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检讨,发现不同学者之间在观点上的歧义,反映了他们理论出发点上的同一性,这就是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十八九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是关于必然性的线型因果思维,它构成了近代科学思维的一个典范,它曾经是启发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动因。然而在历史学领域,它却成为束缚思想的绳索,对历史线型的思考或提法,都不同程度地冒有损失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的风险。改变这种现状的关键,就是摆脱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的束缚。这里反映了作者不认同抓单一线索来概括中国近代史发展脉络的作法。正如姜进所说:

为了将历史组织在主要线索上,就不得不以牺牲其丰富性为代价,……抓主要线索的想法,又往往使研究者过分注意了历史表

面的、纵向的发展,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横向的联系,将注意力集中在革命、战争等重大事件以及少数重要人物上,却很少花力气对冰山山尖下巨大深厚的社会基础作深入的分析研究。这就使一些历史评价显得单薄而公式化,往往不能令人信服。……近代史研究在线型发展观的束缚下,既缺乏高度的综合性,也缺乏对深层结构的微观分析。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有的研究者指出,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应当从革命转向社会。无论提议者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提法本身就代表了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势,这就是:从抓主要线索为主的表层研究过渡到以整个近代社会结构的运动为对象的立体研究。(《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姜进进一步指出,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科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使人们承认,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我们所知的任何运动的规律性都是概然的而非必然的。正是这种概然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创构出无限丰富的、各具特色的民族史、地方史等等。这一发现使20世纪的史学家认识到,描绘少数几条必然性发展线索,远远不能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近代史的研究,在进行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的分类研究时,应当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并且在研究手段方面,广泛地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的方法,创构一批边缘学科,从而构筑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研究架构。

张炳清撰文指出,用系统观点研究历史的有序与无序过程,揭示历史活动的矢量与变量“方程”,是我们透过时空间隔,从思维的深层次转换视角,对历史反求构筑的最新课题。近代中国社会,是在各子系统及其分层次的相互作用、反馈、调节和矛盾中发展变化的。利用系统分析,能够使我们认识到近代社会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反馈和调节机能,从而进一步窥见近代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运动的方向和归宿。<sup>[8]</sup>

何晓明也认为要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他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的宏观研究有两点缺憾:其一,虽然“近代”的下限应断在1949年几乎已成史界公论,但绝大多数论者依然以1919年为界将中国近代史“腰斩”;其二,在腰斩了的半截子近代史的研究中,又津津于到底由哪几个政治事件连成“链条”来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争论,而忽视了全景的、宏观的把握。种种“链条”说的通病,就在于它们过分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而将经济史作政治史的背景条件当成陪衬,将思想文化史作为政治史的观念表现置于附庸。宏观的研究对象,迫切要求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何晓明并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百年史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互相联系。<sup>[9]</sup>

阳晓天借助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历史环境、内在结构和外部功能及其互相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采用这样的方法,为历史主题、研究内容、理论规范、研究方法、基本线索、阶级分析、中西关系等等方面的突破,提供了可能。<sup>[10]</sup>

李双璧则从大文化系统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认为这个大文化系统与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系统有质的差别:第一,它是远离平衡状态的;第二,它是开放的;第三,它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结构,使无序状态转变为某种有序状态;第四,在内部变化及外部冲击的双重矛盾的作用下,它终于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五四运动摧毁了传统文化。这个所谓“大文化系统”,颇有一些现代系统论里所说的“耗散结构”的特点。<sup>[11]</sup>

沈其新认为,近代史学方法的演变经历了博学时代史学、唯理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形成与更替是与时代的进步、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博学时代史学的出现,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利用这一方法的学者知识渊博,史料熟悉,但不善于概括。他们的学术方式是



非线性化研究方法,不注意从大量的史料中概括历史发展的过程与运动规律,故被称为博学家。唯理主义史学及其方法论又称理性时代的史学。推动这一过渡的根源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代表此时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一学术思想被称为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否认历史是变革和转化的发展过程,而把历史看作许多固定模式的因果关系。其学术方式是割断历史联系的机械线性发展观。19世纪初,欧洲开始风行主要反映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情绪的浪漫主义史学。他们反对唯理主义历史线性发展观的非历史主义的纯理性的推理,主张从历史事实出发客观地描写历史的发展过程。浪漫主义史学由于仅从表面的史事出发来探求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以,浪漫主义史学的学术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历史线性发展观及其方法论。科学的历史观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后才形成的。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sup>[12]</sup>这里所描述的存在着多种排列和组合方式的“无数个平行四边形”所揭示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即是历史线性研究与非线性化研究方式的辩证统一。这种建立在科学世界观上的研究方法代表了人类当时在史学研究领域达到的最高思维水平,同时也为史学研究方法的继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近三十年来,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中国的史学不仅固守已有的模式,而且完全以线性研究取代非线性研究,同时将线性研究绝对化。所以,对中国近代史采用科学有线性与非体系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由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时间——维性与空间的多维性所决定的。正如沈其新所说:

中国近代历史是具有世界性广泛联系的历史。辩证法指出:

世界性联系的事物,既有时间要素,也具有空间属性。近代史发展的时间一维性,决定了历史线性发展观的客观性及其进行有线性研究的必要性。近代历史发展的空间多维性,决定了近代历史运动的立体性、结构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发展的动态性。耗散结构学说通过对天体运动的演变与趋向的研究说明:空间立体运动的事物的运动过程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反复演变的过程。在无序运动初期,空间立体的运动是无体系无趋向的运动;在无序运动的末期,运动才出现有趋向、但仍无体系的状态;当运动进入有序时期,运动才进入有体系有趋向的状态;在有序时期末期,运动的动态性加剧,又显得无体系、有趋向,向新的运动周期过渡。可见,空间立体的运动是结构的多样性、层次性和不稳定性(即变易性)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运动过程状态是无法归纳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体系与研究模式之中的。所以,对具有空间多维性运动属性的中国近代史必须采取相应的非体系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针对当前理性体系化研究模式而言的所谓非体系化并非是无体系,其含义是多学科、多模式、多体系的动态结构的综合研究(即整体研究)。(《非体系化研究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接着,沈其新运用非体系化研究方法,以中国近代史的政治大事为例,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三层次和三结构的分析。

以上学者系统探讨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但是真正运用这类方法研究历史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很多,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问题。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它既包括上文所涉及到的基本线索、具体分期等问题,同时也包括其他相当广泛的历史问题,诸如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主要矛盾、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各阶级的地位及评价、重大事件的评价、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体例等等。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学界注重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问题

的探讨,并具体反映在湖南召开的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

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是于1987年8月21日至25日由湘潭大学召集的全国第一次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会议在湖南湘西桑植县天子山湘潭大学教学科研基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会议就如下体系体例问题进行了研讨。第一,基本线索问题。除“三次革命高潮”说、“四个阶梯”说外,会议还提出了各种新观点。如新的“三大革命高潮”说: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此三大革命阶段作为基本线索。“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认为近代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力方面,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变化;二是在生产方式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化;三是在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变化,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之发生等等。“两条线索”说,这种意见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概括为一个方向,即资本主义方向;两个潮流,即反动的潮流与进步的潮流。由此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该是两条:一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另一条是阶级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三条线索”说,在具体阐述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化、中西文化冲突,这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三条主要线索。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三条线索就是三种趋向:一是社会经济形态由封建社会向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二是国家主权从独立完整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三是国内政治生活、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复杂、激烈。“五个阶梯”说,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标志,应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五个阶梯。这次会议还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编写体例时,有的学者认为可以采用史、志、传、表四种体裁分别叙述的方式,以求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全貌。湘潭大学介绍了拟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记》的打算。有的同志建议采用章、节、目、附录

等形式来编写中国近代史。不少与会者认为,正像中国近代史的体系可以多种多样一样,其体例也可以多种多样。<sup>[13]</sup>

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8月20日至23日由湘潭大学主办的中国近代史宏观学术研讨会。会议在湖南湘西大庸市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分期、社会性质、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史研究、近代资产阶级、近代史的体系与体例、近代史教材的编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近代化,近代化是当时世界历史的主流,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问题都与近代化有关,独立与民主都离不开近代化。有人认为独立和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救亡图存始终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要课题,民族战争在近代史上占有很大比重。历史线索是多线条,不是单线条,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有人认为“争独立,复先进”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可以包容“两个过程论”和“近代化论”的长处,反映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内容,又可以纠正两者的偏颇,且比“独立和近代化论”更能贯穿于整个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也有人认为,由于人们各自考虑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各有不同的体系,出现不同的取舍,这是正常现象。不同认识可以写出不同体系的近代史,每一种体系都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可产生互补效果。

二、关于“近代化”一词的使用。有人主张用“现代化”这个概念,因为便于国际间交流,近代化与现代化两词并不是根据生产水平高低来使用,凡是用机器生产的都属于现代化,以区别以往的手工生产。有人认为,为了把民主革命时期的现代化与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区别开来,还是分别使用近代化与现代化为好。有人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谓的近代化就是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有人认为,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上,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全方位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三、关于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有人认为,帝国主义一方面是侵略者,另一方面又是近代

文明的孵化者,它既使中国主权丧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有独立解放的任务,又带来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这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背道而驰,侵略者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描绘这段历史,不能以善恶的道德观念来加以评判。有人指出,认为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是依据封闭式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有人根据自己找到的档案,认为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不在英国政府一方,而在清政府一方,是清政府的落后,不肯通商,才使英国国会通过战争的决定。很多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与英国通不通商,清政府作为独立国家有选择的权利,英国搞非法的鸦片贸易,不是正常通商。清政府不与英国通商,英国就用战争对付清政府,这种行为就是侵略。因而鸦片战争的责任在英国一方。四、会议代表就《中国近代史记》三卷本的出版,讨论了中国近代史的编纂问题。<sup>[14]</sup>

### (三)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主要指从1991年姜秉正在《学术研究》第1期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到1999年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学术界还在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其中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和林华国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影响较大,后文我们将具体论述。

这一阶段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继续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这一阶段继续讨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文章有十余篇。这些文章是在对以往探讨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的一些新的看法,其思维的方法和

思考的角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崔志海在《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要从根本上摆脱“以点带面”,“以点带线”的思维定势。在方法上应该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进而对中国近代丰富多彩的历史进行科学的抽象,抓住问题的实质。他提出了在近代化主题下的四条基本发展线索,即: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思想行为的近代化,国家的独立化,认为这四条基本发展线索的内容不同,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样。工业化这条线索是根本,起决定性作用,其他三条线索在不同时期分别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在近代化的主题下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运动。

彭明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它是一部屈辱史,它是一部抗争史,它是一部探索史。屈辱史是从近代开始的,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大量的主权。近代史又是一部抗争史,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从林则徐、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李大钊、毛泽东等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悲壮和雄伟的颂歌,最终结束了百年受辱的历史。近代史又是一部探索史,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并在学习的方向与层次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彭明指出,要按照这样三条线索,通过形象的历史材料,对青年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sup>[15]</sup>。朱育和、蔡乐苏认为,贯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应该从中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个侧面来看,“应是为求得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而不断认识、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抗击外国的入侵和压迫)和利用国际环境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中心目标是独立和发展,它的复杂的历史内容包括中国人在进入近代以后,不断认识外部世界,不断抗击来自外部的侵略和压迫,不断利用外部世界在对华关系上的各种矛盾和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物质、精神因素,不断去改善外部环境,争取平等相处,友好交往,提高中华民族

在世界上的地位,等等”<sup>[16]</sup>。此外,关威、宋德华、陈崇凯、姚会元、土木、杜耀之、安静波、柳和仁、孙占元、任军等人也各自撰文继续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维革、俞祖华等人还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徐立亭、吕建云、田毅鹏、刘光永、张振、费迅等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上下限以及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张磊、赵立人、王付昌、陈为、刘振岚等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主要动力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或进行了评述<sup>[17]</sup>。

其次,探讨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继承上一阶段对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1991年《学术研究》第1期设“中国近代史的讨论”专栏。编者按指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实质上是如何深入与提高的问题。本刊自1988年以来,发表过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还专门发表了广东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社会性质的争论的长篇综述和李时岳、张磊、陈胜<sup>※</sup>等人的观点,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引起了国内近代史家们的关注,收到了不少来信和参与讨论的文稿。(由于条件所限而未能及时一一发表)从本期起,我们将继续发表一些文章,除继续原有的问题争论外,还可扩大范围,希望能引来更多的争鸣,使近代史研究迈出新的步伐,获得实绩性的新成果。

这里所讲的“突破”,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展,还具有探索研究方法含义。在编者按下面刊登了姜秉正的《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张连起的《怎样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和李时岳的《论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等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立意的。姜秉正就指出,以往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概括为“一条线”,或曰“一条主线”,就是所谓单线性观点,这种单线性观点无疑是有局限性的。进而他提出近代历史的多线性,即政治、经济、科教三条曲线的相辅相成。他特别指出不能忽

视科教这个子系统,认为科教这个子系统的历史缺陷,不应成为我们研究中的缺陷。近代历史科学的使命,应当克服以往失之偏颇的毛病和局限性,用多线性的方法研究包括科教这条曲线在内的近代历史的多线性发展过程,全方位揭示其本来的面貌,找出其内在规律。张连起继刘大年“从经济史突破说”后<sup>[18]</sup>,又提出了“应该划定近代80年内,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其中特别是以皇帝为首的<sup>最高统治集团活动为突破口</sup>”的观点,认为这是以往研究中十分薄弱、较容易突破、又能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阶段,刘大年撰文继续探讨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97年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方法论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不但对近代科学与近代方法论的关系以及方法论在指导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而且把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到方法论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使人对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和清晰的认识。刘大年指出: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认识,常常不受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左右,就要受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左右,区别只在于自觉与不自觉。有人热衷标榜讲历史要“浩然中立”,只讲事实,不讲指导思想,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指导思想,而偏爱另外的指导思想。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只有运用这个方法才能解释中国近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并存,才能解释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迅速下沉与近代工业出现并微弱上升两种趋向的并存。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刘大年认为,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刘大年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民族不独立,国家领土主权遭到破坏,重点讲的对外一面;半封建指长期的封建制度开



始崩溃,但没有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重点讲的对内一面。它们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取消其中的一面就不存在另外的一面。对于阶级分析问题,刘大年认为,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由于在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同,形成了地位不同的社会阶级。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是说不能牵强附会,把什么都拉到阶级上来解说,反过来,也决不可以丢掉阶级分析去认识、评定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去认识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我们当然知道,讲中国近代史是否采取阶级分析方法,叙述重大事变,评介人物活动,结论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一定就知道,拒绝基本的阶级分析,那完全可以从人们早已达到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现实认识,一百八十度向后转,把颠倒过来了的史观再又颠倒过去,以致比没有加工没有雕琢的唯心史观,显得更加荒唐。刘大年还举例说明,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彻底否定阶级分析所产生的学术谬误。此外,刘大年还对“革命与改良”、“中国当代与近代”、“勇敢坚持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等问题作了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阐述。

这一阶段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问题,胡绳也谈过自己的意见。1996年胡绳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在文章中他谈到用阶级分析方法撰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以及辩证地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他指出:

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2000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

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最后,关注近代史研究理论的突破。1993年郭世佑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下称郭文)。文章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开展的主要因素似乎还不是研究课题本身的陈旧,而是理论研究的相对落后。预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真正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从理论研究入手,认真检查一下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和研究方法,提高宏观理论研究水平。郭文主要阐述的是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理论上的局限。重点从“框架与定论”和“原则与方法”两个方面提出问题,进行分析。关于“框架与定论”,郭文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科至今还是以革命史为框架,并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如下基本一致的认识:

一、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清朝政府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统治者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言人。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决定了近代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以暴力形式反帝反封建。只有先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行国家独立和人民

民主,才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接着郭文针对既定的框架和定论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一,在现存的近代史框架里,某些本来还应进一步推敲的结论一旦为人们普遍接受,往往成了驾驭史料和指导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原则,甚至被冠之以历史规律,使人深信不疑。其二,还有某些被人们称作历史规律的结论既不是以历史条件和历史事实出发,也不是遵循严密的逻辑演绎规则,而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即使同一个学者,同一部近代史著作,却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结论,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其三,还有某些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却又人云亦云的定论当与学术界不曾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关,或源于人们对某些哲学原理的模糊认识。另外,从“原则与方法”上看,郭文认为,在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基本线索、主要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时,不少学者坚持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标准来衡量和批评对方的论点。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历史依据。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曾经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它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历史所证明了的。应该说,原原本本地拿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为标准来衡量学术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有关论点的是非曲直,这种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实不可取,似有“凡是”遗风。首先,在当时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和激烈的历史条件下,戎马倥偬中的毛泽东不可能像后世学者那样从从容容地细心研究中国近代史。其次,作为现代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以革命史为框架来总结中国近代史,固然可以得心应手地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并不等于说同时可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等于说可以为我国举足轻重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许多现存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指导。再次,即使就革命史角度而言,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中国近代史所作的概述并不完全一致,也需要认真研究,具体分析。最后,追求真理,大胆创新,实乃任何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史学研究也不应例外。即使毛泽东曾经是一位杰出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也

不可能全揽无遗和准确无误地把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罄尽,剩下的工作只是重复他的结论,或为这些结论作点注解。郭文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并提出商榷的意见。

1995年郑剑顺在《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与郭世佑先生商榷》(下称郑文),文章全面否定了郭文的观点,郑文指出:

郭文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影响中国近代史深入开展的主要因素似乎还不是研究课题本身的陈旧,而是理论研究的相对落后。预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真正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以理论研究人手,认真检查一下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和研究方法,提高宏观理论研究水平。”很明显,郭先生对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理论是不满意的,看成是“落后”的。郭先生这里所提的“理论”应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理论,而不仅仅是某些“定论”。理论和“定论”是不等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同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一样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的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实践证明,这是科学的史学理论。以科学的史学理论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就能明辨是非,少走弯路。这样的“先入为主”是完全必要的。郭文所说的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按其文意,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的论断等,讲明白点,指的就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关论断。他认为肯定这些论断是“凡是”遗风。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就是正确的,这种盲从固然不足取。但是,毛泽东说的也未必都是错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关论断,完全可以当作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对待。广大史学工作者接受他的观点和论断,说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科学性,这是不奇怪的。郭先生对毛泽东的一些论断有疑义,这应是允许的,如言之成理,自然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可惜郭先生所言缺乏说服力。

郑文接着指出:郭文要“突破”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是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做出片面估价而引出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理论”的束缚,现状很不“理想”、大家已无话可说。他总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要“突破”束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以改变研究现状。究竟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是否如郭文所言那么不景气、不“理想”、不满意?有必要分辨清楚。基于这样的思考,郑文对郭文的十二种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并指出:郭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估价和评论有诸多不妥和失误。郭文自以为是,似乎众人“皆醉”、惟其“独醒”,似乎“人们”只有按照他的“指导”去做,中国近代史研究才能深入、才能发展。郑文的批评是严厉的。这种论辩对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问题是有积极启示意义的。

注 释:

[1]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版。

[2] 参见“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 参见黄继宗:《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若干问题综述》,《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1期。

[4] 《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5月27日。

[5] 参见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复旦学报》1983年第6期;傅德华、胡礼忠:《“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9期。

[6] 参见《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7] 参见《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8] 张炳清:《中国近代史系统分类及其方法论问题初探》,《求是学刊》1987年第1期。

[9] 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

[10] 阳晓天:《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系统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1986年第3期。

[11]李双璧:《大文化系统:观察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新视角》,《求索》1988年第3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3-44页。

[13]参照白宜傅《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关连吉《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讨论的新进展——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评介》,《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郭世佑等《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88年第1期。

[14]参照立早《中国近代史宏观研讨会综述》,《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渐醒《中国近代史宏观学术研讨会综述》,《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5期。

[15]彭明:《屈辱·抗争·探索——谈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教学》1991年第5期。

[16]朱育和、蔡乐苏:《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的若干想法》,《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6期。

[17]参见“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18]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

## 第七章 | 关于基本线索的论辩

在 80、90 年代,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几乎没有间断。中国近代史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观点纷呈,不拘一格。其重要观点就有“三次革命高潮”说、“四个阶梯”说、“民族运动”说、“两个过程”说、“双线”说与“三个阶梯”说、“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等。下面仅就上述重要的学术观点进行介绍。

### 一、“三次革命高潮”说

“三次革命高潮”说是 50 年代胡绳提出来的,从 50 年代起,“三次革命高潮”说就被大多数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所接受,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学术观点。并成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重要观点之一。胡绳仍然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根据“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框架进行设计,从 1973 年至 1979 年间撰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这本书到 1996 年再版,前后共出版了 300 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广。胡绳指出: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潮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运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义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胡绳在此继续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并再一次强调了第二次革命高潮的这一环节,回答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这一问题的异议。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把1840—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这与他在50年代把它划分为七个时期略有不同,但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是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了而已。胡绳作了如下具体说明: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放在1864年而应放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20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结束。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sup>[1]</sup>

对于“三次革命高潮”说,正如胡绳所说“也有提出异议的”。70年代末提出异议的是李时岳。1979年1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上,李时岳作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学术报告,报告对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提出了质疑。提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

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个报告 1980 年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公开发表,文章指出:“1840 年到 1919 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前进的基本脉络”<sup>[2]</sup>。文章试图重新评价解放后一直被大多数学者否定的洋务运动,并力图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引发了继 50 年代以后又一次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长久的讨论。李时岳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脉络的认识,与“三次革命高潮”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虽然后来李时岳表示他的观点与“三次革命高潮”说“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所以需要做的修正和补充,因为我感到‘三次高潮’论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关键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sup>[3]</sup>。但实质上李时岳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脉络的看法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观点,立即引起史学界的争鸣。关于李时岳的观点,我们将在下节详细论述。

刘耀对“三次革命高潮”说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提出了异议。他指出:

自 1954 年胡绳同志提出中国近代历史出现过三次革命高潮的意见以后,它不仅为大家所接受,而且有的同志把这三次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三个阶段,并且把它运用到编写中国近代史的体例中去,成为中国近代史体例的一种。用三次革命高潮把中国近代史划成三个阶段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其所以是不正确的,就在于这种分期法,突出了农民运动,贬低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试看三次革命高潮中,农民运动占了两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只有一次称得上是革命运动,而另一次称不上为革命运动(因为采用改良手段实现变革)。这样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方向究竟是谁?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又是什么?中国的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走什么路,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实际就是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 这些问题都是不清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戚其章认为,“三次革命高潮”说的提出,在当时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成果,它将中国近代史初步理出一条线索来,因此很快地便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但现在看来,“三次革命高潮”说虽然不无道理,却未必精当,因为它不能完全扣紧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以说明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陈月清认为,“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体系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中国近代通史的体系则过分简单化了。它必然忽略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变化,也很难全面反映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例如,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逐步形成时期。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洋务派的活动不论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后果,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过深刻影响,但过去由于洋务运动不属于“高潮”的范围,因而未被深入探讨。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亦被忽略而缺乏研究(以上均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章开沅并不反对“三次革命高潮”说,但他认为:“经过多方面权衡得失,我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以不用为好。因为他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异,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属于同一的性质和类型,而三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差异则未免太大。”(《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胡滨对“三次革命高潮”说提出了质疑,他说:

所谓“三次高潮”,是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并将它们用来作为中国

近代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史上是否真正出现过所谓“三次革命高潮”，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仅就义和团运动来说，我认为，它是一次对外民族战争，而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而不是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在性质上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是相同的，尽管它们本身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革命高潮”之内，中国近代史上不存在所谓“三次革命高潮”，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将革命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也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不足以显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

当然，赞成“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学者很多。有的学者就指出：“从政治史或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帅、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当然，胡绳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如果把近代史的下限放到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sup>[4]</sup>。祁龙威在谈到什么人代表近代中国历史进步潮流时，完全赞同“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以农民战争、资产阶级运动（包括维新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为标志”（《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红旗》1982年第2期）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但徐泰来不同意祁龙威的看法，认为线索不容割断，他说：“试问农民战争与资产阶级运动是如何联系起来

的？在太平天国与戊戌维新之间的三十几年里阶级斗争的表现与特点是什么？如果把占据中国近代史三十几年的洋务运动抛开，阶级斗争线索岂不中断了吗？由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运动，是经过了转向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同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的斗争这样一个过程的。历史本身是一个呈现出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着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缺了其中的一个阶段，历史不能跳过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

陈铭康、郑则民在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时，充分肯定了胡绳运用“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框架来撰写本书的客观逻辑性，指出“胡绳同志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心，论述了从1840年到1919年间的历史”，是从“分析这三次革命高潮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们各自的特点，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客观的逻辑关系的。因此，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体写成的这本书，使人不觉得是无数历史事实的堆砌，而是能够看到，表面上分歧错杂的事实是合乎规律地合乎逻辑地一步步展开的。这种逻辑不是人为地加上去的，而是历史发展客观过程本身所具有的。”（《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 二、“四个阶梯”说

“四个阶梯”说是李时岳提出来的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1980年李时岳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有的学者从题目上看，把它概括为“三个阶梯”论。但李时岳认为：“我明明写的是‘四个阶段’。不过我也很赞赏‘阶梯’——逐级上升这个说法，则称之为‘四个阶梯’论也未尝不可”<sup>[5]</sup>。1984年李时岳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四个阶梯”说。他认为以往人们研究近代史，往往认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完全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向上发展的趋向。他指出:

我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不过,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找出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历史趋向的标志。什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趋向?按照一般规律,封建社会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前景)。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反映半殖民地化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突出的标志则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反映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突出的标志则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

上文谈到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指的是近代中国向上发展的趋向,即中国社会内部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发生的新变化,亦即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趋向。“四个阶梯”说与“三次革命高潮”说比较,多了一个洋务运动,少了一个义和团战争(并以维新运动替换),为此,李时岳专门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战争作了必要的阐述。李时岳认为,洋务运动具有进步性是无可置疑的。首先,它顺应世界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初的努力。其次,它适合中国需要,实现了从手工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第三,它自觉地引入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培育了中国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伴随着这些,陈腐的封建社会中开始出现新的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关于义和团战争,李时岳认为它是一

次民族战争,而不是农民革命,“不把它列入主要线索,丝毫不是意味着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的贬低或否认。”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说引起了热烈地争论。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指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对李时岳基本线索的理论最早提出了批评。章开沅也指出:“中国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也一直比较弱小,并且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都不可能起左右一切的决定作用。如果片面地强调或不适当地夸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则容易忽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其他方面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容易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至少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就很难纳入‘洋务—维新—革命’这样的简单框架之中。”(《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戚其章也认为,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此说也有相当道理,因为它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由改良而革命,表述比较清楚。但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并不能概括全部中国近代史,所以也是有缺陷的<sup>[6]</sup>。陈月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体系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一提法,突出了资产阶级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亦能表述出资产阶级从改良逐步发展到革命的规律。但有不足之处:其一是这一体系同样不能概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其二是它对农民阶级和农民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其三涉及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我们要重视洋务派学习西方,促使资产阶级产生的一面,也不可忽视他们日渐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一面,我们不否认洋务派中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不少人并非社会的进步力量。如有些洋务官僚同买办势力结合后产生的资产阶级是属于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当然不

会是革命的动力,那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对洋务运动的作用应全面分析<sup>[7]</sup>。祁龙威对以抽象的“学西方”为线索,提出“洋务—改良—革命”的阶梯概念持不同意见,认为依照这种逻辑,“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农民战争,将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中被勾销,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统治者办洋务。”他接着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公开声明他继承和发展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事业;而站在他对立面的袁世凯,却也公开声明自己是曾国藩、李鸿章的继承者。这一生动的对比,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近代中国存在的两条本质不同的历史线索:一条是红线,一条是黑线。由此可见,所谓‘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完全连接不起来的”<sup>[8]</sup>。徐泰来却不同意祁龙威这种“完全连接不起来的”观点,认为“这种‘联系不起来’也只能发生于人们的思想里,历史本身确有它的不可否认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一再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分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6页)这包括洋务运动在内,不能把它割掉。割掉了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都是说不清的,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也并没有什么帮助”<sup>[9]</sup>。另外,张耀美对祁龙威的“一条是红线,一条是黑线”的两条线索观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他指出:

新旧两种因素之间自然会有矛盾,但没有“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绝对界线,作为一个整体很难将其划到“红线”一边,或者划到“黑线”一边。恩格斯在评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时提出:“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洋务运动时期就充满着这种“亦此亦彼!”



的社会现象。不仅洋务运动时期,在每一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这种“亦此亦彼”的社会现象。例如,维新运动时期的不同程度支持维新运动转化中的封建官僚(包括某些洋务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历史绝不是循着“两条线”向前发展。以往,我们习惯于在绝对对立中思维,往往忽略事物的转化和过渡,忽略“亦此亦彼”的矛盾的中间环节。客观历史是复杂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简单化。在这里,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早在四十年代评论新史学时讲的一段话,是有益的。他说:“在有些新的中国史著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又似乎除了两个集团之外,再没有游离的个人,或者不属于两个集团之间的社会群”,“把所有的人都归纳到两个定型的集团,这又未免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固然都有两个敌对集团之对立,但在敌对集团之间,也还有一个中间的社会群,在两大敌对集团之间往往起着缓冲和激发的作用”,“因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史的时候,我们便不应忽略这一个中间社会群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略论中国史研究》,载《中国历史论文集》,东方出版社民国34年版)。我理解这里所讲的“中间社会群”,指的就是“亦此亦彼”的矛盾中间状态。用“两条线”的方法分析历史,过于强调矛盾斗争,强调绝对对立的界限,而忽略矛盾的统一性,忽略矛盾的转化和过渡,不承认事物发展的中间环节,这正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易于产生简单化、片面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刘大年在论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时,从选择不同政体的角度分析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孙中山要建立的共和政体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政体主张是不同的,进而不同意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说。刘大年说:

国内国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撰述里面,都有把洋务运动、维新

运动、辛亥革命看做一脉相承的。那么,共和政体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关系怎么样呢?洋务运动的理论家冯桂芬,最早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所谓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就是说,君君臣臣那种封建秩序不可更易。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后来发表《劝学篇》,发挥冯桂芬的思想,明确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把这个口号具体应用在政体问题上,就是尊君权,反民权——不管哪种形式的民权。……维新派主张开议院,兴民权,在这个问题上跟洋务派分手了。但他们兴民权的界限,到君主立宪为止,从来也没有逾越过这个界限。参加维新运动的个别人如谭嗣同,强烈反满,流露出有反对君主制,赞成共和制的思想。但《仁书》一书,在他生前并不曾印行,那些思想也不见于别的地方。因此,它与维新运动毫无关系。……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共和制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恰恰相反,是彼此独立的。如果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讲“民权”,表面上还有一点联系,那么,洋务运动一味尊君权,反民权,与共和制任何联系也没有。即使凭这一点,也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41—34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汪敬虞在评论李时岳的观点时也指出:“根据作者的论证,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接着汪敬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把资本主义的概念应用于1840年以后的中国,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研究。第一个方面是新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这是不容否认的。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非常微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不占主导地位。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单纯计算本国自有的资本,中国至多10%的资本主义,还谈不上是半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单纯根据计量的提

法,也许是荒谬的。我们决不想以 10% 的资本主义替代半资本主义。我们的意思是:谈到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不区别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把它们笼统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固然是不恰当的,但是在谈到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时,不结合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考察,恐怕也未必恰当。而一旦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格局,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向上发展的因素’。相反,它正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一个标志,是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区别于正常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二个方面是需要研究原有封建经济的变化。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出现,主要是农村中富农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到了 20 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 6%。与此同时,入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不是来促进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它的经济侵略,一方面部分地分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方面又尽量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以便利其榨取广大的中国农民。以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说中国农村经济已经半资本主义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整个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仍然是一个“向下沉沦”的局面。“总起来说,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这一东方巨人的近代苦难,也是一个完整的历程。当他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而不是什么半资本主义社会。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的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sup>[10]</sup>

李时岳对于汪敬虞的批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汪敬虞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不可分割’,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李时岳指出: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二者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即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帝国主义的侵略起过促进的作用;而封建剥削

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的保持,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等等,又使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从此着眼,可以把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二者之间又确有区别,从各自的特定含义着眼,则并非“不可分割”。半封建的“半”并不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指封建社会内部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因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特别是政治的因素。单纯根据计量的提法,乃至单纯根据经济现象的提法,诚如汪先生所说,“也许是荒谬的”。李时岳进一步论证说: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著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页,1952年版)这里所说的半殖民地,正是指丧失了独立,强调国家地位的沉沦;半封建,则是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说明社会的进步。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毛泽东的这个判断难道不是“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吗?相反的,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成是不可分割的,把半封建的另一半说成是半殖民地,那末,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哪里?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岂不毫无意义?“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这样,就能够“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吗?至于“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的形象性比喻,不能不令人遗憾地指出,乃至完全缺乏事实基础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汪敬虞觉得李时岳对自己的很不成熟的看法能够得到及时的反应感到欢欣和鼓舞。在肯定了李时岳的一些论断后,又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是什么,它贯串着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线索?这是首先要明确的。根据我所理解到的李时岳同志的意见,108年的中国近代史,有两个发展趋向或反映这个趋向的线索:“反映半殖民地化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他又说:“我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不过,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的变动”,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李时岳同志的这个看法,比单纯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自然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样一个两分法,在我看来,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能够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没有指出一个总的线索,也就是没有明确提出贯串108年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汪敬虞通过一番论证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红线,或者说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接着对李时岳“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说明社会的进步,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的提问作了回答,“撇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不谈,抽象的资本主义当然要比封建主义进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上升而不是沉沦。但是一旦结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结合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结合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真正发展的历史过程,局面就和前者完全不同。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的意思。相反,指出中国历史的沉沦,正是要说明在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可歌可泣。”至于汪敬虞以前曾作过的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的形象比喻,李时岳要求拿出“事

实基础”来,汪敬虞认为李时岳的要求是合理的,接着他拿出了自己的事实基础:“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就是最好的‘事实基础’。认真地研究这一事实基础,是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面临的严肃任务。只要我们认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沉沦局面,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此外,汪敬虞还指出:“李时岳同志诘问道: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历史的沉沦,‘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哪里?’‘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这是不难解答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还有什么言辞能比庄严的国歌,更好地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和前进力量之所来自吗?漫漫长夜是有尽头的。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明确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方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明白无误地指明了这个方向,而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恰恰模糊了这个方向”。<sup>[11]</sup>

林华国对李时岳的“两种趋向”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李时岳的“两种趋向”论与传统的“两个过程”论有重大的实质性区别。“两个过程”论认为,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是一个统一的沉沦过程,与之相对抗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是一个上升的过程,后者是近代历史中进步的主线。“两种趋向”论则认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是与半殖民地化相对抗的上升过程,是近代历史中进步的主线。林华国指出:

为了论证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是一个与半殖民地化相对立的上升过程,李时岳在80年代前半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有意回避对近代中国社会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复杂成分(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进行剖析,并把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资本主义因素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发生和发展,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进步的,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物质力量。”(《近代史新论》第2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因

素”，显然并不包括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因为它们并非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这里，所谓“资本主义因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词，经过这样的概念转换，整个“资本主义因素”变成了进步的，整个半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自然也就成为进步的了。但是，把民族资本主义混同于整个资本主义，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说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进步性，绝不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内的资本主义，不仅有代表民族利益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代表殖民者利益的外国资本及其附庸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其优势更加明显，民族资本则一直处于次要和软弱的地位。代表半资本主义化的基本方向的，绝不是民族资本，而是外国资本。中国的半资本主义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的主导下进行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社会半封建化的进程并不是在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发展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之时，也就是中国开始半封建化之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为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开辟了道路，引发了中国的半封建化。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又加强了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控制力，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都是在外国殖民者主导下进行的，二者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而不是像李时岳所说的那样“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林华国认为李时岳由于回避了代表“半资本主义化”本质与发展趋向的并不是民族资本而是外国资本的这一基本的事实，所以李时岳在分析中国的半资本主义化时，避而不谈半资本主义化中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发展趋向，而用民族资本的发展趋向来代表整个半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向，从而得出半封建化与半殖民地化相互对立的结论。这一套理论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违背的，也是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

也有学者的学术观点是与李时岳的观点相类似的,如刘耀指出: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了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这时中国革命政治指导者只能是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由哪个阶级来推动呢?最初是由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来推动,接着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来推动,最后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来推动。由于上述三种力量的推动,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三次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第一次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运动,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还出现了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之前所出现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

假如按照这条主线的发生和发展来划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该划分四个时期:

一、1840年到1864年,即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和旧式农民战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有其政治力量的代表起来斗争。所以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

二、1864年到1895年,即从太平天国失败到中日甲午战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和地主阶级改革派推行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洋务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酝酿,普遍的反洋教运动,在这个时期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1895年到1905年,即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同盟会成立以前。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形成高潮,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作为这种经济力量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已



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正在酝酿自己发动一次独立革命运动。

四、1905年到1919年,即从同盟会成立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中心事件。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围绕辛亥革命进行的。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胡滨也有类似的意见,他指出: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曾进行过学习西方的尝试和努力,这些尝试和努力统统失败了,但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必须把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

张耀美的观点也与李时岳的基本相同。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这一发展方向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显示着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革、革新、革命,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从低级向高级的斗争发展过程。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革新、革命,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张耀美

主张中国近代史应以“反映社会经济矛盾的国内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反映这一线索的主要标志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近代历史的八十年应相应的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840年—1864年；1864年—1895年；1895年—1905年；1905年—1919年”<sup>[14]</sup>。

### 三、“民族运动”说

“民族运动”说是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一个新观点。章开沅认为，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以作为真正动力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但是，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作为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历史中又各自有其千差万殊的具体特点和表现形式。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决非简单地重复阶级斗争是基本线索这一人所共知的结论，而是应该着重探索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具体表现。为了强调需要对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完整的理解，不能把它看成是游离于经济、文化之外的仅仅是涉及政治的暴力行动。

章开沅认为要从民族运动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作新的探索。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广义地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其间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根据这样的理解，应该把太平天国看作“一次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由农民自己发动的大规模民族运动”；把洋务运动中的积极因素也看作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把维新运动视为“初步具有近代格局的民族运动出现于历史舞台”，认为救亡图存与政治革新结合，说明“中国民族运动在甲午战后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至于辛亥革命，则是把甲午战后上层维新运动与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的两股民族运动潮流汇合起来，把民族运动推进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章开沅指出：

应该充分重视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民族运动这一客观事实。作为民族运动,特别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具有自己的若干的历史特点。其一,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样是历史的主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主题。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常常是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并且通过民族战争获得新的觉醒。因此,对民族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应该给以科学的评价,不能只看见失败的结局而忽视其含蕴的进步因素,更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历史前进的途程之外。我认为,中国近代的基本线索,必须能够概括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历次民族战争的实质,任何把民族战争排除在外的基本线索必然是忽视了中国近代史的这一部分重要内容。其二,还应该看到,民族运动本身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民族战争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其它方面。只要是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种种作为,诸如兴办企业、发展教育以至革新、革命等等,都构成近代民族运动的历史内容。同时,民族运动的参加成分又极为广泛而驳杂。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各个阶级、阶层、政派、集团(除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成分以外),都会带着各自不同的动机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投入运动,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运动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它的前一阶段(1900年以前),由于新的经济、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发展极不充分,阶级关系和政治营垒的界限很不清晰,我们不能以尔后比较明朗的阶级分野和政治派别为依据来推论当时的人物和事件。譬如,早期的维新人物大多曾经厕身洋务阵营,官督商办企业包含着民族资本主义因素和发展趋向,有的屠杀起义农民的将领在民族战争中成为保家卫土的英雄等等。即使像义和团那样落后而又庞杂的运动,我们也需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社会环境出发,细心辨别其合理和正义的性质,并且从历史全局论断其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它有王公贵族混杂其间并且排斥先进事物就任意贬

低以至否定。其三,由于当时国内也存在着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运动也包含着被统治民族逐步觉醒并反对统治民族这方面的内容,而“反满”即其集中反映。但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相比较,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从属的课题。清朝之所以受到人民大众的反对,主要还是由于它代表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实行残暴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且日益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说到底,“反满”志士也是围绕着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以抗御帝国主义这个总题目做文章。把清朝当作“洋人的朝廷”来反对,革命派即抛开“反满”旗帜,转而提倡五族共和,这说明他们对于民族运动的内外主次关系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从民族运动的角度看“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可以把这八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潮”,即以1900年为界标,把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在第二阶段又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所谓高涨,不仅指参加人数的众多,而且指近代民族形成和觉醒的程度,只是后者的差异显示了三次高潮的不同层次。民族运动的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整体态势,是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兴起与低落而自然形成的波涛式曲线,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对于章开沅的“民族运动”说,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张耀美就撰文指出:

有的论者将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斗争都包括在民族运动中,主张以民族运动为主要线索,将近代八十年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高潮”。以民族运动为主要线索,它的优点是突出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将各类斗争形式都包括在内,内容比较全面。但全面的缺点则是缺乏重心,没有指出国内阶级斗争和单纯民族斗争分

离的状况下,何者对推动社会前进发展起着直接的主要作用。而且由于在概括为民族运动的各种斗争形式中,其中包括着清朝政府领导的民族战争。如果笼统地提以民族运动为主要线索,不指明哪一种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则势必将领导民族战争的清政府,也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再者,以此为线索叙述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高潮”,与原来的“三大高潮”说,并无原则的区别,只是把“革命高潮”改为“民族运动高涨”,而“革命”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区别只是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使用“革命”一词。其结果,中国近代史仍然只能是革命斗争史或民族解放运动史,而不是“通史”。历史的内容也仍然不能摆脱“三大高潮”、“八件大事”的框架。(《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 四、“两个过程”说

毛泽东在1939年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按:系戊戌变法之误)、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sup>[15]</sup>这里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中国近代史学界把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概括为“两个过程”论。很多学者把“两个过程”看成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高度概括。荣孟源曾撰文指出:“这两个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结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每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两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中国近代工业的

发生和发展,近代商业、银行、交通各业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农村中的经济变化都是这两个过程中的环节。文化教育事业的变化,清末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各种斗争,也都是这两个过程中的环节。这两个过程是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过程的变化总是相应另一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两个过程。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了,这两个过程也就结束了。只要谈起中国近代史,就不能离开这两个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百一十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变化,都和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这两个过程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而又相互影响。”“总之,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两个过程”<sup>[16]</sup>。张海鹏也撰写了《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等文章,认为毛泽东“两个过程”的论断,“实际上勾划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过程的原则论述,或者把它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张海鹏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概括有好几处。上面那一大段引文是最重要的一处,也是最完整的一处。它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概括,也是完整的概括。既然是概括,就只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特点和过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巨细靡遗、兼收并蓄。那样的任务,应由一部长篇巨制的中国近代通史来完成,不是理论概括所能承担的。”<sup>[17]</sup>张海鹏还对毛泽东关于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概括进行了分析,从而进一步阐明“两个过程”论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他指出:

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历史经验,毛泽东有时候从某一个侧面来概述中国近代史,以便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特点和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了说明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论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

近代史。”根据这里对中国近代史的概括,我们不能以为中国近代史只有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一方面,而应当把它包括在前述“两个过程”的第一个过程中,是对第一个过程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而不是相反或者矛盾。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发展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中,也经常谈到。这是当然的。可见,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也不应该被忽略。有时候,毛泽东又从另一个侧面来概括中国近代史。为了驳斥美帝国主义关于中国发生革命的反革命理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又说,“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这又是一个概括。我们当然不能以为只有这些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而应当把它理解为对前述“两个过程”中第二个过程的补充和说明。“两个过程”论只是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我们在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只能以它为指导,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近代史上还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甚至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都是近代史的重要内容,都是近代史研究的对象,都是撰述近代历史时应着重说明的问题。但是应当承认,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用它们来冲淡或者代替“两个过程”论是不妥当的。由此可见,“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既然“两个过程”论是一个科学概括,既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以这一科学概括作为依据的,那么用这个理论来指导近代史研究,当然正是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很显然,如果“摆

脱”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过程”，按另外的意见来撰写近代历史，就会脱离历史的主要内容，不能说明历史的基本的、本质的特点，就会与近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大相径庭。（《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张海鹏不同意有些学者“把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概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和“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的观点。他对这一观点提出三个问题并作解答，从而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三个问题是：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第二，对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运动，究竟如何评价？第三，怎样使中国走上近代工业化道路？对此张海鹏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概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是回避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提法。在中国，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倒封建主义统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要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欠妥的，它有意无意抹煞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根本任务。不能主观主义地臆想出一条道路来代替已经由历史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道路。

第二，由于一些同志从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出发，认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因而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是三次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运动。按这种说法，洋务运动也成了进步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分歧在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上。对此，张海鹏认为，洋务企业多少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洋务运动发展的结



果,在客观上也多少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作用,有一定的意义。以往有的研究者把洋务运动的反动作用说得绝对了,也是欠妥当的。但是,是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切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是进步的呢?这需要作出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第三,中国近代需要工业化即需要实现资本主义化,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研究者之间产生了分歧。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概念上来争论,而要看事实。历史事实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中国发展了一些工业,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官僚资本主义工业,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始终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但是,中国人民却进行了百余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说,“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如果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这就未免把中国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提到了一个不应有的高度。历史已经证明,不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救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救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指导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旗帜,推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发展,才使中国具备了成

为工业国的条件和可能。这当然不是说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都搞错了,不是的。那些终生真诚地从事于实业建设、科学活动、教育事业的先贤们,都曾经为振兴祖国尽到了一份责任。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不能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只靠工业、科学、教育事业是救不了中国的。<sup>[18]</sup>

对于张海鹏的上述观点,张耀美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张文”(指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一文,下同)把有些论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理解为只是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后,以此与张海鹏所强调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观点对立起来,看成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两种对立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张耀美尤其强调,走资本主义道路讲的是社会发展方向,或曰目的、前途,而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则是指的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不是对立的。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只能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道路”问题上分歧的实质并不是有人要“抹煞”或“模糊”反帝反封建革命,而是在于是否承认近代中国存在一个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是否承认当时中国社会的惟一出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耀美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分析和批评了张海鹏的观点,并撰文指出:

“张文”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从整篇文章来看,显然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张文”在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时,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地提出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只是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明确提“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张文”不认为近代中国存在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趋向,近代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只是这些论者“主观主义臆想出来的”。“张文”持这种看法是有原因的。过去有些论者研究近代史,只讲革命不

讲革命的目的,认为革命就是一切,阶级斗争就是一切。至于革命的目的,革命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则是不屑顾及的。其次,近代中国确实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时期,没有能够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能够走通。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结局,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这种历史事实容易使人觉得近代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强调或肯定“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被认为是违背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结论。“张文”反复引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两篇著作,来证明他的观点。然而他却忽视了这两篇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国际国内的条件,决定他的前途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国际条件主要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国内条件主要是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通过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下,才“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然而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不具备上述国际国内条件,社会主义还没有提到历史的日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除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共和国而斗争”之外,是没有其它道路可走的。诚然,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证明了结论。但这是我们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进行的总结。当时先进的人们并不知道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可是,面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要挽救民族危亡,自强图存,只有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改变政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进步事业,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反之,在那样的历史关头,如果像封建顽固派那样,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才是违背历史客观进程的、错误的、反动的行为,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结论。在近代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必由之路,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甚至用鲜血和生命铺筑的路,这是客

观存在的,不是谁主观虚构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无论何人,只要为这条道路铺基垫石,哪怕是在最初阶段,不自觉地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航道,都应该历史地给予肯定。而且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斗争,终于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体,为后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其意义和作用不应该低估。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哪些人为开拓这条道路,作出了自己历史的贡献。(《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与张海鹏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戚其章认为“两个过程”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细读毛泽东的原文,便不难发现:如果把它归结为“两个过程”,并且跟“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看成为一回事,那是完全不恰当的:

首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用两个短语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但在这两个短语之间,是用“也就是”来连接的。显而易见,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同一的。他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把这段话理解为“两个过程”,不仅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也完全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原意。

其次,过程亦即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既规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也规定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其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多次奋起斗争,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从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形

成原因;从后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再次,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二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这也是有欠考虑的。因为这里所说的“过程”与“基本线索”,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把两者混为一谈,势必会引起混乱。试想:如果说“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话,那末,其中一个“过程”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一个“过程”是中国人民的反抗,岂不是等于承认中国近代史有两条基本线索了吗?主张“两个过程”论的同志,有的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疏失,于是又特别补充解释说:“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该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谢本书:《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历史发展的主线》,《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乍看起来,此说似乎颇有道理,然而用于分析历史实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若照上述原则推论,则“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应该最能准确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了。而实际上,坚持“两个过程”论的同志,却是主要用“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原则和实际相脱离,岂非自相矛盾。可见,把所谓“两个过程”和“基本线索”当成一回事,是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的。

末了,有的论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我们在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只能以它为指导”,“如果‘摆脱’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过程’,按另外的意见撰写近代历史,就脱离历史的主要内容,不能说明历史的基本的、本质的特点,就会与近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大相径庭。”这种说法,起码是非常片面的。必须看到,前引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只是对近代中

国历史过程的一种概括。例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又一种概括。两种概括,其着眼点迥然不同:前者侧重于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后者侧重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其前者而弃其后者,并把前者看成为惟一的“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显然是颇成问题的。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要造成什么结果呢?这就涉及到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恩格斯说得好:“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致爱德华·伯恩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很显然,必须看到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才能切实地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前期,革命的前途就是发展资本主义。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前途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离开了近代中国革命前途和革命任务,又怎么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呢?(《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戚其章认为,根据毛泽东的那段话,是不能得出“两个过程”的结论的。说所谓“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不能成立的。

在80年代末,张海鹏继续发表文章(如《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第3期等等)来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理论。并进一步指出:有的论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主要应该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由于提出这种见解的同志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时,回避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中国似乎可以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需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就不能不涉及到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近代中国那样

的特殊环境下,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努力这样尝试过,都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了要救中国,必须革命,必须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近代中国历史上,抛开反帝反封建,抛开民族独立,仅仅强调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可行的吗?几个世代的中国人都做过那样的富强梦,中国并没有富强起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sup>[19]</sup>

讨论仍在继续,有些学者继续提出商榷意见。宋德华认为:不应该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概括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两个过程”论,而应说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概括为“两个过程”论,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sup>[20]</sup>。宋德华对张海鹏的“两个过程”说提出了两点不同的看法。

第一点,认为毛泽东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一段话概括出来的。这段话的确讲了两个“过程”,也的确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论断,但它并不是集中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后所作的基本结论,不是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而提出来的。

从原文看,两个“过程”虽然同时提到,其内容却是在两章中分别论述的,有着特定的范围和角度。第一个“过程”见于原文第一章“中国社会”的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具体叙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十个方面的情形,而这些内容只占第三节的一部分。……第二个“过程”则见于原文第二章“中国革命”的第一节,此节的标题是“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关于这一“过程”的内容,除了本文前引文字外,原文中还这样写道:“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又说:“中国人民的民

族革命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很清楚,第二个“过程”主要讲的是近代民族革命史(在原文中,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时,总是包括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基本任务,因此不可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二者截然分开,但毛泽东同志论述时又的确是有重点有主次的,讲两个“过程”时就明显是突出“民族革命斗争”)。讲中国近代史当然离不开民族革命史,但中国近代史又不能等同于民族革命史。可见,从具体内容看,两个“过程”都既不是专讲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也不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进行概括。(《“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

第二点,仅用“两个过程”论概括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是有局限性的。“两个过程”虽然不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概括,但它能不能作基本线索的内容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可是,若要用“两个过程”论来概括和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一切重要内容,或认为除了“两个过程”论之外,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便不能有其他内容、其他提法、其他角度,则难免有失偏颇。

“两个过程”在原文中主要是讲民族革命史(前已论明),按论者的发挥至多也只是讲革命史(包括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史虽然可以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之一,是近代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但毕竟不能与近代史整体相等同。近代史除了有侵略与反侵略、封建统治与反封建斗争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比如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演变,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等等。这些固然不能离开革命史的内容而孤立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当作革命史的附属物。事实上,如果不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革命史本身也难以得到科学的说明。因此,“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只是着重贯穿民族革命史或革命



史的基本线索(即使如此,“两个过程”的提法也还需要斟酌,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体现侵略与反侵略等作为历史过程的前后变化),而对近代史其他一些重要内容就很难贯穿起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摆脱”“两个过程”。“两个过程”是基本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写中国近代史,就不可能不写到它(当然不会只有一种写法),想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问题在于,是不是只能以“两个过程”论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内容,同时也需要在基本线索中增添其他重要内容,并且还需要具有更高概括性、更大涵盖性的基本线索来贯穿近代史,写出更加恢宏、更加精审、更加科学的历史著作。(《“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

## 五、“双线”说与“三个阶梯”说

“双线”说和“三个阶梯”说都是戚其章提出来的。1983年,戚其章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了《确定基本线索的依据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一文,后来人们把戚其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基本线索的观点概括为“双线”说<sup>[21]</sup>。1985年戚其章又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自己提出了“三个阶梯”的基本线索。前后两年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对于基本线索的认识是有些变化的。

戚其章认为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依据来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能说不对,但未免失之笼统,也很难把握。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为依据来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固然可匡正上说之不足,但未免失之偏颇,势必要忽视农民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戚其章提出只有对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做统一的考察,才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中国近代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就决定了它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对于这两个敌人,又不可等同对待。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帝国主义变成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于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诸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而推翻帝国主义也就成为革命的最主要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涉及革命的前途,这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在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就有了两条依据:第一条,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里之所以只提反对帝国主义,乃是为了抓住问题的关键,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反对封建主义,因为二者是互相关联的。第二条,是发展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会看不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对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将无法切实地了解。当然,这两条依据要结合起来看,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sup>[22]</sup>根据以上所述,戚其章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划分为三段:

第一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鸦片战争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使本来已经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像马克思所说:“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太平天国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的封建统治,但也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然而在它的领袖人物当中,有的却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并表现出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向。这是由于太平天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一次农民战争,在客观上必然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是揭开了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第二段: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失败后,民族矛盾由于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而逐步上升。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便以“自强”为其重要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帝国主

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洋务运动是由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地主官僚发动和领导的。洋务运动的实施方法,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旧的生产力,不但不要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且仍然要固守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一方面由于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则由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便不能不宣告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也就是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标志。但是,洋务运动在当时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洋务运动采用机器生产和兴办近代企业,这便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自己的起点。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学习西方的运动。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人民的眼界打开了,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尽在船坚炮利”,而是中国“旧法之不足持”,这便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运动准备了条件。因此,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和准备阶段。

第三段: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甲午战争的失败,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灭洋”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几乎是同时兴起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推行的变法运动,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使中国富强,以挽救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由于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变法运动很快失败了。随之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它虽然最后也不能不归于失败,但却沉重地打击并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大大加速了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于是,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终于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就是“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了。(《基本线索的依据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根据以上的分析,戚其章认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连续递进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是戚其章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一次表述。两年后,戚其章又提出了“三个阶梯”的看法。他指出:

对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界说,必须要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实际,使之成为一个便于掌握的尺度。不宜空泛地谈“阶级斗争的表现”,在“阶级斗争”之前加上某些限制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考虑基本线索时,一定要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国内阶级斗争。这些斗争,犹如一座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这样,领导这些斗争的阶级,不仅它所发动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而且它本身就“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成为“时代的中心”。否则,领导运动的阶级本身不能“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它所领导的运动又怎么能够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前途呢?如前所述,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就是发展资本主义,那末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国内阶级斗争来逐步实现呢?我认为,它不仅仅表现为改变经济基础的斗争,而且还表现为改革上层建筑的斗争。正如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也指出: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显而易见,这些论述对于中国近代史是适用的。因此,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

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根据上面的分析,戚其章认为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反映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够体现基本线索。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

## 六、“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

苏双碧 1984 年在《近代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他对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看法。曾景忠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一文中把苏双碧的观点称作“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也有将其称作“双线”说的<sup>[23]</sup>。

苏双碧在文章中总结了以往四种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认为各种意见都能谈出一些道理,也都能从近代历史资料 and 思想资料中找到根据。但这些见解的歧异,却绝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涉及到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因为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革命任务、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苏双碧提出,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必须从认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入手,实事求是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任务,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作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掣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状况;以及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发生、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等等。因此,在考虑中国近代史的线索时,就要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贯穿着这个任务始终的,是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其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

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是争取独立的反帝爱国斗争。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立,人民群众反击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二是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所作的斗争,这是在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两个方面进行的。这就要认真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上述分析,苏双碧指出: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是制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社会性质的。那时,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间包括清封建王朝中的一些爱国之士、农民领袖、进步的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并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这个过程就构成了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当中,也包括在经济上的反掠夺、剥削,以及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内容。如是这样,我认为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戊戌维新时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五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前八十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标志。至于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空间,正是酝酿和准备这些历史事件的时间,是可以纳入其历史发展线索之中的。(《关于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在八十年的历史中,如果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看,清楚地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限制,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阶级,不能独立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便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旧民主革命也就转变为新民主革命了。<sup>[24]</sup>

## 七、“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

“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是徐泰来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提法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又包括发展资本主义。所谓的近代化是个什么概念呢?徐泰来认为,近代是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断代,我们将人类过去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除了表示人类过去离人类今天的远近,也用以区别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和阶段。近代比中世纪高,现代比近代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由内部的主动因素和外部因素决定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程度还严重地影响到1949年以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徐泰来进一步指出:

以往,学者们只注意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个方面,把中国的近代化都赋予半殖民地性质,而完全忽视了中国社会内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而形成的近代化的进步潮流。这股潮流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抗拒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近代化,但不要殖民地化;而外国列强则要使中国殖民地化,而不容许中国独立的近代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核心内容。这个矛盾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主要内容。独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个主要矛盾交合在一起。搞不搞资本主义近代化,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近代化要不要独立地搞,表现的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反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迫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明显的历史事件,是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反映中国独立地进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强烈要求的历史事件是一系列反侵略战争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

命、五四运动等。同是一场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对于侵略者,是要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对于中国,则是反半殖民地化,是要维护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这些大事件,不能说哪个只反帝,哪个只反封建,都有反帝、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内容;只是方式、表现、侧重面不同,都是为了中国要独立地进行资本主义近代化这一历史的主题。但是,我们不能将独立的近代化同半殖民地化混淆,应内外有别。它们是近代中国两股截然区分的历史流。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它们之间固然有相同之处,即都有近代化的内容,所以互相利用。但最不可忽视的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要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一个是要使你沦为半殖民地,所以互相斗争。这种斗争即使在互相利用中也不断地进行。这两种历史流的矛盾贯串中国近代历史的始终。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就是此种“两化”的过程。但我不把半殖民地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因为它是外加于中国的,是历史的倒退,而不是历史的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则是内在的、是进步的,才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牵涉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看法问题。中国近代史,究竟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历史的倒退?我曾在《也评洋务运动》一文里提出过这个问题,认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奴役,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这是历史的倒退。但是,一个腐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发展,从社会发展规律而言,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前进。”(《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当时的回答是,既倒退了,又前进了。用李时岳和胡滨二位教授的话来说,是既“向下沉沦”,又“向上发展”了。就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说究竟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如果用一条坐标纸上的线表示中国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社会发展情形,近代社会这一段的线条如何作呢?是向下呢?还是向上呢?我认为是向上的。整个近代史是前进的。理由是:一、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虽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阻碍,发展比较缓慢,但由于中华民族奋发努力和斗争,资本主义近代化一直是向上发展的。它创造了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发



展所不能创造的文明。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开始失去独立,但也由于中华民族不断地进行斗争,并没有完全失去独立,没有变成殖民地。所以,中国近代历史整体上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徐泰来进一步强调,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提法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又包括发展资本主义。只有把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才能把中国近代史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根据这样一条基本线索,徐泰来把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二三十年左右。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前夕。第二个时期,从洋务运动至康有为公车上书前夕。第三个时期,从康有为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sup>[25]</sup>

## 八、“新三次革命高潮”说

这是陈旭麓 1988 年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提出来的。文章对什么是历史线索作了界定,认为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串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等等皆是”。50 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陈旭麓认为,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由于资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范围及近代的含义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就

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陈旭麓主张把 1840 年至 1949 年这 110 年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 110 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社会形态,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但这样,看不出变革的性质,也容易流于简单化。所以陈旭麓强调,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作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之新。据此,陈旭麓认为,19 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形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在上述这些高潮过去之后,到了 20 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三次革命高潮。这三次革命高潮应该是: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 1927 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 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陈旭麓分析说:

这个三次高潮,总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后面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出现,具体的革命对象则是三个层次,从清朝的封建帝制统治到封建性仍占优势的北洋军阀统治,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它们身上互相消长,那是说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它们身上一个比一个增长,三十年代(抗战前夕)的中国已成畸形的资本主义架步。

革命队伍从领导层到基础革命力量也经历了三个层次,有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会党和新军力量,再由国共合作特别是共产党人动员和组织的工农群众,最后有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全民力量。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次比一次深入。革命对象和革命队伍各自的三个层次,说明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两役,而必然是依次推进的三段式——三次高潮。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只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这种经济基础的由来,以及革命面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找到答案。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而袁世凯取代了清朝也取代了革命,造成了尔后 15 年的北洋军阀政权;蒋介石比袁世凯有点不同,他从革命内部夺取军、政大权,鲸吞革命果实,造成了尔后 22 年的南京政权。这不只是袁世凯、蒋介石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更重要的是历史的选择,历史暂时地选择了他们。所谓选择,是就社会的承受而言,看他能承受什么,承受的程度又怎样?革命者的坚强与否、正确与否,常受到承受力的检验,也就包含在历史的选择之中。在同敌对势力的反复较量中,新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为了记述自己的战斗历程,标示前后战斗的连续关系,常按序排列,如辛亥革命之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首功,继起的 1913 年赣宁之役称为第二次革命,1915—1916 年的护国战争称为第三次革命,也偶有称 1917 年的护法运动为第四次革命的。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程中,我们更明确地以 1926—1927 年的大革命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 年的十年内战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 年的全国解放战争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旧民主革命的这两个战斗序列,分别记在各自的史册,也是各种近现代史著的依据。这两个战斗序列并不都是革命高潮,前者是每况愈下,只有辛亥革命是革命高潮,其他都是革命退潮后的反击和苦斗;后者自“五四”以来表现为方兴之势,胜利中有挫折,有过十年内战时期的低潮,低潮的前后却是两次高潮,最后一次高潮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胜利。新旧民主革命由于时势的先后、性质的区分,过去各记一本账,排不到一起。

其实,110年的近代,虽有新旧民主革命的区分,但就社会形态和革命任务考察,它不只是新旧民主革命相衔接,而且还是一个首尾连贯的整体,不同时期的革命高潮与低潮,都是这个整体连锁的环节,所以形成了辛亥革命、大革命(国民革命)、解放战争这样三次革命高潮。(《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陈旭麓最后指出,这个三次革命高潮,集中发生于近代社会的最后五十年,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撞击、搏斗、呼号而来。因为近代中国是古今中外的汇合点,它的高潮只有在民族觉醒、革命力量成熟的20世纪初期才能出现,此前的斗争都是为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革命高潮的准备。三次高潮的起伏,又是敌我力量严酷较量及其消长的历程,恰如毛泽东指出的,就是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历程。他还从社会力量消长的关系曾经论述“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中,列举了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打败了清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败了袁世凯留下的军阀系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没有明言三次革命高潮,其实他概括的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三次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样的三次革命高潮。<sup>[26]</sup>

夏东元认为陈旭麓的观点有欠妥当,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的大革命和解放战争新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则仅限于革命史的范畴,在110年近代历史的长河中,显然不能仅限于这样三次革命高潮”。<sup>[27]</sup>

## 九、“两段论”说

这是夏东元对近代史体系提出的一种看法。他在1989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

线》一文,文章指出:“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 110 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我将姑且名之为‘两段论’吧!”这段论述是根据他“‘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 110 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这一主张而进一步揭示的。它包含如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sup>[28]</sup>:

其一,110 年的近代史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夏东元认为,110 年的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或曰基本线索应该是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酝酿时期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前这一段时间。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取代了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主导地位。外国侵略者利用不平等条约,强行把中国拖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使中国个体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因而形成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已经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生时期是指 60 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不管洋务派是否意识到洋务运动促使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事实上洋务军用工业企业已经具有部分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与人民密切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则明显具备资本主义的性质,军用工业与民用企业之间又存在经济规律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夏东元认为洋务运动是适逢其会,掀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发展时期是指洋务运动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戊戌变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中法战争中国能达到军事上不败并略胜一筹,表明洋务运动已初见成效。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发展资本主

义以至富强就成为中国人明确追求的目标。尽管外国侵略日益加剧,专制政治日趋腐败,但是中国资本主义以其天然的反抗性格,顽强地向前发展。而后一阶段,则是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夏东元在这里强调,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中,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外”,其余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企业,都没有什么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之别,统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

其二,不应忽视“两个过程”。帝国主义为了奴役中国人民,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政体,也不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地反帝反封建,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110年的近代历史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过程。如果忽视了这两个过程,对110年近代历史的表述就不够完整。所以夏东元一直强调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来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

其三,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110年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实现独立、民主与反对实现独立、民主的斗争的较量,这种较量归根结底是发展和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这固然是由于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也与每一次民主运动的推动有关。然而民主制度直至1949年前,未曾站稳脚跟,封建式的专制乃至独裁,从清王朝到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顽强地压制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两种力量的斗争较量,时起时伏,时激时缓,波浪式地前进着,这就规定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时而发展速度快一些,时而慢一些、甚至停滞不前,偶尔还出现倒退的“低谷”,也呈现出波浪式的前进形态。

其四,戊戌变法是110年近代历史的分段线:

之所以要以 1898 年戊戌变法为中国 110 年近代史的分段线,是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缘故。前 58 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初步有所发展的时期,后 52 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实行;没有民主政治的实现,就难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戊戌维新正是首次将封建专制改革为民主立宪制置于实践日程的运动。此后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次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很大程度都是继续完成戊戌变法所未完成的奋斗目标。(《110 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戊戌变法的伟大意义在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教的改革,都是在“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制度局总其纲”的前提下进行的。戊戌变法不是枝枝节节的,而是有总体的设计,其改革的核心是设议院、定宪法、行民主。人们常常谈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其实启蒙的中心主要“启”的是关于民主意识的“蒙”。如果说前 58 年的启蒙是“启”的关于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蒙”的话,那么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启蒙,就是“启”的政治上民主意识的“蒙”。前者的启蒙是后者启蒙的基础和前提,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戊戌变法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为实现全面资本主义化也即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开端。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 1949 年解放战争胜利的 52 年间的一切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与独立这一步,都是为完成戊戌变法开其端而未能完成的事业与任务。

夏东元提出过 110 年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应该是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而我们在标题上却把他对基本线索的看法称之为“两段论”说,这主要因为:1、夏东元的几次提法不尽相同。有时把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称为基本线索或一条主线,有时把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

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这些提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不完全统一的。2、夏东元对中国近代史体系认识的最大特点是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把中国近代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特点是与引进和学习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后一阶段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与建立民主政治相结合的。3、“两段论”是夏东元自己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标题上使用了“两段论”说。

夏东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争论意见。对夏东元的上述主要观点,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戊戌变法“是为实现全面资本主义化也即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开端。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2年间的一切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和独立这一步”等,胡维革等人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

一、资本主义并不是贯穿110年中国近代史始终的“一条主线”。胡维革等提出了三点看法:

首先,“一条主线”无疑要包括1840到1860年。但这20年,资本主义还仅仅处于酝酿时期。处于酝酿时期的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未知数,它并不能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早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地中海沿岸早在13、14世纪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无人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一条主线”并不能统制鸦片战争后的头20年。

其次,不同意夏东元解除了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认为从1860到1895年间,中国有官僚资本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三种经济形式。由于这三种经济形式的封建性、买办性和资本主义性的程度不同,因而它们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不同。军用工业在本质上是要维护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民用工业是要维护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而民用资本企业则是要争取资本主义的前途。可见,这一时期,从顽石缝里生长出来的已经



被扭曲变形了的资本主义,并未在整体上显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定势”,因而也称不上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最后,不同意夏东元对1927到1949年间,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轻视。夏东元认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定名之日,也就是解放战争‘外线出击’进行大反攻之时,这种垄断资本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告消灭。”因此,它在近代史上无足轻重。而胡维革等认为,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很快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这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根据这样的分析,胡维革等认为,被夏东元特殊强调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从1927到1949年间,与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相比,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它也构不成“一条主线”。

根据以上的分析,胡维革等认为,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并不能作为贯穿中国近代史始终的“一条主线”。

二、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并不规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胡维革作了如下的论证:

甲午战争以后的三四年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原因主要有:1、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大量“剩余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扩大了,这给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尽管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是,“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2、清政府面对外国资本大量倾入的压力,被迫对民族资本作出一定让步。1895年6月5日,清政

府以“电旨”方式“飭令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这项被迫而采取的措施,也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3、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刺激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手段,因此,民间要求设厂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人并由此成了实业家。可见,这次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小小浪潮,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也谈11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紧接着胡维革又使用夏东元引用的1920年和1933年这两个时期较大的投资总额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两个时期正是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初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既然经济发展和政治黑暗反差如此之大,又怎么能说在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同趋同步呢?因此,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并不规定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

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所争取的民主本质不同。这是针对夏东元“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2年间的一切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与独立这一步”的观点而提出的意见,胡维革指出:

戊戌变法的核心是设议院、定宪法、行民主,最终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如果说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是对戊戌变法所追求的民主的发展,那尚珠联璧合,但如果说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也是对戊戌变法所追求的民主的发展,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

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所争取的民主根本不同。(《也谈 110 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91 年第 3 期)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所追求的民主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形式相同,内容根本不同。胡维革认为夏东元以戊戌变法为界标,把 110 年的近代史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期”和“政治期”的“两段论”,实质是既超前又滞后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的作用。

胡维革等在与夏东元商榷的同时,对 110 年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纵向立体的考察。发现中国近代社会并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而只有一条由三个不同线段连接而成的主线。这三个不同线段就形成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从 1840 到 1895 年,是封建主义延续和衰落的时期。第二时期,从 1895 到 1927 年,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停滞的时期。第三时期,从 1927 到 1949 年,是新民主主义产生、发展和胜利的时期。这里所说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都不是单纯的政治范畴、经济范畴或文化范畴,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在内的综合范畴。<sup>[29]</sup>

胡维革等注意到了中国近代社会不同时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并以此来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这是以整体与综合的眼光考察历史的反映,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其实,胡维革等谈到了三条脉络(政治、经济、文化),这三条脉络又分别分为三个阶段(断点在 1895 和 1927 年),那么,这三条脉络的三个不同阶段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作者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本章重点介绍了九个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观点,说是重点,是因为二十余年来,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学者很多,

论文也很多。在这其中,上述九个观点引起的争论比较集中,所以影响也大一些。有的学者在分析这些观点时指出,它们之间各自的理由和论证并非都绝对地对立,有些观点是互为参差、互为补充的,呈现出错综交叉之势。相对来说,“三次革命高潮”说与“四个阶梯”说是争论中的两极。“民族运动”说的观点独张一帜,与前两者呈三足鼎立之势。“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和“两个过程”说是与“三次革命高潮”说相连的<sup>[30]</sup>。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论题,从新中国建立初开始到20世纪末一直争论不休(文化大革命前后中止过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甚至是整个中国史学界的较为突出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争论的时间较长,论述较多,所以论述的角度是宽泛的,也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论深度。对此,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通过深入研究以往的学术观点,如何在更高层次上思考和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是新世纪摆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也是建立中国近代史新体系以及新格局的首要任务。

#### 注 释: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2]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4]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6]戚其章:《确定基本线索的依据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7]陈月清:《要注意经济政治的综合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3期。

[8] 祁龙威:《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红旗》1982年第2期。

[9] 徐泰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

[10] 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1] 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14] 张耀美:《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5]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16] 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

[17]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8]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 张海鹏:《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第3期。

[20] 宋德华:《“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

[21] 《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引起的争论》,《北京日报》1984年9月3日。

[22] 戚其章:《确定基本线索的依据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23] 龚书铎、房德邻:《近代史总论》,《中国历史学年鉴》

[24] 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问题》,《光明日报》1983年11月9日。

[25] 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6]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7] 夏东元:《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1期。

[28] 主要观点来自夏东元的《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历史

教学问题》1989年第1期；《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9]胡维革、程舒伟：《也谈11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30]曾景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 第八章 | 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深入探讨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在 50 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发表文章阐述过自己的意见。但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重心是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和分期的标准问题,所以,对上下限问题讨论得很少,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论。80 年代以后,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进一步讨论,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中国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争论,成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 一、关于上限的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问题,国内外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见。有的国外学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位在宋代、明清之际,或者清朝康熙时代。这是个别外国学者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现象任意曲解,造成“近代史开端”的错觉。牟安世曾对国外学者的某些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观点进行了归纳,然后对其进行了批驳<sup>[1]</sup>。牟安世对国外学者的观点主要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17 世纪中叶说。持此说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近代

史的开端不能定位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避免同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时间相差太远。而应把明清之际或 1644 年前后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即“满洲人征服封建的明朝所统治的中国”的时间,“恰好与世界近代时期的开始——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相吻合”,即与“上起奠定欧洲资本主义胜利基础的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吻合,以便于“探讨世界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国历史。“这种分期无疑是作者们的成就,因为它的上限和下限是根据世界史发展的规律确定的”<sup>[2]</sup>。第二种,19 世纪初期说。新近译出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封面上标明“1800—1911”,以 18 世纪跨入 19 世纪的 1800 年为晚清即近代的界标,认为中国近代史“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即从 19 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sup>[3]</sup>。第三种,19 世纪 50 年代说。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它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定位在鸦片战争以前,而是定位在鸦片战争之后。认为“人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开始于太平天国革命”;因为在 19 世纪 50 年代爆发的这场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打算通过这样对“太平天国史的分期”,即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来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种新的分析”,并求得“一种新的理解”<sup>[4]</sup>。

牟安世也是从三个方面对上述三个观点进行评判的。首先,以上三种主张都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根本弱点,就是没有认清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和形成于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的统治,结束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上述三种看法都不妥当。按照前两种主张的定位时间,显然中国还没有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属于封建社会。按照后一种主张的定位时间,显然中国早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次,以上三种主张所提出的理由,虽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一般说来,却往往不免流于顾此失彼,显得不够充分。众所周知,西欧近代史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具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它的开始无论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不要中国近代社会需要在同时期产生。如果不考虑到这些特殊性和中国历史的具体实践,而是根据所谓“世界史发展的规律确定”它们在时间上的“吻合”,搞一刀切,削足适履,结果是会把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的”<sup>[5]</sup>。最后,上述三种主张虽说都不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但是他们却又提不出为大家所能基本接受的想法。以上三种主张的并存,反映出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许从反面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问题上,除了鸦片战争开端说以外,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并不因为它久已为人们所公认,而是因为它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牟安世是针对国外学者的某些主张来谈问题的。因为这些主张的确离题较远,容易辩驳,所以牟安世也未作长篇大论,只是简略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至于对于国内的学者,虽然大多数都认为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在 1839 年,1861 年,1905 年,1911 年。这些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

### 1. 1839 年上限说

1982 年 8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牟安世的专著《鸦片战争》。他在这本专著的“鸦片战争”这一前言的注释中指出:“鸦片战争爆发年代,在目前的历史书籍中有 1839 年和 1840 年两种提法;本稿根据 1839 年在广东已经爆发中英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及官涌之战等事实,采用前一种提法。”他还在第三章的开头又明确指出:“鸦片战争爆发于 1839 年 9 月 4 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九龙之战”<sup>[6]</sup>。对此,曾有学者撰文提出商榷意见:

关于鸦片战争开端的日期,史学界一般都把 1840 年 6 月英军舰抵华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牟著另持一说,认为鸦片战争从

9月4日的九龙之战就开始了。作者没有详细论证他的这个看法,只是引用了两个外国学者差不多同样的话来作注释。我们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经过周密准备、由国会批准正式发动侵略中国的殖民战争,它不是局部的武装冲突,而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而九龙之战是广州禁烟运动展开后,中英矛盾激化的产物,属于带一定偶发性的局部武装冲突,这个事件的挑起者是义律而不是英国政府。因此,我们认为,还是以由英国国会授权英国内阁派遣英军舰队抵华的时间,即1840年6月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为宜。(李少军、杨卫东:《读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福建论坛》1983年第6期)

牟安世为了回应上面的否定意见和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撰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辩。

首先,九龙之战到底是不是“带一定偶发性的局部武装冲突”。牟安世从英国侵略者在禁烟运动以前的武装挑衅,从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的战略思想和备战活动,从英军在九龙之战中的部署和战后的扩大事态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九龙之战不是“属于带一定偶发性的局部武装冲突”,而是必然要爆发的战争。并进而指出:

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武装冲突。主权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是国际战争,国内党派之间的武装冲突是国内战争;战争就是诉诸武力,并具有强迫战败者一方按照胜利者一方来行动的目的。”(《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1975年英文版,第2926页)因此,就鸦片战争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来说,它就是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不管它是“局部的”还是非局部的。至于九龙之战,如果就英方战后的扩大事态因而引起穿鼻和官涌之战来说,它便是局部的。如果我们对“局部”作如是解,那么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基本上都是由局部武装冲突开始的。对于我们来说,最切近的一个例子就是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它开端于7月7日的芦沟

桥事变的局部武装冲突;但我们却不能因其为局部武装冲突,而否认它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的开始。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9月4日九龙之战这一“局部的武装冲突”,就是1839年至1842年的三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开始。(《试析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及其上限》,《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其次,如何认识义律挑起战争和英国国会批准正式发动战争这一问题。论者不同意九龙之战是鸦片战争开端的理由之二是:“这个事件的挑起者是义律而不是英国政府”;并且,它爆发在“由英国国会授权英国内阁派遣英军舰队抵华的时间”之前,而鸦片战争则是需要“由国会批准正式发动侵略”的。牟安世认为这是由两种误解而产生的:

第一种误解是把义律和英国政府割裂开来看待了。义律是在1836年6月被任命为英国第四任驻华总监督的,如同第一任总监督律劳卑一样,他是一个代表英王使节身份的人物,是代表英国政府的。……义律系“英国国王差在中国之代理人”。九龙之战实质上就是义律代表英国政府挑起的“侵略中国的殖民战争”。第二种误解是来自英国政府本身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没有明显的分开这一特点上。英国首相本人是英国国会中的一个成员,所有的内阁大臣也都是两党中的成员,以此行政部门实际上好像成了立法部门的一个委员会。从历史上来看,英国国会分为上院和下院,而权在下院;但下院的大权不在别的方面,主要还在于它对政府的财政上的控制。1840年4月3日召开的英国国会原是讨论和表决对华战争的军费的,4月7日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军费案。其实,英政府对远征军的训令早在1840年2月便已颁发;而前首相皮尔爵士也曾在国会中提出过战争一经宣布,政府是否向国会提出咨文的质询。舰队的派遣,也不必国会授权。否则,军事训令便应当在4月7日以后,而所谓的咨文也就是不必要的了。(《试析中国近代受到开始及其上限》,《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第三,如何看待史学界一般都把1840年6月英军舰队抵华作为鸦片战争开始的问题。需要分析这种一般看法是怎样形成的。此事得追溯到1840年8月的中英大沽会谈。它至少可以说明,以道光帝、穆彰阿和琦善等人为首的清政府,出于所谓“羁縻”政策的需要,是不承认林则徐时期的鸦片战争的,即不承认九龙之战是鸦片战争的开始。如果道光帝不否认九龙之战是鸦片战争的开始,而是承认了中英两国早已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他有什么理由把林则徐在禁烟和抗战上的功劳转化为“过错”来治他的罪呢?他只能说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林则徐“操之过急”引发的。由于钦定的说法一直沿袭下来,所以成为史学界的一般看法。

牟安世以上的论辩,还是为了强调1839年为鸦片战争的开端。他还引证英国历史书基本上是以1839年作为中英两国鸦片战争的开端的,并以影响广泛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至于牟安世所谓史学界一般把1840年视为鸦片战争开端的形成问题,可备一说,有继续探索的余地。

此外,来新夏也依然坚持他在50年代就阐发的观点,提出“1839年的‘禁烟运动’开始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并认为,1839年和1840年这两个不同的开端年代,虽然只是一年之差,似乎无关宏旨,但前者表明中国人民是以英勇抗击侵略者为自己近代历史的开端。它标明中国近代史的光荣开始<sup>[7]</sup>。

对于牟安世和来新夏所持1839年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主张,徐立亭逐一进行了评判。

他不同意中英第一次武装冲突始于1839年9月4日的九龙之战,进而不同意牟安世的中国近代史开端说。他指出,据目前发现的史料记载来看,1839年5月24日,英船“赫鸠里”号船长巴里“下令开炮若干发”,打中了中国水师的船。这说明“九龙之战”不是英军侵华的第一枪。并进一步指出:

在中外历史上,确定重大历史时期的起点,都不是以战前的偷

袭和挑衅事件为开端。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日期为起点,以巴尔干战争为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为起点,却不以4月7日,意大利武装入侵阿尔巴尼亚为开端。中日甲午战争以1894年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为起点,以7月25日丰岛海战为序幕。中国抗日战争以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为起点,却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页)又说:“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0页)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时,应该遵循这个原则。(《评中国近代开端说》,《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

徐立亭也不同意来新夏的以1839年“禁烟运动”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说。认为如果从反对鸦片侵略的禁烟运动角度来看,清政府查禁鸦片并非始于1839年。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就颁布了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以后几代皇帝也多次发布禁绝鸦片的禁令。虽然禁烟的效果不显著,但是到了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鸦片泛滥的严重危害迫使清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了。1836年,在清朝高级官员之间展开的“弛禁”和“严禁”鸦片问题的大辩论,完全可以说是禁烟运动的起点。禁烟运动从1836年开始是不断深入,逐步展开的。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到了1838年,清政府的禁烟运动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徐立亭得出的结论是:

以上事实,使我们认识到,清朝道光年间的禁烟运动,是从1836年开始,到1839年达到“顶点”。这是自上而下的,逐步发展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反侵略正义斗争,不能仅仅看作是1839年在

广州发动的禁烟运动。因此,以 1839 年的禁烟运动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论据,在逻辑上、史实上难以说通。这条理由也就不攻自破了。(《评中国近代开端说》,《史学集刊》1991 年第 3 期)

从以上牟安世、来新夏和徐立亭的观点来看,虽然各持一说,也都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根据。但却看不出哪一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所以这仍然可以继续讨论。陈旭麓也对 1839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说提出了不同意见,坚持 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指出:

作为过渡社会形态的近代中国开始于 1840 年,我以为不是任何其他重要历史年份所能取代的。至于 1839 年英军已经在九龙口、穿鼻洋、官涌等处与清军接仗,鸦片战争应上推到这一年。我们应注意到这个事实,195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曾用黑体字标出“1839—1919”字样。这并不影响 1840 年的成说,因为被任命为英军侵华全权委员、兼英军远征军海陆联军总司令的懿律率领主力舰队来华,全力发动侵略战争是在这一年,前此还是小接触。(《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 2. 1861 年上限说

殷方勇和易行仲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应是 1861 年的辛酉政变,而不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因为,1840—1860 年的 20 年间,独立的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其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没有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侵略中国,在列强的支持下,清朝皇族中以奕䜣为首的亲西方势力勾结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恭亲王奕䜣被封为议政王,掌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殷方勇等把辛酉政变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主要因为:

一、辛酉政变确定了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统治政权,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起义,推行由封建官僚办洋务的洋务运动,对外则执行向列强退让妥协的外交政策,使中国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二、清王朝政权的性质由原来的封建政权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其国家统治形式也产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国家机构因素。1861年1月,清政府为了“洋务”而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专办外交,开展了一系列近代外交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同文馆;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兵工学校;还开始创办具有近代特征的海军和陆军。三、辛酉政变前,总摄朝政的是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大臣”。肃顺等人为了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不太驯服。辛酉政变后,议政王奕訢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因此,政府已丧失独立自主权。(《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争鸣》1990年第1期)

因此,殷方勇等人认为,以1861年辛酉政变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比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较为合适。

徐立亭对殷方勇等人的主张提出异议,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近代史范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如果认为1840—1861年间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徐立亭还强调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非说鸦片战争发生中国就完全“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如果将“起点”误认为是“形成”,或者将“形成”看作是“开端”,无论在事实上、思维逻辑上,都有首尾颠倒、自相矛盾之嫌。并进一步指出:

西方国家对清王朝的改造与冲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在外来侵略者的压力下,清朝政府出现了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妥协投降派,影响着清朝的对外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

时期又形成奕□、桂良、文祥等对外主和的“北京派”，与“赞襄政务”的“热河派”相对立。两派斗争的结局是1861年发生辛酉政变。“热河派”八大臣失败，“北京派”胜利。这是封建统治者之间权力的争夺。何况“赞襄政务”的八大臣摄政时间是短暂的，不能成为1840—1861年二十年间清朝对外政策的总代表。至于辛酉政变后清朝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只能说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继续，不是偶然的历史性转折。因此，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在辛酉政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难以成立。（《评中国近代开端说》，《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

几年后，刘光永发表文章，坚持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应在1861年。理由是：其一，中国社会从完整的封建主义时代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历史进程，是从1861年开始的。其标志是旨在引进西方近代大机器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其二，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中国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建立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其三，以1861年为“分水岭”，清政府的政治地位和政权性质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政府从此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政权地位，开始呈现半殖民地政权性质；中国社会也开始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不应断在1840年，而应断在20年后的1861年。<sup>[8]</sup>

### 3. 1905年上限说

高升斗曾撰文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与爆发，是世界近代史、也是每个国家近代史开始的极为重要的标志。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并不就是每个国家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这是清政府领导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却不是为了把封建的、处于中世纪状态的中国推向近代阶段。第二类如太平天国运动等，这是农民群众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太平天国



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反映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洪秀全的构想,不是要把中国从封建社会推向前进,而是要回复所谓的古代大同社会。太平天国运动仍然是旧式的农民战争。第三类如辛亥革命,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清王朝封建制度的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思想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确立。1905年,孙中山把资产阶级各革命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十六字纲领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阐述,是首次提出的、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所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才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sup>[9]</sup>高升斗进一步阐述说:

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要义是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和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的成立,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借鉴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决定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实行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和议会制。为了整肃吏治,借鉴了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为了保证官吏的素质,借鉴了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孙中山力图建立五权分立的民国政府。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社会状态向近代转折的分水岭。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才具有近代国家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是同盟会的成立》,《理论探讨》1988年第4期)

对“1905年上限说”提出异议的徐立亭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的标志应当是1894年底兴中会的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第一次揭示了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从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起点。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了高潮。1911年辛亥革命,标志着革命派领导的

革命达到最高点。由此可见,把革命的“成熟”和“高潮”误认为是革命的“起点”和“开端”,显然是不恰当的。徐立亭进一步反证说,如果“1905年开端说”成立的话,势必造成难以令人置信的后果。设想中国历史到1905年才进入近代社会,那么1840年至1905年长达60多年的历史属于什么社会性质呢?按照此说论者的观点,无疑属于封建社会。这样就势必掩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罪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会是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而是单纯的反封建斗争<sup>[10]</sup>。田毅鹏也与徐立亭的观点相似,认为,如果我们以1905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1840年至1905年长达60多年的中国社会应属于什么社会性质。同时,这样做也会抹煞辛亥革命前的民主革命准备阶段中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中国独立富强所作的努力,掩盖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过程,割断了近代中国历史连续的发展过程,难以真正深刻理解阐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sup>[11]</sup>。

#### 4. 1911年上限说

80年代有人提出以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此,陈旭麓批评说:近年也有从半封建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增长立论,认为要到辛亥革命才算得上进入近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熟后爆发出来的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阶段,不是近代社会的开端<sup>[12]</sup>。陈旭麓在这里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是这个过程成熟后的结果。

此后,唐建增坚持以1911年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否认中国历史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此,他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从数的概念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否是指当时中国一半是殖民地社会,一半是封建社会呢?事实上这个“半”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论者之间很难用二分之一来分开。第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种概念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的划分,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不能称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第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直保持着独立性。根据以上三点理由,唐建增认为中国不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作最后垂死挣扎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一直到1911年才寿终正寝。1911年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这个近代社会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理由是:第一,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政治上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立法制度的共和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封建帝制在中国已经彻底崩溃,意味着社会性质已经改变。第二,1911年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提出并制定了发展资本主义规模的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其计划,因而使中国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辛亥革命后,在思想文化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不再用旧的观念意识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建立了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伴随着“民主”与“科学”而来的是新的文化教育,即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正是由于以上变化,中国从此跨入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中国历史步入近代时期<sup>[13]</sup>。

以上介绍了几种重要的中国近代史上限说。另外,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史学界的一般看法,也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是:这一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大清帝国被拉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国从此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和附庸。陈旭麓有一段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它标示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它标示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显而易见的<sup>[14]</sup>。这段话仍然在强调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

重要意义。还有学者从近代中外关系的新变化的角度来认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重要意义。指出,鸦片战争在中国引起的变化,首先并直接表现在中外关系上,主要是:一、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二、中外关系开始具有一种新的性质。这两点合在一起使中外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即近代。鸦片战争首先成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开端,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sup>[15]</sup>。还有学者指认为鸦片战争实际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是英国资产阶级为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与日薄西山的封建主义的对垒。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前面,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很快败下阵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此为标志,古老的中国社会被迫开放五口,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标准、正常意义上的近代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里,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它的力量是软弱的,封建主义经济虽然被破坏,但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着显然的优势,显现出少有的复杂性。只是由于中国的国门已被打开,“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中国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因此,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他东方国家也应以西方列强对其发动侵略战争作为其近代史的开端。(田毅鹏:《关于近代史开端的几个理论问题》,《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不同意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有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悖于“近代”这一历史概念的科学含义。各民族、各国家的发展史,都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现代。每一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三种互相联系、明确而严格的含

义:一是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水平看,“蒸汽磨”代替了“手推磨”,即机器化大生产取代了个体手工劳动。二是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把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提高到统治阶级的高度。三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代替了封建君主制国家,即建立了近代国家<sup>[16]</sup>。显然 1840 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不具有上述条件。也有学者指出,1840 年至 1860 年之间,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没有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包括清王朝的统治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封建自然经济的根基并未触动;买办商业资本只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种商业资本<sup>[17]</sup>。刘光永也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在 1840 年,指出,鸦片战争后,虽然五个通商口岸被打开、公行制度被废除,清政府原先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有所松动,但除了东南沿海及有限的地区外,广大内地依旧是一片密不透风的小农经济的荒原,整个中国社会仍然酣睡在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迷梦之中,并没有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联系。战后 20 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权形式与战前相比并无二致,封建主义的社会机体总的说来依然“完好无损”,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

从政权形式上看,虽然“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但是,这种“破坏”毕竟是有限的,并没有动摇或改变他作为封建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地位、更没有把他轻而易举地变为“半殖民地”政权中的傀儡。所以直到五十年代末,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后,仍然一口咬定“公使驻京”、“断难允行”,显然是不愿失去他至高无上的独裁地位,去做洋人的傀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大清皇帝作为封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政治权力始终是独立的。当时的中国,显然还不能说“已经沦为半殖民地”了。从经济形态来看,鸦片战争后,虽然外国资本家在五个通商口岸零零星星办了一些加工工厂,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也的确有“开始解体”的

迹象。可是,这些“工厂”本身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根本不能看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标志。……“半封建社会”尚无从谈起。(《中国近代史上限异说》,《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对于1840年是否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虽然没有出现直接的辩论,但由于学者们坚持不同的观点,实质形成了一种间接地商榷与讨论。

## 二、关于下限的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在50年代就有学者针对1919年的下限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在第三章中作了阐述。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下限问题又开展了新的讨论,这种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进行的。讲现代史的开端,也就是讲近代史的结束,两者实际上是谈一个问题。海峡两岸和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甲午战争说;1905年说;1911年说;1915年说;1917年说;1919年说;1949年说;1956年说等等。而这其中,持1919年说和1949年说的学者较多。有的学者认为,持1919年说是“合乎习惯”,持1949年说是“合乎科学”,所以长期以来,这两种主张一直并存,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上也有所反映。比如,高等学校开设的“中国现代史”课程,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和词典(如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等等),主要是根据习惯而沿用1919年说;1980年成立的“中国现代史学会”,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而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的《近代史研究》,将1840—1949年间的历史包罗在内;1981年出版的胡绳撰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没有使用传统的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那么,中

国近代史的下限到底如何确定,学术界的讨论是热烈的。

### 1. 对划分标准的理解与认识

李新在讨论各国因具体情况不同而进入近代社会的时间不同时,强调了划分历史阶段要有一个统一标准,他指出,以生产方式划分人类历史,最为恰当。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归根到底,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五种社会形态就是这样划分的。只有用生产方式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历史阶段,才是科学的。<sup>[18]</sup>

陈纯仁也同意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引用马克思的两段话作依据。一是马克思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一是马克思 1867 年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8 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提出了正确划分历史阶段的科学标准。陈纯仁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是中国没有经过像西欧、北美、以及日本那样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明清之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中断了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转向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畸形状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革命性质的转变。应当依照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这样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才是科学的。<sup>[19]</sup>

成汉昌认为,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历史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虽然是一个重要标准,但不是也不可能是惟一的标

准。他指出：

“现代”这一概念的含义，本意是指“现实”或“今天”的意思。各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划分出自身现代史的阶段。然而，一些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阶段，以至目前仍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那么这些国家、地区或民族岂不就没有自己的近代或现代历史了吗？就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而言，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当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世界大多数国家仍处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当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如果单纯强调社会形态这个标准，那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岂不远远也无法区别近代和现代的发展阶段了吗？我国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体系来说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如果仅以资本主义阶段作为近代历史的标准，那么我国历史岂不也不存在一个近代的发展阶段了吗？由此可见，在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依据，并不是惟一的标准，还应该有另外的标准。（《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成汉昌接着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根据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程度，也是我们区别历史发展的近代和现代阶段的重要标准之一。现实与历史总是有各种联系的，现实即是历史运动的结果。但必须看到，这种联系在某一个范畴内更直接一些、明显一些，甚至是属于同一个体系的前后两个阶段；而在另一个范畴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和历史的运动，就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把与现实联系更密切的那一阶段作为现代史的对象。对于成汉昌的观点，我们看到又是社会形态演进的标准，又是与现实联系程度的标准，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但成汉昌解释说：因为标准掌



握的不同,同一个国家现代历史的起点则不一致。当然,在某些国家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是否能够统一起来,应根据每个国家、地区或民族自己的现实与历史的特点而定。<sup>[20]</sup>

从广玉主张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相结合作为分期的标准。认为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必须用社会的经济结构去说明社会的政治结构,用社会经济的变化去解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去说明历史的运动。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时,要考虑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用革命运动发展作为历史分期的一项标准,这不仅符合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符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sup>[21]</sup>

有些学者以 1840 年以来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主张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具体理由是:(1)十月革命后世界进入现代史时期,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后中国历史应属于现代史阶段;(2)近代史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现代史以无产阶级为中心,五四运动标志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从此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它决定着时代的方向;(3)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因此它也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划界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反诘以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的观点,如以社会形态划分,那么今天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否属于近代史?而一些生产方式落后的国家其历史是否属于古代史?<sup>[22]</sup>

## 2. 1919 年下限说

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学者,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该划在 1919 年,并反复阐述过这种理由。王廷科曾撰文指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

要方向。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史。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因此它属于现代史。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相同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也有不同点(革命领导权、指导思想、革命目标、前途、革命阵线),而不同点则是更为重要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联系又有区别,而联系是主要的,两者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范畴,在中国理所当然地同属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范畴。〔23〕

成汉昌在总结大多数学者主张1919年五四运动应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时,概括了如下主要论据:

其一,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观察。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始了一个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在五四运动后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阵线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二,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总体系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民革命实践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其三,五四运动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起着划时代的作用,其影响持至于今。五四运动后的三十年,虽然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但社会的政治结构 and 经济结构的具体情况却与五四前不同。……另外,一些同志认为,还必须从当前国内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一方面,正式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已有三十年时间,全国大中学校及相当多的科研单位和已出版的大量教材、著作都采用这一观点。……另一方面,对于建国后的三十年,作为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积累过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讨论述评》,《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6期)

对 1919 年说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很多。侯山玉认为,区分中国近现代史的界线,首先要认真理解列宁提出的划分时代的标准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着质的区别。如果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把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归入一个历史时代,这既掩盖了社会发展的性质变化,模糊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作用,贬低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伟大意义,因而是不妥当的。<sup>[24]</sup> 龚家珩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但它反帝反封建的壮举最终还是失败了,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制度。五四运动只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和后期的转折点。而不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中国近代史的结束,而另一个历史——中国现代史开始的断代大路标。过去史学界把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为中国现代史,这种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标准的传统提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不久,暂时使用一段时间是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时至今日,继续沿用这个传统提法就越来越不适宜了。龚家珩进一步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相互联系着的,前者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过程中的第一步;后者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过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为第二步作了准备;第二步成了第一步的必然结果。然而,第一步的革命是不损害私有制的;第二步的革命却要破坏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则是私有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划分历史时期的原则,怎能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的历史混称为中国现代史呢?又怎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一社会经济

形态的社会,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硬性扯开,分称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呢?笔者认为,这种“混称”和“分称”都是不科学的,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划分历史时期的原则。中国近、现代史的断代大路标,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才是科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科学断代路标问题刍议》,《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 3. 1949 年下限说

在《近代史研究》创刊 100 期纪念号上,胡绳写了这样的祝辞:

《近代史研究》出满了一百期,这是值得祝贺的。在祝贺时,我谨重提一个建议:把 1919 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 1840—1949 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胡绳的提法代表了大多数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看法和意见。

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学与科研的人员,大多数同意以 1949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主要根据是:其一,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如果五四以后三十年的历史不归于近代史的范畴,那么近代史就不能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从而也割裂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完整性和民主革命的连续性。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立三十余年,把三十多年前的历史划为现代,已超出了“现代”这一概念。其三,以五四运动划分近现代史终始时间的结果,不利于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不利于史学工作者史学修养和能力的培养提高等<sup>[25]</sup>。李婉曾撰

文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把下限问题主要归纳为两种提法：习惯的提法是指 1919 年下限说；广义的提法是指 1949 年下限说。她认为习惯的提法只是半部近代史，缺乏历史分期的科学性；而广义的提法才包括其全过程，也符合历史分期的一般方法。因此她主张废止习惯的提法，采用广义的提法，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下延三十年，即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sup>[26]</sup>。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划在 1949 年，李侃也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不论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都应该从鸦片战争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为这个历史时期包括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形成和终结；包括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现在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并不能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完整性和民主革命的连续性。因此，只能说是半部中国近代史<sup>[27]</sup>。他认为讲中国近代史而不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弊无利：

首先，这种以五四运动为界，把中国近代史分割为“近代”和“现代”两个范畴、两门学科的办法，是不科学也不准确的，它不利于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过程，从而也不利于从分析综合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变化中，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这种划分方法，不利于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教学的繁荣和发展。……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作为现代史的另一个实际结果，则是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反而显得很不景气，甚至有时竟被排除在历史学领域之外了。第三，按现在通行的这种划分方法，也是不利于史学人才的培养和提高的。……试想，一个近代史的研究者，倘如他的研究范围只限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或者只限于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那么即或他也能做出一些成绩，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他的史学修养的

基础却是不会深厚,他的历史眼光也不会是很开扩的。(《中国近代“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7日)

当然,有人不同意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提出了反驳的意见。有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政权性质发生了变化,而社会性质还没有全面发生变化:

就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分期的理由,仍然不完全。政权性质的变化,一般说来,并不等于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性质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面,而政权仅仅是指政治权力而已。正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完成了政治斗争,即阶级斗争方面的任务,而其它方面,特别是经济斗争方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因如此,新政权建立后,党和政府经过长达五六年之久的经济革命,这就是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前者到1952年结束(除西藏和台湾)。后者到1956年结束(除西藏和台湾)。至此,中国社会性质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彻底改变。我们可以这样说,1949年到1956年的中国社会性质仅是在政治上改变,到1956年后,才是社会性质的全面改变,由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把1949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终点的说法,最终也不是那么完全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分期之我见》,《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也有人是从现实的客观情况立论,认为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到哪里,对于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妨碍。比如说:很有价值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著、报告、论文和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现代史的总题目下或针对现代史的研究而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立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要研究的还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无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做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

点,这种不一致是可以而且必然会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的。在当前,这都是合乎科学的,对于历史的研究没有什么妨碍<sup>[28]</sup>。

#### 4. 其他几种下限说

国内也有很少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应划在1911年;1917年;1956年。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余意明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1)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尔后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出现,但只是封建帝制被摧毁后的余波再现而已。(2)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国民党登上了政治舞台,“民国”取代帝制已成历史的必然。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逐步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发展,虽然后期由于国民党政权落入蒋介石手中,国民党本身也发生了蜕变,但前期国民党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否认的。(3)辛亥革命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把民主革命的观念播入人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突变,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受到了有力的冲击。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把辛亥革命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更为合适<sup>[29]</sup>。

还有人主张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作为近代史的下限的。主要理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此,各国的革命均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据此,中国近代史应止于1917年。李新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以后,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但并不意味着十月革命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正如我们讲世界史时,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作为分界线,十七世纪以前是封建社会,以后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法国近代史是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的;俄国是从十九世纪“农奴解放”开始的;日

本是从“明治维新”，也是十九世纪开始的。尼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国还早。因此，每个国家的历史应该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划分阶段。（《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把世界历史的下限放在十月革命是恰当的，而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也同世界史的下限等同起来，这似乎是牵强的。

还有人主张以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主要理由是：1949年新中国虽然诞生，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但经济上却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以社会性质还没有完全改变，只有到了1956年国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社会性质才完全转变到社会主义上来。因此，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当在1956年。很多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sup>[30]</sup>。张宪文等人批评说：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不恰当的。新中国诞生后，我国国民经济虽然有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并存。但是，众所周知，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我党通过政权的力量，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银行、铁路、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在旧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占资本主义经济的80%，没收了这些官僚资本主义，就消灭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这时候虽然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但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掌握了国民经济的领导权。私有制经济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并且正在被逐步地改造中。这说明我国解放初期虽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私有制经济，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居于优势地位。这种经济形态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把1949年到1956年的



一段历史,也归入近代史范畴,显然是不妥的,说不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闽西文丛》1983年第1期)

### 三、近代史的划段问题

这里讲的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110年间的历史。所谓划段也是在这110年间如何划分阶段的问题。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学者对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某些主张,这里从略。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李新和丛广玉关于划分阶段的学术观点。

李新把1840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具体划分为十二段。第一段,1840年到1851年,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第二段,1851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第三段,1864年到1894年,列强侵入的加深,洋务运动的破产。第四段,1894年到1901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第五段,1901年到1912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覆亡。第六段,1912年到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建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第七段,1919年到1924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第八段,1924年到1928年,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失败,北洋军阀的覆灭。第九段,1927年到1932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日本侵占东北和对上海的进攻。第十段,1932年到1937年,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加强,及其“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第十一段,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人民抗战力量的壮大。第十二段,1945年到1949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失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新的划分方法,虽然有些阶段在时间上是交叉的,但由于注重历史的客观事实,所以有一定的道理,他自己也认为比较清楚。李新还对现代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划分为若干阶段。第一段,

1949年到1952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第二段,1952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第三段,1957年到1961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大跃进的挫折。第四段,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的顺利调整,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第五段,1966年到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林彪反党集团的灭亡。第六段,1971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四人帮”被粉碎。第七段,1976年到1978年,肃清“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清除“四人帮”的思想流毒。第八段,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的重新调整,安定团结局面的更加稳定<sup>[31]</sup>。李新的阶段划分,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

丛广玉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以政权更迭作为分期界标,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

1、晚清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历时72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和确立时期,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涨时期。

2、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到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历时16年。这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加深时期,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

3、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从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22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渐趋衰落和崩溃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和胜利时期<sup>[32]</sup>。

#### 注 释:

[1]牟安世:《试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及其上限》,《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2]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1 页,下册第 878 页。三联书店 1974 年版。

[3]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4] 迈克尔:《太平天国革命》(第 1 卷)第 VIII191 页,1972 年英文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68 页。

[6] 牟安世:《鸦片战争》,第 15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7] 来新夏:《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4 年第 9 期;《林则徐与禁烟运动》,《福建论坛》1982 年第 6 期。

[8] 刘光永:《中国近代史上限异说》,《甘肃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

[9] 高升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是同盟会的成立》,《理论探讨》1988 年第 4 期。

[10] 徐立亭:《评中国近代开端说》,《史学集刊》1991 年第 3 期。

[11] 田毅鹏:《关于近代史开端的几个理论问题》,《北方文物》1994 年第 3 期。

[12]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13] 唐建增:《中国近代史分期之我见》,《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14]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15] 张振□:《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

[16] 高升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是同盟会的成立》,《理论探讨》1988 年第 4 期。

[17] 殷方勇、易行仲:《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争鸣》1990 年第 1 期。

[18] 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19] 陈纯仁:《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及其研究对象诸问题》,《南京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20] 成汉昌:《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

[21] 丛广玉:《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与阶段的划分》,《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

[22] 曾景忠:《中国近、现代史划期问题述评》,《百科知识》1983 年第 10

期。

[23]王廷科:《正确估价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4]侯山玉:《也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5]成汉昌:《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讨论述评》,《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6期。

[26]李婉:《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下延三十年》,《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7]李侃:《中国近代“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7日。

[28]成汉昌:《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9]余意明:《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

[30]如龚家:《中国近、现代史科学断代路标问题刍议》,《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侯山玉:《也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成汉昌:《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等。

[31]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2]丛广玉:《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与阶段的划分》,《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 第九章 | 近代专史线索与分期的讨论

对于专史来说,要有独立的科学体系,而专史中的线索与分期是专史体系的重要体现。八九十年代,由于对中国近代史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探索,又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有关专史线索和分期问题的研究。正如经济史学者吴承明所说:“近年来史学界有个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于多年来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的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较著称的是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的体系;这显然是一种重视资产阶级运动的想法。而在最近一次中国近代史体系讨论会上,则提出应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个讨论势必涉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看法”<sup>[1]</sup>。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与“史学界至今争论未已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紧密联系着”,“中国近代哲学史与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同经济、政治史紧密相关”<sup>[2]</sup>。事实正是如此,下面就对这些专史(主要包括中国革命史、经济史、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等)的线索与分期的讨论,分别加以介绍。

## 一、中国革命史的分期

建国初年,中共中央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定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为了配合这一课程的开设,50年代出版了二十余种中国革命史的著作和教材。文革结束以后,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学被重新提出。而且,中共中央于1985年发布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的通知》,恢复了中国革命史课。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中国革命史》教材和专著编写的高潮,到90年代初,已出版了二百余种。但由于缺乏充分的讨论和准备,一些著作缺乏新意,带有浓厚的近代史和党史的痕迹。特别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很多模糊认识。这里既包括中国革命史与近现代史和党史的关系问题,也包括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问题和分期问题。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开展了热烈地讨论。

### (一)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问题,一直讨论得比较热烈。提出的主张纷呈多样。关于上限,有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办、1894年兴中会成立、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等多种主张。关于下限,有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完成、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等多种主张。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

#### 1. 确定“中国革命史”的科学名称

自从1985年国家提出在高等院校应对大学生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以来,“中国革命史”成为一种习惯的说

法,主要指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但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把它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史”为宜。葛仁钧撰文指出:

“中国革命史”之名,从其内涵来说,包括中国从古至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革命是人们在改造社会中进行的重大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四次社会革命,即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的革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历史上的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即使规模再大,亦不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所以,在历史上不存在所谓“奴隶阶级革命”或“农民阶级革命”,科学的称法只能是奴隶阶级或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按照“革命”的科学定义,“中国革命史”就必须包括上述四次社会革命。现在所开设的“中国革命史”,主要讲授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这只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中的一部分,这部分虽然重要,亦不应冠以“中国革命史”。我认为,根据所讲授的内容,以“中国民主革命史”(全称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史”)为名,更为适宜、更为科学。(《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还有人认为应该把“中国革命史”更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冯明科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革命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即指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重大进步和改革;一是指社会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史是指社会政治革命。另外,中国革命史的对象和内容是研究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这段历史任务从1898年始到1956年才结束。因此,冯明科主张将“中国革命史”更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才能更准确地反映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内容<sup>[3]</sup>。

蒙子良对冯明科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他从马克思主义关

于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史的称谓,认为建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中国也就不存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他明确指出:

我主张不用“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概念,很多人可能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只能是这样。历史的研究就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感情出发,或者囿于个别陈腐的论断。党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介历史,而不是根据个人需要去阉割历史、歪曲和篡改历史。近年来,我们史学工作者逐渐从感情的盲从转向理性的思考。这大概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所在吧。(《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 2. 中国革命史上限问题的讨论

关于中国革命史上限的观点很多,下面我们就几种重要主张以及某些批评意见进行阐述。

1840 年上限说。已经出版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讨论或已经出版的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有关中国革命史上限的文章,都把发生鸦片战争的 1840 年当作中国革命史的上限。鸦片战争虽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帝制,但它毕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由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封建国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从这个时期起就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所以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革命史的开端<sup>[4]</sup>。

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史是阐述中国的社会变革史。而社会变革首先从新生产力变革旧生产关系开始。因此,上限应是中国资本主义方式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形成,反帝反封建的开始。吕建云认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还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所以,鸦片战争不能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上限。并明确指出: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中国,并且造就了中国无产阶级,但我们说资本主义新生产力是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缺一就不成资本主义新生产力,也构不成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外国资本家和中国无产阶级可以构成统一体,但外国资本家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向中国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外国资本家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掠夺殖民地资源,更加稳固中国封建制度。所以,很显然,外国资本家不会在中国进行什么民主革命,而是千方百计扑灭民主革命,扑灭中国的资本主义。……如此看来,鸦片战争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民主革命的主体还未产生,所以民主革命并未开始,这样,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上限,是不确切的。(《如何正确界定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蒙子良也不同意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上限,他是从中国革命史的特定含义出发来立论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史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判断一个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衡量的标准有两条:一要看是谁领导这个革命,二要看这个领导阶级(或集团)的革命目标是不是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据此,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后与英国的一切冲突(包括虎门销烟、穿鼻洋之役、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等)都是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实质上则是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独立。所以,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条标准,鸦片战争是不能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上限的<sup>[5]</sup>。冯明科也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反抗殖民者的开端等方面立论,不同意将1840年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开端<sup>[6]</sup>。

不同意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上限的上述两种观点,主

要是注重专史自身的特点,并从理论和概念上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除多数人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外,也有个别人持其它意见。例如,有人主张 1872 年上限说。认为 1872 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革命史开端的标志。从此,中国形成了近代工业化运动,产生了第一批中国资本家。这批资本家与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母体中出现了新质,出现了否定的、革命的因素,真正的民主革命就此开始<sup>[7]</sup>。有人主张 1894 年上限说。认为这一年成立了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小团体“兴中会”,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开始了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斗争,无疑,中国革命史应当从 1894 年成立的“兴中会”开始<sup>[8]</sup>。有人主张 1898 年上限说。认为 1898 年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这次变法虽然失败,但是由于它从根本上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统治,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主张 1898 年戊戌变法为中国革命史的上限为宜<sup>[9]</sup>。有人主张 1905 年上限说。认为中国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孙中山领导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并提出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开始的。统一的政党是一个阶级的指挥部,政治纲领是革命的旗帜。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真正发动起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1905 年 8 月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产生;同时,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史的开端<sup>[10]</sup>。有人主张 1911 年上限说。认为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sup>[11]</sup>。

对于某些中国革命史开端说,有人撰文提出批评意见。蒙子

良就对 1851 年开端说、1898 年开端说、1900 年开端说作了系统的批评。他认为,1851 年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它的斗争目标是直接指向清朝贵族的封建统治,也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但它仍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太平天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农民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只能是封建王朝的简单模仿、复写、反映。这在《天朝田亩制度》和洪秀全等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中有所反映。他还认为,1898 年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企图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维新派与封建势力虽有矛盾,但又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也不敢摧毁封建制度。他们搞戊戌变法希望得到封建势力的支持。可见,戊戌变法运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改良主义运动,而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同时认为,1900 年发生的义和团爱国运动,它的伟大功绩在于:它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使中华民族免受殖民地的灾难。但是义和团存在许多致命的弱点。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是农民阶级,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纲领,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在本质上和鸦片战争中的抵抗运动是一样的。因此,它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所当然地,也不能把它当作中国革命史的上限<sup>[12]</sup>。蒙子良之所以不同意以上几种上限说,是由他对中国革命史特定含义的理解和衡量其中的两个标准决定的,上文已经论述,在此从略。

### 3. 中国革命史下限问题的讨论

关于下限,有人主张划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有其他的一些主张,如有人主张划在 1952 年,葛仁钧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中国民主革命史的论点应是1952年12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开始上升,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因此,建国后头三年仍须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在新解放的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这些任务,到1952年12月先后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至此结束。(《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另外,很多人还把中国革命史的下限划在1956年。张静如1987年在《教学与研究》第3期发表了《二十种中国革命史教材的简略比较》一文,对这二十种教材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并指出这些教材一般都写到1956年三大改造结束。可见,持1956年下限说的人不少。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提出了不同意见。时广东就认为把中国革命史划在1956年,有两点不妥:

其一,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完整性。……社会主义革命和我们所写的革命史是两种不同的内容,它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建立之后,作为孪生兄弟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其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还存在一些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但它毕竟已经不是革命的重点。更重要的是,革命的性质、对象、环境、条件、目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确,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是在1956年,但这是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指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早在1949年就已经初步建立了。……作为革命史,没有必要写到1956年。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革命过程的结束和新的革命过程的开始。(《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再思考》,《重庆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对于中国革命史的下限问题,虽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些主张也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并未引起更为热烈的辩论,这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水平有限是有一定关系的。

## (二)中国革命史的不同分期

下面重点介绍几种典型的分期方法。葛仁钧是根据对分期标准认识的基础上来探索分期问题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史内部分期要有三个方面的标准。其一,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每个时期社会中心矛盾的产生至解决;其二,领导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根据每个时期社会的中心矛盾,明确和正确地提出每个时期的革命中心任务,直至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完成;其三,每个时期革命阵营的形成到革命阵营产生新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根据上述互相联系又无法分割的三个标准,葛仁钧提出中国革命史的五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自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纲领,至1912年2月清朝皇帝退位。这时的社会中心矛盾是封建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阵营的组成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有限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时期: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自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27年3月,北伐军胜利进军。这时的社会中心矛盾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人民大众争取民主之间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北洋军阀集团;革命阵营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体,并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参加;革命的阵营,1921年前由资产阶级领导,1921年后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第三时期: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斗争。自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至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这时的社会中心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武装反抗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革命阵营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第四时期:全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自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时的社会中心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阵营的组成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革命阵营是由国共两党同时分别领导的。第五时期: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自1945年9月至1952年12月,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民主革命的结束。这时的社会中心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三大任务;革命阵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空前广泛的联合战线。<sup>[13]</sup>

时广东主张在划分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时,要注重“革命”二字。他认为,从广义上讲,革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没有物质条件,就不会有革命的社会基础;没有思想条件,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革命纲领和目标。据此,他把中国革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4年至1911年。甲午战争及其列强们分划势力范围,充分暴露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孙中山领导建立了兴中会后,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第二阶段:1911年至1927年。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复辟与反复辟还在继续斗争。这一时期,至少有三种力量即封建残余势力(包括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和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在进行较量。从当时情况分析,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力量和影响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对手。1927年蒋家王朝的建立,就是这两种势力较量的结果,当然不是最后的结果。第三阶段:1927年至1949年。这22年的历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前面较量着,一方总是以战胜另一方为自己的既定目标。谁胜谁负,关键在于谁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着中国人

民的要求和愿望。国民党由于自身的阶级特性,决定它必然重蹈清王朝鸦片战争之后的错误,把自己推向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历史的方面,并最终被历史淘汰。而中国共产党由于代表时代的方向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才使得中国革命朝着合乎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sup>[14]</sup>

###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史学界的一个习惯的说法。“文革”以前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只是1962年朱务善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这篇文章是针对1961年《红旗》杂志14期所载吴江同志《论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一文而发的,对吴江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朱务善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由于“六三”以后,才有上海工人罢工支援五四运动,到了1921年才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五四运动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开辟了道路。朱务善的文章引起了讨论,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但是几乎所有参加讨论的学者都不同意朱务善的观点<sup>[15]</sup>。这次讨论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79年汪士汉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五四运动的讨论。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对此,主要集中两个方面问题。其一,不同意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二,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开端说。

#### 1.对五四运动开端说的质疑

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是史学界的习惯说法。在现有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材中,几乎都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理由是:第一,“从时代特点看,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

成为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只能受这个时代的影响与制约,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五四运动开始的革命已经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已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从五四运动的阶级阵容看,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都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阶段。这是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显著标志。”第三,“从指导思想看,五四运动时已经有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所指引的方向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sup>[16]</sup>而八九十年代,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何一成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的论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虽然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对这次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不能把它同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混为一谈。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还没有真正独立,还不能挑起革命领导者的重任。所以,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革命转变为新民主革命的标志。<sup>[17]</sup>

1989年张静如和姜秀花在《东岳论坛》第5期发表《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文,他们从“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和“五四运动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两方面立论,否定了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结论。

任全才认为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目的等四个方面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没有发生质变,进而不同意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他认为当时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革命的对象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在反封建问题上,只局限于惩办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没有推翻现政权的要求;革命的动力是以学、工、商为主体的全国各界的联合行动,席卷运动的



阶层极为广泛,从广大的青年学生、商人、工人、部分城郊农民、妇女、士兵、省议员、国会议员、海外华侨、士绅、社会名流,直到基督教徒。而传统的由于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于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不完全符合当时的事实;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sup>[18]</sup>

蒙子良通过对传统的观点进行反驳后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目标的全民族的伟大爱国运动,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给现代中国社会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它的发动和领导者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主要又是青年学生,因此它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承续和发展。<sup>[19]</sup>

席书涛撰文不同意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原因有三:第一,五四运动不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第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第三,五四运动本身不具有革命的性质,而是由青年学生和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为抗议“巴黎和会”而进行的一场爱国主义的游行、请愿活动。所以,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sup>[20]</sup>

以上学者的观点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还认为五四运动不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所以,他们倾向于把五四运动看作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是新旧民主革命交替的中介。

## 2. 其他几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说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看法,除了传统的1919年五四运动开端说外,还有学者持其他几种开端说。兹作如下介绍。

1920年开端说。任全才认为,将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成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比较恰当。其理由包括:其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了

共产党的领导。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努力下,1920年8月在上海宣布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成立。这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国革命开始了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从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看,提出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从1920年8月开始<sup>[21]</sup>。

1921年开端说。蒙子良指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四个方面的“新面貌”:第一,有了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经过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终于有了以先进理论作指导的新的领导力量。第二,有了新的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中国革命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使得中国革命不再像过去那样老是在黑暗中摸索了。第三,有了新的革命斗争策略。中国革命不再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不敢发动群众,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第四,有了新的前途。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有了以上四个新面貌,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两个时期的分水岭<sup>[22]</sup>。而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发地参与民主革命的阶段,发展到自觉地参加民主革命的阶段,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自觉地领导民主革命的阶段。这是由当时的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从客观因素上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力量对比有较悬殊的差距,这决定了无产阶级还不能马上取代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从主观因素上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奉行的主要方针和政策,是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

革命”，这就必然地规定了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当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偏师”地位。诚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的合作，但合作性的工作与独立性的工作相比，前者是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由于以上主客观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帮助”地位，而不是“领导”地位。因而，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sup>[23]</sup>。

1919年至1922年开端说。莫志斌主张把“开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有四：一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是革命的统一战线；三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四是与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联系。照此衡量，第一，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二大，中国革命完成了领导权的转换；第二，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在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这一过程中逐步提出的；第三，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明确的；第四，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二大，无论是在思想影响还是在组织联系方面，中国革命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据此，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当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sup>[24]</sup>

1924年开端说。有人认为应当把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费迅指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划分标准是领导权问题，但是以前人们只注意“领导”一方，不注意“被领导”一方，这容易导致认识问题的片面性。费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在辛亥革命以后日趋衰竭，最后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表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标志着历史赋予了她领导的责任，但真正实现这一领导却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此，费迅得出结论：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既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始退出和放弃革命领导地位，也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始实现对革命的领导。以“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转换这一标准来衡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是旧民主

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换过程(过渡阶段)完成的标志和严格意义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反之,离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换这一角度和标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提前或后延的说法,都是不适宜的。<sup>[25]</sup>

1925年开端说。有人主张把1925年五卅运动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完成的标志。何一成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初期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等,是中国无产阶级发挥政治指导作用的体现,但“谁追随谁”、“谁吸引谁”问题并未解决,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才完全确立。这是因为,第一,与五四运动不同,五卅运动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第二,五卅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三,五卅运动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支援,使中国革命纳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至此,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才告完成。<sup>[26]</sup>

1927年开端说。这其中又分为“8·1”说和“8·7”说。关于“8·1”说。方小年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即武装斗争;一个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前者是开端的首要标志,后者是开端的根本标志,两者缺一不可,仅仅只有一个标志,还不足以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只有当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独立掌握的时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只有到了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才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开端,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sup>[27]</sup>席书涛也指出,“八一”南昌起义标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由被动态势转变为主动态势,从而使陷于失败的中国民主革命重新焕发了生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它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首次独立地、主动地向反动派发起的英勇进攻。这一进攻由于摆脱了以往资产阶级的一切羁绊,从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创造性和革命彻底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使中国民主革

命具有了以往所没有的勃勃生机,这就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sup>[28]</sup>。关于“8·7”说。中共八七会议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完成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刘振义指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是转变的准备阶段;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转变的开始阶段;从1922年党的二大到1925年党的四大是转变的确立阶段;从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到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是转变的完成阶段。因为最后一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而且共产党认识到,要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必须要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革命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sup>[29]</sup>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研究探讨的不断深入,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民主革命以至全部中国革命的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中国革命史学科体系的建构,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所以造成多种“开端”说或“开端”标准多元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标准不统一和不明确。在前述若干观点中,很多论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根本标准之外,或者加上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问题,或者加上革命主力军问题,或者加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由领导权问题所决定和派生的,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不应与领导权问题等量齐观,一同视为确定革命性质的标准。正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才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备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和新的特点,从而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阶段。总之,何时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的领导,何时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sup>[30]</sup>

## 二、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邀请十几位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笔谈,并以《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为题,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上发表,认为如何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不但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体认识,而且关系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国情的进一步了解,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进行深入理论探究的是汪敬虞。由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他认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缩成一句话,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他指出:

在封建社会中新生的资本主义,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历史的进步,一般说,它应该只有发展的一面。但是,具体到近代的中国,我们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需要进一步联系中国的历史环境,联系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出分析和论证。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亦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产生,不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直接临盆;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和充分地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这才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

红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或者说,中心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断发展。(《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汪敬虞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很多学者都赞同甚至欣赏他的这一学说。王方中就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并存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前两者和后者的历史走向是尖锐地对立的。一般说来,前两者是压制后者发展的力量,而后者的发展壮大也必然对前两者的存在构成威胁。那么,究竟应该以哪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呢?王方中的结论是:只有那植根于本国经济机体、完全依靠本民族内部力量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才能明确表示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才能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杜恂诚也说,汪敬虞所提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构想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断发展”的意见,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表面看来似乎有点矛盾,却是把握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脉搏,因而具有深邃的理论性。虞和平表示,我同意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断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因为它概括表示了近代经济史发展的总趋势,又体现了这一总趋势的遭遇和特点。马敏也认为,我个人赞同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断发展作为探索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一命题的最大可取之处,即在于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走向,兼及了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面,从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某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sup>[31]</sup>

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汪敬虞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丁日初说:确如汪敬虞所指出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既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那么是否有必要把这个中心线索定为中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呢？窃以为不必。因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无论如何遇阻碍、受挫折、遭失败，它总归会艰苦奋斗，克服困难，逐步前进。既有发展，但不能充分发展，就是说它的基本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因而我们把它的发展作为中心线索，是符合历史情况的。把中心线索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是要把问题归结到不发展上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优势。然而，它影响传统经济，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就像工人阶级虽然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很小，但它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样。考虑到这种情况，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面是发展过程的主流，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心线索宜归结到不发展上面。把中心线索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立论基础，是将帝国主义、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同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处于对立地位”，而只承认后者是中国资本主义。对此，丁日初并不表示赞同。丁日初还指出：近代中国既有消极、腐朽的力量，又有积极、进步的力量，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连接。它们的存在，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同时存在旧的方式和新的方式。但进步力量与新的方式逐渐发展，而腐朽力量与旧的方式则逐渐衰微。作为研究的中心线索，它应当指引人们去探索进步力量如何发展、新旧方式如何兴衰。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新生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它显著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初步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并促进政治和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展。因此，我赞成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

李时岳认为，汪敬虞提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主体构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实际上是“沉沦观”的一种新形式。李时岳说：汪先生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但随即用“不发展”来淡化乃至取消这种进步的意义，用“不发展”来说明在总体上中国近代仍是“历史的沉沦”。其实，“发展”和“不发展”是相对而言的，有了“发展”才有“不发展”，因为“不发展”



才要“发展”。这本来很明白的道理,为什么要弄得如此艰深呢?李时岳进一步指出:

据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个“历史条件”,汪先生概括为:“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这似乎不是讲历史,而是讲导向社会主义的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的情况。众所周知,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以后,而“官僚资本主义”(姑且不论这个概念是否科学)的形成更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以后。把终点的特定环境说成是全过程的环境,至少是缺乏历史观点。同样,把中国资本主义界定为“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这个界定顶多只能适用于“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以后,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趋向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这个总趋向中,始终存在着导向殖民地化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导向独立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纠结、斗争和互相制约。在中国资本主义中,又始终存在着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纠结、争斗和互相制约。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简单化必然造成片面。“沉沦观”实不可取。(《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沉沦观”不可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凌耀伦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中国资本主义”应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旧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科学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其通俗名称。)与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第二,中国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是“发展”。这种认识可以打破“沉沦”观。实际上,以“发展”观来处理和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现象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第三,发展

“缓慢”，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凌耀伦主张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这一提法来表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代鲁提出“外国资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轴线”的观点，他说：

近代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种特殊过渡形态，在其内起主导的决定作用的因素只能是侵入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近代旧中国之所以成为半殖民地固然同这一因素密不可分，即成为半封建，也同这一因素有直接决定关系，此其一；其二，这一因素又同中国整个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代相始相终：如众所知，外资入侵，构成中国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随着外资入侵逐步加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也日益加深，最后外资入侵势力被全部驱出大陆，中国社会方从总体上进入另一新的时代。是故，关于显示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演变全过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窃思忖，也只能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作为中轴线，方较妥帖。另再辅以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和封建制破坏与保持，遂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全部发展线索。或者学者将此抨之为“外因决定论”。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不能惟恐落入“外因论”而不予承认或讳言不宣；而且所谓“外因”、“内因”云云，原只有相对意义，若从全世界范围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来观察，其究竟属外因抑或内因呢？（《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外国资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轴线》，《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以上学者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展开了争鸣，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看法。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 三、其他专史的线索与分期

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探索中国近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

####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

##### 1.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线索的讨论

1982年《江汉论坛》第12期发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一组笔谈。其中有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线索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观点。

张锡勤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主线不是唯物论,而是主观唯心论的盛行。他认为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大都夸大“心”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古代讲“心”的学派——陆王心学和佛学在近代大受欢迎。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人都喜好陆王,推崇陆王。对于佛学也是过于偏爱。龚自珍和魏源是佛门弟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皆好佛、崇佛。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张锡勤指出,近代思想家程度不同地尊崇、提倡心学和佛学,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使人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改造中国、救亡图存这个历史课题决定的。而近代进步思想家们由于政治上的软弱和缺乏力量,又不能相信和依靠民众,甚至轻视和害怕群众,所以便转而乞灵于“心力”,幻想靠它来推动和实现变革。然而,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主观唯心论都不能将革新、革命事业引向正确的道路。

杨宪邦不同意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主线是主观唯心主义,也不同意是机械唯物论。认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哲学史的主线是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他指出:

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同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斗争中,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形成到发展的过程,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这个时期哲学发展的主要方面,规定着这个时期哲学前进的方向。这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哲学发展的主线或基本线索。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是这个时期唯物主义特殊的具体历史形态。它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它和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有所不同。……这种进化论的唯物论在中国哲学长期发展的链条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是马列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哲学必须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正是由于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特别强调了“关于发展的理论”,所以就为向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准备了思想前提;同时也由于进化论不是阶级论,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道路,所以也就使得中国哲学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化,发生划时代的革命变革,成为不可避免。(《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12期)

杨宪邦的观点与张锡勤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此外,乌恩溥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哲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是战斗的、进步的,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其内容:一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一是进化论学说;一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五四运动以后是无产阶级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经历了一个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李达、瞿秋白等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革

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哲学家艾思奇等在这方面继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讨论,由于是早在1982年,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还缺乏深厚的积累,所以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线索的讨论还难得深入,所谈的线索还只是一般的哲学史上的主要内容,还不是深入这些内容当中的深刻主题。

## 2.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这里要探讨的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上下限问题。对此,杨宪邦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应该依照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期,始于1840年列强的入侵,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sup>[32]</sup>。张琢也指出:

作为一般通史,把近代史的下限划到1949年比较合适,那么,对于哲学史来说,把下限后移到1949年就更为必要,更科学,更符合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能更好地顾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解决旧的划分所带来的许多困难。所以,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我同意这样的划分:大致可以把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划做近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现代。龚自珍、魏源可以看做近代哲学的先导,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产物,不属近代哲学的范畴。真正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哲学,应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算起。新中国成立,标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也就宣告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哲学的失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面临着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以后的新课题、新的考验,这是现代哲学史的课题。从近年来几次中国近代哲学史讨论会的发

言情况看,相当多的同志都同意将近代哲学史的下限划到 1949 年。虽然有许多同志过去的研究和教学都是以 1919 年为下限,对原来称为现代而现在称为近代后半期的这一段哲学史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但也还是同意将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下限划到 1949 年。(《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第 26-27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很多学者主张把下限下移三十年,这是和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下限问题相吻合的。这表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对中国近代哲学史分期问题直接的影响,反映了两门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哲学史学界还没有完全根据近代哲学史学科的特点来进行分期问题的探讨。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孙文范专门撰文从分期标准、与革命史分期之间的关系、上下断限、划分阶段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1、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标准。分期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要正确分析和估价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和作用。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标准。其二,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史学队伍是否出现和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作的问世与否,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分期的又一重要标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没有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一批历史著作的问世和一支史学队伍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就无法形成。

2、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和中国革命史的分期之间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它与中

国革命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们在某些阶段的分期可能吻合,在另一些阶段的分期则可能不同。我们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时,不必拘泥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而强求一致。

3、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上下断限。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曾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某些原理介绍到了中国,并给予了高度评介。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必要的标准和前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启蒙作用由资产阶级充当了媒介,从而就泯灭其历史功绩。所以,我们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连续性和有机性这个角度考虑,认为应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上限定为十九世纪末。

4、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为第一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始传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酝酿、孕育时期。其二,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其三,1927年至1949年,为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斗争中形成的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五十年历史演变中,经历了思想孕育、理论奠基和最后形成这样三个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科学的新纪元<sup>[33]</sup>。

本章我们主要介绍了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这几门专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中国近代的专史很多,之所以选择以上专史进行阐述,是因为:其一,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以上专史的影响较大,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才引发了以上专史线索和分期的讨论。其二,有些学者又专门对以上专史的线索和分期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了在本章进行阐述的可能。其三,以上专史在中国近代史中确实是分量较重的学科,有值得一提的必要。

## 注 释:

[1]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张琢:《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第23、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3]冯明科:《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4]时广东:《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再思考》,《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5]蒙子良:《浅谈中国革命史的上限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6]冯明科:《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7]吕建云:《如何正确界定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8]时广东:《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再思考》,《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9]冯明科:《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10]葛仁钧:《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1]时广东:《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再思考》,《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12]蒙子良:《浅谈中国革命史的上限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13]葛仁钧:《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4]时广东:《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再思考》,《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15]参照朱务善:《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宝轩:《关于五四运动几个问题的讨论》,《历史教学》1963



年第12期;费迅:《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研究述论》,《党史文苑》1995年第6期。

[16]杨先材主编:《中国革命史》第1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7]何一成:《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革命转变为新民主革命的标志》,《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8]任全才:《也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时代论坛》1990年第1期。

[19]蒙子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于五·四说质疑》,《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0]席书涛:《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学术交流》1992年第1期。

[21]任全才:《也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时代论坛》1990年第1期。

[22]蒙子良:《党的成立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理论学习月刊》1990年第3期。

[23]席书涛:《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学术交流》1992年第1期。

[24]莫志斌:《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5]费迅:《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研究述论》,《党史文苑》1995年第6期。

[26]何一成:《五卅运动是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转变基本完成的标志》,《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7]方小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小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4期。

[28]席书涛:《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学术交流》1992年第1期。

[29]刘振义:《试析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淮北煤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30]费迅:《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研究述论》,《党史文苑》1995年第6期。

[31]以上观点和以下的商榷意见均参照《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

索(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2]杨宪邦:《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12期《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笔谈)。

[33]孙文范:《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 第十章 | 基本线索论辩的评价

### 一、与五六十年代近代史分期论辩的比较

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 50、60 年代,还是新时期的 80、90 年代,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和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都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对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两个时期的探索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意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任何一段时期的历史,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丰富的历史内容揭示和反映出来。但是,把丰富的历史内容揭示出来,并不意味达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对某一时期历史的本质和历史规律有一个理性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某段历史时期的个性,进而把握某段历史时期的重要特征。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这样,一定要探讨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基本的规律。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正是注重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内容和历史演进的最基本的规律。胡绳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实质上就是要把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

所谓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是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胡绳揭示了这三次革命运动的基本特征,其实是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内容的认同,正是这样的重要内容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那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或基本线索是什么呢?胡绳认为要以阶级斗争作为观察中国近代史和划分时期的标准。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并通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来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胡绳是着眼于政治史,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规律的。李时岳则提出了“四个阶梯”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是通过四个阶梯来反映的。这四个阶梯就是所谓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为以上四个范畴,是他对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一个新的认识。李时岳在理解近代史基本规律的时候,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趋向。这正是李时岳探索近代史基本线索时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规律的理解和认识。章开沅则从“民族运动”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因此他所理解的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指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个民族运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其间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认识问题,所以章开沅是这样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的。他指出:

从民族运动的角度看“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可以把这八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潮”,即以1900年为界标,把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在第二阶段又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所

谓高涨,不仅指参加人数的众多,而且指近代民族形成和觉悟的程度,只是后者的差异显示了三次高涨的不同层次。民族运动的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整体态势,是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兴起与低落而自然形成的波涛式曲线,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由此可见,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实质上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从而显示了其探索的学术和理论意义。

其二,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50年代通过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促进和影响了高等学校历史学科的教学。80、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这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论辩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又进一步激发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活跃,这在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方面得到了反映。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改革开放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中国近代通史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各门专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通过各类选修课充实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的课程在高校历史学专业被普遍讲授。与教学相仿,科学研究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研究得到空前加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历来被称为“热门”的课题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专史研究方面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振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为一系列学术新领域的开拓,尤其体现广大学者的创新精神。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在诸

多新领域中,关于近代社会史、近代文化史以及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比较活跃,引人注目<sup>[1]</sup>。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与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密不可分的。

其三,探讨的重要问题基本相同。50、60年代虽然多以中国近代史分期为题进行讨论,但是不难看出,这仍然是在思考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来探索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80、90年代虽然多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为题进行讨论,但是也并未忽略对分期问题的研究。分期和线索实质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方面,不去研究基本线索,很难把握分期问题,反之,不对历史进行分期,又很难看清历史线索的基本走向,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是相辅相成的。50、60年代和80、90年代又都对近代史的上下限问题进行了探索,这实质仍然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另外,50、60年代和80、90年代又相应地探索了有关专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诸如对经济史、革命史、哲学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的探索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受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的直接影响的。

50、60年代与80、90年代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的探讨除上文所阐述的共同之处以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思考的范围和思维的空间逐步扩大。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度兴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sup>[2]</sup>。这一时期与50、60年代相比,学者们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思想空前解放,所以在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时,思考的范围和思维的空间也逐渐扩大了。

80、9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讨论的学者显然要比50、60年代参加的学者多。从这两个时代发表论文的数量可以证实这一点。50、60年代发表有关基本线索和分期(包

括专史)的学术论文近四十篇,参加讨论的学者有二十几人。而80、90年代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专史)大约有一百五十多篇,参加讨论的学者近百人。很显然,由于参加讨论的学者增加了三四倍,论文发表的数量也增加了三四倍,无论如何,学者们对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思考范围和思维空间是逐渐扩大了,这从发表论文所反映的内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sup>[3]</sup>:首先,学者们探索问题的视角多样化了。50、60年代,学者们探索的视角主要局限在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或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作为分析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出发点。而80、90年代,探索问题的视角从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经济等逐渐扩展到对近代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向、近代民族运动的走向、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等问题的思考,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来探求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给读者更多的启发,有助于对问题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探索。其次,随着视角的多样化,学者们的学术分歧更加明显了,所以论辩也呈激烈之势。李时岳对胡绳的质疑,汪敬虞与李时岳之间的论战,林华国对李时岳的批评,张耀美对章开沅的评论,戚其章对张海鹏的论战,夏东元对陈旭麓的评判,胡维革与夏东元之间的商榷,这些都反映了不同学者之间明显的分歧。再次,正是由于学者之间的相互商讨和论辩,使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汪敬虞与李时岳之间几个来回的交锋,就使一些问题得以进一步探讨,对其理解和认识也就更加深刻了。可见,无论是视角的多样化,还是因视角不同而引起的激烈论辩,都通过论战,使思索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与50、60年代相比,80、90年代学者们思考的范围和思维的空间明显扩大了。

其二,重视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50、60年代,学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不太注重探索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反映出方法论上的单一化。而到80、90年代,学者们力图改变这一现象,开始注重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现代科学方法的影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长

足的进步。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的眼界进一步扩展,各种新的方法被引起和运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注重研究方法的改变,以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全貌。有些学者开始深入探讨历史研究方法变革的重要意义,认为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科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人们认识到,对人类历史,仅仅描绘出几条必然性的发展线索,远远不能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因此在近代史研究中,在进行系统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的分类研究时,应当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在研究手段方面,广泛地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的方法,创构一批边缘学科,从而构筑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研究的架构<sup>[4]</sup>。也有学者指出,借助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历史环境、内在结构和外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为历史主题、研究内容、理论规范、研究方法、基本线索、阶级分析、中西关系等方面的突破,提供了可能。还有学者指出,应当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注重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sup>[5]</sup>。在讨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时,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重要性,并指出要辩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防止牵强附会或单一化。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只有运用这个方法才能解释中国近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并存,才能解释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迅速下沉与近代工业出现并微弱上升两种趋向的并存。对于阶级分析问题,认为在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由于在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同,形成了地位不同的社会阶级。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是说不能牵强附会,把什么都拉到阶级上来解说,反过来,也决不可以丢掉阶级分析去认识、评定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去认识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有学者还强调说,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



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者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sup>[6]</sup>。可见,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并力求运用这些方法来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使研究工作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其三,注重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下探索微观问题。与50、60年代相比,80、90年代学界明显注重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下探讨微观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既包括基本线索、具体分期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同时也包括其他理论问题,诸如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主要矛盾、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各阶级的地位及评价、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体例等等。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明显注重在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下探讨具体的历史问题,这种微观细化的研究,无疑更有益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问题。

## 二、进一步探讨基本线索问题

50、60年代和80、90年代,曾出现过的两次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的高潮,使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它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完结,必将继续探索下去。新世纪之初,仍有学者继续撰文对此进行研究,如李良玉在《福建论坛》2002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严亚明在《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在以往半个世纪探索的基础上,如何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这是学界应当认真思考的。显然继续探讨的难度非常之大。要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实属不易。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为使新的探索能取得新的成效,是否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要重视加强中微观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包括宏观、中

观和微观研究三个层面,所谓宏观研究是指对某个时段内历史发展总体态势的研究,它包括历史的基本走向、社会的基本状况,以及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基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的价值取向等。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注重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的研究就是历史的宏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是指对某个时段内历史具体领域的总体态势的研究。比如一个历史时期内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基本状况等等。毛泽东就曾对中国近代史中观研究发表过意见,他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当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sup>[7]</sup>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几个部门的研究是中观研究,所说的综合研究是宏观研究。此外,所谓微观研究是指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以及对事件与人物研究中各种基本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微观研究是具体的、实证的和基本的研究。历史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的研究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宏观研究对中微观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微观研究又为宏观研究提供了依据。所以历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科学性就成了首要的问题。如果宏观研究的科学性不足,在它指导下的中微观研究怎么会走正自己的路而不出偏差?同理,中微观研究的科学性不足,又怎么能够进行正确的宏观研究?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研究,其本质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基本线索的探讨能有如此之大的成果和收获,除了近代史学界的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外,还在于运用了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同时也不能忽视它依靠着中微观研究的支撑。当然这种中微观研究的支撑还是有局限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研究领域的扩大,把注意力放到了新的史学领域的研究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新时期以来,史学领域繁花似锦,成就辉煌,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正是这一时期史学宏观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的有力保证。

然而,我们还应冷静地看到,这只是一个开始,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很多,我们在中微观研究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还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中微观历史的研究。我们的中微观研究有了丰厚的基础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研究有望出现新的进展和突破。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任务是既要不间断地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更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中国近代史的中微观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中国近代史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大丰收。

在进行中微观研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研究视野的开阔。不要误解进行中微观研究,就一定是就事论事,把目光只放在狭隘的时空之内,这是无益于中微观研究的,甚至会出现“研究愈繁密,其距离历史研究的真对象愈遥远”的弊病<sup>[8]</sup>。而开放的视野是准确把握历史和给历史定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比如有的学者在谈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时指出,辛亥革命等研究应该在综合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不能囿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几十年的狭小时段,而应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进行研究。同理,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中微观研究都应力求“上下延伸”、“横向贯通”,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连续性,把中国近代史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其诸多特征易获得鲜明的凸起<sup>[9]</sup>。可见,在进行中微观研究时,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虑的必要性。

其二,树立“纲”与“目”一体化的思维模式。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作“纲举目张”,比喻抓住事物关键的意义,反映了“纲”与“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借助这个成语,树立“纲”与“目”一体化的思维模式,是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一个思考方法。这里所说的“纲”,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而“目”则是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具体领域,包括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如果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理解认识得科学和准确,也就是真正抓住了“纲”。而纲

举才能目张,即通过运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论进一步研究认识和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具体领域,这种研究和阐述将是科学的,这里所说的是“抓纲”的重要意义。既然“抓纲”如此重要,就有了如何“抓纲”的问题。这在上文我们已经探讨过,即通过中国近代史的中微观研究,在这样一个实证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把握中国近代史的最一般的规律。可见,“纲”与“目”的关系又是辩证的;深入研究了“目”,就能抓住“纲”;抓住了“纲”,又可进一步探索“目”。这是一个不断往复、以至无穷的研究和认识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不断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不断接近中国近代史真理的过程。

其三,坚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宏观、中微观的研究,要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纷繁庞杂的历史现象中认清历史的本质及其真实的面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仍然要吸取经验教训,千万不能把经典理论作为死的教条,生吞活剥,不得要领。这样的教训,不能忘记。经典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就是要运用经典理论的基本原理,绝不是生搬硬套个别的词语。对经典理论也要作客观的分析,哪些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哪些属于个别的论述,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对那些符合历史、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要继承和发扬,同时也要解放思想,冲破成规,对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的论点,应实事求是地对待。姜铎曾撰文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贡献与历史局限进行了阐述。他以为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1,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2,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诸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突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农民群众的重要地位;3,明确了资本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势力是阻挠中国近代化和造成长期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4,明确了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应划分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加以区别对待;5,明确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目的与方

法;6,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学说。这是毛泽东近代中国史论的精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创造。姜铎同时认为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历史局限与不足,也体现在六个方面:1,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出现严重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2,重政治轻经济,片面强调近代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连三届政府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措施,也加以一笔抹杀和全盘否定;3,片面强调了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导致过分提高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4,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论;5,对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另一面作用,即促进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作用,估价不够;6,对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基本国情,虽有所认识,并一再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但是,没有把这一认识提到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理论高度,认真地当作一个重大革命战略问题来考虑<sup>[10]</sup>。姜铎对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认识和评述可以进一步商榷,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精髓,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理论武器,给我们的研究以正确的指导。

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的同时,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其实当今的历史研究,很多学者也正在这样做,包括借鉴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等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同时要借鉴当今西方历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这对我们深入开展中微观历史研究大有裨益。

总之,经过半个世纪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探索,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当然这种探索并未就此完结,在新的世纪里,在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将继续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通过学者们的继续论辩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会再度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再度迎来新世纪的繁荣和辉煌。

## 注 释:

[1] 参见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第 169—187 页。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 参见张海鹏:《50 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3] 参阅书后“参考文献索引”。

[4] 参阅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5] 参阅张炳清:《中国近代史系统分类及其方法论问题初探》,《求是学刊》1987 年第 1 期;阳晓天:《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系统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学术月刊》1986 年第 4 期。

[6] 参阅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7]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60 页,人民出版社,1964 年 4 月第 1 版,1967 年 11 月改横排袖珍本。

[8] 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半月刊》第 2 卷第 18 期(1941 年 12 月 1 日),香港龙门书店,1968 年第 2 页。

[9] 参见严亚明:《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的几点思考》,《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10] 姜铎:《关于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社会科学》(沪)1997 年第 1 期。

参见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第 169—187 页。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下 编

---

革命与改良的论辩





## 第十一章 |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 一、革命与改良的概念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当然,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干扰,有些研究出现了片面和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改革开放前,对戊戌变法的评价就比较低。当然也有一些公允的评价,如范文澜就说过:“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回顾到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对思想解放的成就,又从而回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对思想解放的影响,再从而回顾到戊戌维新思想对抗完全封建思想的意义。”<sup>[1]</sup>这样的评价在“文革”期间就不见了。“文革”时期,林彪和“四人帮”出于政治的需要,不顾历史条件,随意宰割捏造历史,诬蔑正确评价戊戌变法的言论是鼓吹资本主义救中国,从此戊戌变法成了史学研究的禁区。尽管因教学需要,无法回避戊戌变法时,也只讲它的消极一面,而讳言积极一面。

粉碎“四人帮”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重新评价戊戌变法的热潮。李时岳最早撰文评价近代改良派,以揭露“四人

帮”的“儒法斗争”史观,并对“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的恶劣文风进行了批判,指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的历史论著中,断章取义、附会引伸、淆乱时序、歪曲捏造、影射攻击、指桑骂槐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种极为恶劣的作风却被称为‘有现实感’,是写历史的榜样。影响所及,造成了一种极不老实、极不严肃的学风。研究历史不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而是寻风摸底,设法探听‘上面的精神’;根据‘精神’去挑选材料,宰割历史。大量的材料如果和‘精神’相冲突,可以弃之不顾。只要是和‘精神’沾点边的材料,哪怕是伪书、赝品,也如获至宝。材料不足则借助于望文生义,牵强比附,乃至凭空捏造。考证、辨异等工作,根本就没人过问了”<sup>[2]</sup>。这一段论述表达了“文革”刚刚结束后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希望史学界应以科学的态度和端正的学风研究历史的心声。此后几年内,史学界不断发表文章,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肖黎撰文指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积极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戊戌变法是我国近代史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次猛烈的冲击;第二,戊戌变法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爱国运动;第三,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sup>[3]</sup>。1980年《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陈旭麓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这是文革后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中国近代革命与改良的宏篇论著,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国近代革命与改良的历史脉络,并初步探讨了革命与改良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的联系和辩证关系,对人们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良以及革命和改良的概念有重要的意义。1981年《江苏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沈渭滨的《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一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和立宪活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认为两者虽然一度形同仇寇,但如果剖析一下两派的成长过程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实际影响,就会看到改良为革命在客观上准备了重要条件,两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戊戌变法直接开展论辩的文章。1980年7月18日《文汇报》发表了金德群的《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运

动》的文章。文章肯定戊戌变法在我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一个‘阶梯’”,并指出:“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作者认为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运动,则可表明它是进步的,称“改良主义”运动则意味着反动。可见,作者认为“改良”和“改良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久,《文汇报》1980年9月1日又发表了徐培华的《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一文,文章不同意金德群的观点。徐培华虽然也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不认为“改良主义”都是反动的。他指出,戊戌变法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改良主义就起不了破坏革命的作用,因此它就不是反动的。在还不能爆发革命的时候,改良主义运动的发生正是为尔后的革命进行了预演,并为之开辟了道路。从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出,虽然认定“改良”和“改良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评价却是不同的,对“改良主义”有褒亦有贬。

由于人们热衷于对戊戌变法的重新评价,这一时期,史学界非常关注去界定有关改良、改良主义、革命等一些概念,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历史。1980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就“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问题进行讨论,与会者对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鸣,发表了许多新的意见。与会者都认为,应当把改良与改良主义区别开来。只有那种把改良作为斗争的惟一手段和终极目标的才能称为改良主义。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含义,与会者提出了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革命就是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实现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它是飞跃,是质变,通常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暴力行动;改良则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求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某些让步,它是渐进,是量变,通常以自上而下的非暴力的形式进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革命与改良只是斗争的方法与手段的不同,区别在于暴力还是非暴力。改良固然常常并不改变

政权的阶级性质,但验之于中国近代史,被称为改良的政治运动也有要求质变的,如戊戌维新的目的也是要把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变革。另外,与会者还探讨了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与会者认为,革命与改良,谁优谁劣,也要因时因地因事作具体分析,关键在于它们的社会效果,但总的说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无产阶级承认改良,正是为了超出改良,以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有的与会者说,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所进行的不同性质的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良主张,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反映,是农民革命行将到来的征兆之一。戊戌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的必要准备。清末的立宪运动则为革命高潮到来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改良,尽管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应当给予充分估计,但就与革命的关系来说,则是起了镇压与预防的作用。这些同志进一步认为,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的改良,客观上在近代中国起过程度不同的作用,然而变革旧制度的斗争,最终仍然是依靠阶级对抗,即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的。就变革旧事物、解放生产力的程度而言,革命手段也大大优于改良。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还有的与会者谈到了无产阶级对于“革命与改良”的态度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主张革命,但并不笼统反对改良。当着革命高潮还没有来到时,应当争取改良,以此为革命作准备;当着革命形势成熟时,就毫无犹豫地把改良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决不应满足于点滴的局部改良,忘记了革命的最终目标。改良对于革命,应当起推动和促进的作用。那种认为改良就是目的本身,企图以此来引诱被压迫群众离开阶级斗争,瓦解革命力量,那是反动的,是革命的绊脚石。至于刚刚夺取政权的阶级,通过渐进的方法改善体制,建设经济,完全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革命性变革的必要阶段<sup>[4]</sup>。

这一时期,在讨论戊戌变法性质的过程中,有人认为戊戌变法这一类历史事件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人认为既不应称之

为“改良主义”，也不应称之为“改良”，而应称之为“改革”；也有人认为应称作“维新”、“变法”等等。针对这样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邓广铭在《光明日报》1980年8月26日发表《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一文，详细阐发了他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他首先指出“改革”与“改良”完全是同义词。在英、法、德、俄等语言中，一般说来，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甚至是同一个词，而自然的改良与改善是同义词。同样，在汉语中，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而自然的改良与改革也是同义词。从语言学来说，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涵义是一样的。之所以有人不把戊戌变法称为“改良主义”或“改良”，而称为“改革”，大概觉得“改革”比“改良”要好听一些，要革命一些。他进一步指出“改良”与“改良主义”决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这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暴烈的行动。而改良则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被统治者所做出的局部的、点滴的让步。“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列宁选集》第4卷，第576页）。改良主义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它具有特定的阶级实质和时代特征。改良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思潮。正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按此指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亦即马克思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生存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于是就竭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

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403页）这时的资产阶级“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同上）这个口号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义的阶级实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断出现改良主义这一修正主义的流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5页）。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他们像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鼓吹“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一样，认为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初期，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取消派，就是这样的改良主义派别。可见，我们决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的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另外，改良与改良主义在同革命的关系上，也具有根本的区别。改良和革命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在论述改良同革命的关系时指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末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列宁选集》第4卷，第581页）列宁又说：“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17卷，第97-98页）改良与革命之所以能够互相转化，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运动形式。改良虽然是局部的、缓慢的、逐渐的，但却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因而是进步

的,值得肯定的。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前,它往往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在革命胜利以后,它又往往是革命的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而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用来顶替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指出:“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改良主义,即使是完全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都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改良主义“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列宁选集》第2卷,第406页),“用改良来反对革命”,它毫无进步意义可言,是完全反动的。改良主义是革命的绊脚石。只有战胜改良主义等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思潮,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李新1982年5月25日在《文汇报》发表《造反、革命与改良》一文,阐述了他对革命与改良的看法。他认为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也就是从哲学意义上说,即凡是引起质变的事物都叫革命。或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说,就是变化比较大、斗争比较激烈的都叫革命。从语言学意义上讲,革命还可以当形容词,凡是正义的、进步的都叫革命。从狭义上讲,革命是专指社会科学而言,比如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他认为改良本来是个好名词。所谓改良,就是越改越好。后来批判改良主义,这个词变得难听了。改良是与革命相对而言的,革命是暴力,激烈的行为,而改良则是渐进的。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就要用改良的办法来达到革命的目的。

90年代以后,学界又一次探索革命与改良的概念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有学者从历史和词义的角度来分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指出,革命一词在中国的使用由来已久。《周易·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大时哉!”革,指变革;命,为天命。古人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位易手、朝代更替为革命。然而,虽然每个王朝的新主都会自称是奉天承运、代民征伐,可是在时人特别是历朝史家的眼中,并非所有暴力夺权都可称为革命,而是有着颇为严格的限定。所以才会有人发出“汤武之与



秦隋可得而班乎？汉唐之与王莽可得而并乎？”一类的质问。改良，古已有之。变法、变革、变通之类的提法既见于经典，又载之史册。按照列宁的解释，所谓改良，指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虽然在古往今来的改良过程中也充满着矛盾冲突，有时甚至也不免要流血牺牲，但与革命——阶级之间暴烈的斗争相比，改良的主要特点还是运作于体制之内，其主导者或是统治阶级本身，或是它的合作者，所使用的也是和平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手段<sup>[5]</sup>。

有学者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和突变这两种形式，或者说表现为和平进化和革命变革这两种状态的交替。在通常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是以渐变的方式演进的，这时改良、改革对历史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当着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不推翻现存的反动政权就不能改变陈腐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这时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具体去考察各个时期社会矛盾的特殊情况和历史特点，无条件地排斥一切革命，而把改良绝对化、神圣化，这种“改良崇拜”本身就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极度地简单化了，因而是反历史、反科学的<sup>[6]</sup>。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近代化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它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是错误的。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立宪运动，对社会的发展都曾不同程度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革命和改革的关系是微妙的。它们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又相互补充。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

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切实工作的人,如严复、梁启超、张謇、蔡元培、范旭东、卢作孚等,仍然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试图以改良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sup>[7]</sup>。

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统一关系,特别是互补关系,有学者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事物的变化也好,社会的进化也好,最先都是从局部的、缓慢的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的极限,才会出现质变、飞跃。改良、改革、变革等措施,就是争取社会首先发生部分的数量有限的变化。其次,在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问题上,革命派的主张未必完全正确,改良派的主张未必完全错误、背时。再次,改良、改革本身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向革命转化。最后,改良和革命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两种不同的手段的政治派别,当然有矛盾和斗争。有时甚至是势不两立的。阐明革命与改良的互补关系是要强调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改良、改革、变革,希望能客观、公允、科学地处理改良与革命的关系<sup>[8]</sup>。

也有学者认真梳理了经典作家对改良与革命关系的有关论述,并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肯定革命但并不拒绝改良。恩格斯曾高度赞扬了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把普选权视为一件“最锐利的武器”。他指出:“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所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

就要多得多。”(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7、524页)革命需要具备条件、等待时机,对于可能的改良,革命者应该予以争取。简单地用革命排斥改良,将革命绝对化,不仅无益于革命,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就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惟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第612页)

其次,改良而不忘革命,特别是当革命条件成熟时,就要采取坚决的行动。列宁强调革命者必须审时度势,在时机成熟时就发起正面的攻击;当力量不足时,则应走迂回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他指出:“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力量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

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33—735,750页)

第三,对于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必须揭露和批判。当革命蓬勃兴起之际,改良主义者坚持改良、反对革命,实际上就是在维护旧体制,延缓、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时,革命者势必要对此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而那些反对革命、仍对改良抱有幻想的人,不过“是想用柔和的、改良的方法来消灭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不打碎任何东西;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像绅士们一样戴上洁白的手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57、565页)当然,任何革命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间难免会遭遇挫折。那么,是否能够以革命暂时的失利为由来否定、背叛革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类人,列宁无情地讥讽并揭露道:“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像盼望节日似的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703页)可见,将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简单化,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sup>[9]</sup>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要辩证地对待革命与改

良的关系,绝对地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一个都是错误的。然而到了90年代,学术界却出现了一股“告别革命”的思潮,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

## 二、革命与改良论战与史学重大是非问题

1994年《东方》第五、六期发表了李泽厚与王德胜的《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一文,李、王对话突出地提出了“话语转换”的问题。王说:“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不过,尽管策略改变了,但由于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批判的天性,所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话语仍然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李答:“我赞成你的看法,即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当时我就不乐观,也很担心,结果果然如此,我认为损失很大。当然,它有两个好的结果,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它让人反省,这个反省不仅是反省80年代,而且是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来看,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

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我觉得，通过 80 年代末的剧变，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对象，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其实上述这种观点，李泽厚于 1989 年初就率先提出来了。进入 90 年代以后，一批中青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者则在私下的讨论中，也从不同的角度与之不谋而合。他们的主要论点大致如下：其一，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论者认为，凡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均不能保持“一等强国”的地位，在转型过程中，往往动乱频仍，国无宁日，如法国和中国；而凡通过改革转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则能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势头，如英、德、日等国家。其二，辛亥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传统，是一种前现代化类型的旧式政治行为模式。它的最大弊害在于，扫荡已有的社会积累：一方面，打断了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另一方面则耗费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其三，由于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建设现代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它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现，但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没有创造出“新权威”，中国此后的种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可以归结为“权威危机”。袁世凯、蒋介石的出现，与社会的这一需要不无联系<sup>[10]</sup>。这些思想与李泽厚公开提出的“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sup>[11]</sup>的观点曾一度很流行，进而拉开了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论战的序幕。有学者更直接、更明确地论述了辛亥革命对清末新政的负面影响。如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新政将按计划进行，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新政早就有一个肯定的客观的说法了。”<sup>[12]</sup>上述观点一反以往定论，对辛亥革命重论褒贬，在学术界激起轩然大波。辛亥革命究竟该不该发生，人们各持一见。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诸如史学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和发展道路、中国近代的反帝反封建、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新观点。与此同时,特别是1995年以来,一部分学者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在已发表的文章中,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与上述否定意见展开了争鸣。那末,这类否定辛亥革命和否定中国近代史其他定论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是非问题的出现,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通过学者们的学术争鸣,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所谓学术创新。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科学也必须创新,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很多问题提出来,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创新其实并不新,往往是五年、十年、十五年前就在西方流行的讲法,可今天到我们这里就变成新的了。比如现在谈得最多的是革命与改革的关系。1990年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历史学大会,会议主题就是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当时波兰学者讲,要破除对革命的神话。又比如激进主义、保守主义问题,十几年前台湾出了一套世界思想家丛书,分三类:一编是激进主义思想家,一编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一编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每编设若干人。现在我们有一些人谈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词汇都与台湾当年一样。还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也是有来历的。有一位美国学者曾写过一本书,认为中国近代的问题是救亡压倒民主。现在有些“创新”就是把别人若干年前的观点搬过来而已<sup>[13]</sup>。有学者指出,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追求创新而背离历史真实。现在有人在评判历史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如对封建统治者的作用极力夸大,对改革者、革命者的要求则异常苛刻,这就容易背离历史真实。还有些人用打倒前人的办法来树立自己,如以轻率、嘲弄的口气批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创新离不开健康的学术争鸣。<sup>[14]</sup>

其次,比附现代化。这种比附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现实生活里面得到某种观念,然后用这种观念去往历史上靠。比如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强调稳定,因此有人就从我们现实生活需要稳定往上推,推到“五四时需要稳定”、“清末需要稳定”、

甚至于推到“同治时代也需要稳定”。这是搞错了时代,搞错了具体历史条件。如果离开具体时代和具体历史条件去谈稳定,那么稳定是一切统治者都欢迎的。今天有人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五四运动”,否定“戊戌变法”,主要是脱离了具体时代,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把稳定看成是任可时候都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sup>[15]</sup>。这种比附还体现在否定辛亥革命的论者,并不是认真研究了清末的社会和辛亥革命的全过程而得出的结论,而是对“文化大革命”有感而发。有的论者明确地说对辛亥革命产生怀疑是从“文革”开始的。这表明论者否定辛亥革命,是把“文革”和辛亥革命作了比附的结果。研究历史并不排除对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研究,但决不能对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比附。论者拿“文化大革命”来和辛亥革命进行比附,不分析产生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的具体历史环境、指导思想,抽象地把“文革”的思想根源加在辛亥革命的头上,说辛亥革命和“文革”一样,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这就违反了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sup>[16]</sup>。

再次,学风问题。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所以存在一些问题,原因很多,但缺乏严谨的学风,是显而易见的。史学研究是无穷尽的发展过程,随着史学家学识的增进、视野的开拓,以及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手段的延伸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将获得不断扩展与深化,已有的某些结论也将得到补充、修订或完全改易。这些都是正常的。史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原因盖在于此。但史学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非一切从头做起,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借鉴和吸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它有赖于扎实的工作,独立严谨的思索,而非短平快式的标新立异,人云亦云。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有人做“翻案”文章。因受“左”的影响,学术界过去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不甚准确和需要修正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翻案”的文章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做法有两点使人不好理解:一是厚此薄彼。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等受到贬抑,而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却是褒扬有加;二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全盘抹



杀曾国藩不恰当,现在的一些文章却又无异于视曾为圣人,为此不惜为尊者讳。曾处理天津教案,一味残民媚外,引起时论的哗然,曾也自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但有人却硬说曾处理天津教案“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民族的最大利益”。这显然是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代替旧的形而上学。至于有人将慈禧太后说成是晚清近代化运动的最大保护神,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很难相信这些“新论”是扎实研究的结果。学术研究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坚持严谨的学风<sup>[17]</sup>。

由于为学术“创新”而“创新”,为了比附现代化和学风等问题,造成的上述学术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争鸣。这些争鸣尤其体现在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上。

1995年6月6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高校社科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研讨会”,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刘大年、戴逸、金冲及、胡绳武、沙健孙、丁守和、张海鹏、李文海、彭明、吴承明、汪敬虞、耿云志、杨天石、梁柱、龚书铎等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针对当前史学研究中,特别是近现代史领域里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见解。研讨的重要问题包括: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史学研究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如何创新、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与历史事实、史学的社会功能、健康的学术争鸣等等<sup>[18]</sup>。特别是针对如何认识“激进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个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而且是近代中国落后贫穷、动荡不休的根源所在。由此出发,有人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有人否定孙中山、肯定袁世凯,以往一向得到肯定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了质疑,西方对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则被赞美成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会。对此,与会学者指出:所谓激进主义的提法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前提和保证。有些人

恰恰对此避而不谈,而是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以单纯的经济观点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把近代的动荡、斗争归咎于革命。与会学者们认为,没有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全面的发展。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生活里的事件,其出发点只能是既成的事实。不从复杂的历史现象出发,在没有对这些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甚至连史实都尚未弄清之前,就把所有问题,包括后来的失误都算到所谓的“激进主义”头上,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学风,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要警惕一些人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西方的某些人对中国的近现代好像特别“热心”。当前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虽然打着淡化理论、淡化意识形态的旗帜,实际是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有些人意识到只有动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才能动摇它的现实。苏联、东欧的演变也说明了这一点<sup>[19]</sup>。

1996年4月10日至11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高校社科中心联合组织了“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对当前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诸如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五四运动与旧文化传统、五四运动与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与思想启蒙、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与政治关怀等等。学者们还对如何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近代史研究的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学者们认为当前史学界思想解放、研究深入,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倾向也值得关注。如在近代史研究中,有人肯定殖民侵略,否定反侵略斗争;美化封建主义统治,拔高封建统治者,贬斥反封建的革命,苛责革命者和改革家。已被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基本论断相继遭到否定,史学界经过数十年研究而得出的主要观点均面临挑战。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与往日对近代国情认识相对立的“新体系”。当前对五四运动和新

文化运动的各种责难,就是这一“新体系”在一个局部问题上的反映。所以,应该超出五四运动的范围来研究这一“新体系”,并对它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给予严肃认真的回答。学者们强调,应该继续坚持并完整地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理论争鸣、学术批评,以明辨是非,澄清谬误,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sup>[20]</sup>。研讨会上有人从明确三方面的关系入手,公开批驳了“告别革命”论。三个关系包括:1、破与立的关系。“告别革命”论断定:“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革命固然可以破坏一切,但不能创造一切”。它把“破”与“立”完全对立起来,并由此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这不仅是对革命的诬蔑,也等于是为真正“破坏一切”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开脱罪责。革命是“破”与“立”的统一。革命运动中的“破”就其主导方面和基本性质而言,是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破”与“立”是辩证的关系,“破”为“立”扫清道路,创造前提;“立”是创造和发展新的成果。“立”的同时还要“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使“立”的成果不断扩大、巩固。从这种辩证关系来看,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创造的力量。2、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告别革命”论断定“改良比革命好”,“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它把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用改良代替、否定革命。一般说来,社会改良只是社会革命的准备和前奏,或者是革命的最低要求。比如五四运动虽然包含了改良的内容,即最低限度的改革要求,但它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最终落实在“根本之改造”的革命目标上。这是五四运动的一大优点。因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改良所无法解决的那些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没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的单纯改良是幼稚的,往往以失败告终。至于用“能量的积累”和“能量的消耗”来判定改良和革命的优劣,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里所说的“能量”是一种抽象。究竟是革命的能量,还是反革命的能量?不首先弄清这个问题,奢谈“积累”或“消耗”就毫无意义。3、肯定革命的正义性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告别革命”论在反对革命的同时,主张“选择和谐、改良、多元共生的思路”。这种思

路以否定一切革命为基础,不但不能导致社会的和谐,反而包含极大的危险。比如,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某些人当时打出“和谐”等口号,否定革命和革命思想,否定革命领袖,结果出现了不是和谐而是亡党的惨祸。没有中国近代的革命,就不会有现阶段的改革。现阶段的改革是过去革命的继续,是在以往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必须明确肯定中国近代历次革命的正义性,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珍惜一切在历史上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革命思想。应当发扬革命传统,用革命精神来从事一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sup>[21]</sup>。

1996年7月24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召开学术座谈会,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思想问题等展开讨论。在京中国近代史专家刘大年、李文海、汪敬虞、龚书铎、沙健孙、丁守和、耿云志、杨天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等40余人与会。张海鹏主持座谈会,他说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很好的,也有令人忧虑的,如有人公开宣告要“告别革命”;还有些过去本很清楚的问题,现在却变得模糊了,如关于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有人公开表示“欢迎侵略”,有人认为不平等条约应该“信守”,有人对“反侵略史观”提出异议等等。这些观点,带有殖民史观的痕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必要进行讨论,明辨是非。他希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多做扎实研究,多出成果,同时多发表文章,对错误的理论观点开展批评,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刘吉在座谈会上说,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理论开展讨论,是历史学研究获得发展的机会。有挑战,有应战,这不是坏事。为此要创造一个好的学术讨论的环境,坚持党的“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通过平等讨论,开展批评与反批评,在讨论中辩明真理,闪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要回答问题,迎接挑战,就要认真

进行研究工作,首先要弄清史实,摆事实,讲道理,有些人往往抓住一些片面的材料做文章,出现种种错误的观点,而唯物辩证法则要求全面掌握事实。历史是在靠事实来说话的。在史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前有必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界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对此要进行深入思考,通过研究与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会学者中,汪敬虞、张国辉、张振□、王晓秋、陶文钊、刘克祥等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分析了这一错误理论观点产生的原因及种种表现,指出其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颠倒是非、蒙骗了青年,对此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澄清是非,辨明真理。刘大年、李文海则分别以《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和《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为题发了言。沙健孙着重谈了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创新,批驳了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程■就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两种回顾发表了看法。郑师渠强调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sup>[22]</sup>

1996年9月4日至25日,国家教委高校社科中心、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还联合举办了“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有八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作了学术报告,参加听讲的有北京各高校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校领导、校宣传部长、社科部主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等200人。讲座受到听讲者的重视和欢迎。

这四次学术讨论会和学术讲座是对中国近现代史重大是非问题中,一些脱离历史实际的学术观点的批评和否定,强调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

在以上学术争鸣的基础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了由沙健孙、龚书铎主编的《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以下简称《走什么路》)一书。本书“编后记”指出: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是十分显著的。这种情况,令人欣慰和感奋。但

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论者打起反对“激进主义”的旗号,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革命和革命的历史。由于这类问题涉及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原则是非,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明。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又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研究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这些话,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讲得很深刻。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更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教训。那里的一些人,为了搞垮社会主义,正是从歪曲、否定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开始的。……《走什么路》这本书,由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北京市历史学会组织编写的。……全书分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评价、研究动态与有关资料共三个部分。收入本书论文的 authors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若干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若干学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的认识也仍然有待于深化。为此,我们需要在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在吸取前人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尤其是进一步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对有关问题展开切实的学术讨论。《走什么路》在序言中也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四分五裂,百业凋零。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奋起革命,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才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且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00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历史也已经证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就不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扫清道路,就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存在于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学习历史,懂得历史,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往的历史关联着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人们总是通过对历史的正确评价来确认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澄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通过一系列学术会议的讨论,通过系列的学术讲座,通过《走什么路》一书的出版,学术界对“告别革命”论和中国近现代史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进行了争鸣,有益于人们明辨学术是非。

注 释:

[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90—1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2]李时岳:《近代改良派和先秦法家》,《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3]肖黎:《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

[4]夏林根:《怎样看待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光明日报》1980年7月8日。

[5]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04页、第140页。

[6]沙健孙:《“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略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求是》1996年第13期。

[7]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良》,《光明日报》1990年12月5日。

[8]徐梁伯:《改良、革命:中国近代化的双翼》,《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1期。

[9]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

第 146—148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10] 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东方》1995 年第 3 期。

[11] 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 年第 5 期。

[12] 转引自谢俊美:《“清末新政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综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5 年第 2 期。

[13] 《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5 年第 8 期。

[14] 宋小庆整理:《当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求是》1996 年第 2 期。

[15] 《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5 年第 8 期。

[16] 《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光明日报》1996 年 3 月 12 日。

[17]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18] 《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高校理论战线》1995 年第 8 期。

[19] 宋小庆整理:《当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求是》1996 年第 2 期。

[20] 宋小庆:《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求是》1996 年第 13 期。

[21]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的道路》,《高校理论战线》1996 年第 6 期。

[22]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发言选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 第十二章 | ‘告别革命’及其批判

### 一、《告别革命》一书的论点

《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1995年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这是李泽厚与刘再复的一本对话录。这本书充分表达了他们告别革命、否定革命的思想观点。下面摘录他们在该书的一些论点,以便更好地把握和了解他们的这一思想倾向。他们说:

我以为改良比革命好。出国后我写的第一篇长文章,题目就是《要改良不要革命》。……对这个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派的争论,现在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康梁的主张是错的。我看康有为那种“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思想在当时很有道理。这个大案似乎可以翻一翻。……所以我常说当时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即使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后也必然是军阀混战,各据一处,称王称霸,都不再听中央的号令,都觉得自己可以当总统、当皇帝。……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

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也就是说,现在我评说孙中山,就不像十五年前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那样热烈地赞颂孙中山的革命了。……康有为比较清醒,他在《孔子改制考》中说 he 自己是“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是小康”。我在《史论》中引用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一段很准确的描述,说“先生教学者常言‘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以是为调,以是为次第。”(梁启超·《康有为传》)康有为这种把远大理想和现实行为分开的做法说明他头脑相当清醒。毛泽东总是做不到这一点,他常常要求理想与现实的同一,结果现实行为总是太急,太浮躁,太浪漫。……过去我们对康有为这种理想与现实分开,在现实上取改良、稳健、顺序渐进的思想和方法,没有充分地看到他的价值,康有为从改良的总思路出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先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现在看来也是很可取的,至少,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可以避免二十世纪中国这么繁多的内战,包括暴力革命、军阀混战、政治运动等等。……文革之后,我对康有为的评价愈来愈高,他选择的是英国式的改良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暴力革命,保持住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避免大破坏、大起伏。二十世纪中国长时间处于破坏之中,真正的建设时间很少。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本世纪初批判康有为的思路,选择暴力革命道路,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不能不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反省近代激进思潮,就是这种思潮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进步的惟一标准,一直到毛的“斗争哲学”,这教训要认真总结。谭嗣同的“激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其后把“激进”绝对化,就很成问题了。……我对法国革命、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等一直怀疑,倒可说是文革时对文革的一种反动。文革开始时,我觉得这很像法国大革命,连各种名称包括街道、医院甚至人名都要“革”掉换掉,很“革命”,很激进,但很浅薄。<sup>[1]</sup>

1997年版的《告别革命》中附有李泽厚《要改良不要革命》一文，下面将主要论点摘录如下：

从一九五〇年代初到一九五八年拙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出版，我主要研究以康、谭等人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尽管我当时对改良派作了相当的赞许和肯定，但基本上还是人云亦云地认同于大陆人文学界的“既定”结论，即认定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戊戌变法的改良思想，在这个世纪初由于反对革命，就日益成为“反动”……“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了。革命，只有革命才是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似乎是大陆数十年来一致认同和奉行的哲学理论和历史事实。大跃进的经济大革命、“文革”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大革命，“反修防修”、“破私立公”的思想道德革命，且不说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派等等规模较小的“群众革命运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开始对这种“造反有理”、“革命总是正确的”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这种“先验”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呢？由于对改良派有过一些研究，对一贯被视为“保守”、“倒退”的康有为、难免有些同情和了解。我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尽管拥护的革命基调未能大改、但有意识地有所变更。例如讲严复时，我硬塞进了这么一段于主题并无直接关系的话：“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进行了论证。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也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严复当年的眼光是锐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1979年版，第281页）……这话现在看来实在平淡无味，但记得当时写时，还不免胆战心惊。……我认为，改良并不一定坏（错），而革命并不一定好（对）。虽然这并不是说中外古今所有的革命或革命主张通通都错了（这需要具体分析），但就本世纪中国来说，一味地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的确并非好事，而是思想史上值得研究和总结的一大问题。……随着1980年禁忌逐渐解除，学术气氛逐渐活跃，我终于敢在少数朋友中宣讲“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辛亥革命一定失败”、“辛亥革命未必必然或必要”之类的论调。不过此调虽然讲已十年，却至今未敢捉笔写文，文字上从未正式提过。……于是，我只好在记者来访时偶尔透露说，“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见《走我自己的路》（修订本）第502页，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下简称《路》）……我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未必必然，是因为我以为自1908年以来，同盟会革命活动在屡遭失败后已进入低潮，组织离析，人心涣散。1911年黄花岗之役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举义之后，武昌本也能如汉口、汉阳一样为清军收复。但历史总是在偶然中游动运行，偏偏光绪慈禧前数年接踵死亡，偏偏没杀袁世凯，并让他轻而易举地乘机控制清廷并按兵不动……于是有辛亥的成功，有袁世凯的篡位，有袁死后的军阀混战。不过，即使没袁，辛亥成功之后也一定会是一个大烂摊子。因为在具有“名号”权威和一定实权的清朝皇帝、政府和传统体制突然垮台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势力和人物必然乘机无所顾虑无所约束地拓展自己。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认的权威、中心、体制、观念以及“名号”，是非常不容易的。谁也不会真正听孙中山的，更不可能让宋教仁去搞政党政治，很可能一开始就是各种新旧都督据地为王，争夺权力，混战一番。可见，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倒必然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和各种权力、地盘、财产的争夺、掠取。我想从辛亥起，如果本世纪没有那么多革命，社会各方面无人管

理、无序混乱、传统毁弃、动荡不安而带来的各种破坏损失一定要小得多。……辛亥革命之所以“未必必要”，正如上述它“未必必然”一样，需要作认真的研讨和论证，我认为，当时各地立宪派已大体长成，以绅商为主体的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并正积极议政、参政甚至主政，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中央政府的清廷也一再宣告“预备立宪”，并派大臣“出洋考察”等等，这些未必如革命派当时所攻击的那样：都是作虚弄假，欺骗人民。当时和今日一律斥之为“伪立宪”，是不足以服人的。当然，立宪的“预备期”，或人嫌之过长，但如平实说来，五年、七年，又算得了什么？中山先生不有其“训政时期”，而介石先生不把它“训”了几十年么？……如果革命只作为威胁力量（这倒是十分重要和有很大作用的，即保持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压力来推动体制内的改革）而不真正发生，局势真能慢慢由“预备立宪”而立宪，而逐渐“虚君共和”（康有为），不打碎那个虽已腐败无能但毕竟还在，并还有实际的和心理的一定权威、力量、象征和惯性，还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制度、章法的旧框架旧制度和旧“国家机器”，来逐步地和平地渐进地进行改革和改良，未必不佳。“打碎了重来”固然痛快，但“打碎”本身就代价高昂，多少头颅多少血；而“重来”就更不容易了。历史证明，“重来”了多次，并不一次就比一次好，有时倒恰好相反。记得有人说过，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它比革命更为麻烦，更为复杂，更为琐细，更为缓慢，更为捉襟见肘，更为令人生气。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心、毅力，需要更为细致、繁琐、枯燥、繁复的调停、协商、和解、妥协、合作的工夫和功夫。痛快当然莫如革命：快刀斩乱麻、一切似均可迎刃而解，慷慨悲歌，义无反顾，生为英雄，死为烈士。于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我在1989年纪念“五四”的短文“启蒙的走向”中（此文始终未能在大陆发表，见《路》），曾提出“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到今天。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推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它可以表现在政治上，也可

以表现在文化上,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文化、学术上的激进经常以政治上的革命、激进为背景、为环境、为起因。……“要改良不要革命”既是针对中国实际而发,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88年我曾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最基本的一条还是真理:即人首先要吃要穿,才能谈其他,这一条我到现在还相信,其他的东西,我认为有很多错误,包括《资本论》,也有错误”(《路》第531页)。这是两年来我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条罪状,即认为我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只剩下一条”,而这一条又是被我歪曲了的,即我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只是强调吃饭的哲学了。……我不再谈阶级斗争,不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无条件地赞成革命,不再相信“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之类的说法了。因此尽管赞成唯物史观,自认仍然属马,但在正统马姓看来,早已背叛马列,理应革出教门,加以讨伐。何况还“毒害了青年一代”呢。不过讨伐自讨伐,我却依然故我,心安理得,仍然“要改良,不要革命”。过去的革命已经革了,谁也没法挽回,如今实在该去总结这些“革”的教训,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2]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引发了学术界的论战,一些学者对《告别革命》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 二、对“告别革命”的批判

对“告别革命”批判的学者有金冲及、李文海、龚书铎、胡绳武、林华国、沙健孙、耿云志、杨天石、张海鹏、谷方等等。

龚书铎的批判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包括:

一、辛亥革命并非“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认为辛亥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

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沦为“洋人的朝廷”。由于它的卖国和腐朽黑暗的统治,不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清政府为实施新政而加捐增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55页);“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一方面发动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一方面领导了反对清政府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保路运动”。然而,这两次运动都遭到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阵营,成为自己的敌对势力。20世纪初,清政府内部皇族与官僚军阀集团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官僚军阀对清王朝离心离德,不再为清政府效力卖命。由上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情势使然,并非“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

二、客观、公正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认为把民国年间出现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归之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符合历史事实。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抱敌视态度,加紧扶植袁世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辛亥革命遭到挫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实行专制、复辟帝制,引起内部分化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从而出现军阀割

据以至混战不断的局面。辛亥革命也有根本性的失误,但不是因为搞掉清政府,而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这次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恰恰是搞掉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一、给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二、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三、正确评价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认为否定辛亥革命的人并未局限于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而且对历史上一切革命都加以否定。有的说,现在应该把“改良”作为褒词,“革命”作为贬词,“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有的则认为,革命不如改良,凡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都不能保持一等国的地位,在转型过程中往往动乱频仍,国无宁日;而凡通过改良转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如英、日等国,则能保持稳定的发展。按照这种说法,不单是辛亥革命搞糟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搞糟了,只有改良才是好的。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它没有事实根据,是对历史的歪曲。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改良也可以起到某种变革社会的作用。在某一国家近代化的变革中,究竟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革命和改良,既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补充的一面。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无疑是错误的。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运动,对社会的发展都曾不同程度起过积极推进作用。但是,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维新派,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都曾尝



试过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均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sup>[3]</sup>

谷方的批判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包括:

一、“破”与“立”。对于“告别革命”论者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革命“破坏一切”,他们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谷方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正直善良和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破坏一切”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迫使中国赔款、割地,践踏中国的主权,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日本侵略军血洗南京,是帝国主义破坏一切的典型例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是与中国的反动派的纵容、支持和丧权辱国的行径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不仅造成中国的物质资源、生命财产的大破坏,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造成了无数的积弊,在人民的精神世界中造成深重的伤害,这些是更深层次的破坏。这两种破坏加在一起,足以证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破坏一切,是“残忍、黑暗、肮脏”的总根源。革命的“破”和“立”是辩证的关系。“破”和“立”各有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但是,“破”为“立”扫清道路,创造前提;“立”巩固和发展“破”的成果。革命运动中的“破”就其主导的方面和基本的性质而言,是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它作为联系和发展环节的否定,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意义。在革命运动中,“破”只是手段,“立”才是目的。革命的本质和核心在于建设和创造,革命能够创造奇迹。革命的创造功能表现在:它直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创造了某些新的形式,并解放群众中的创造力量,激发群众的创造热情,开辟新的创造领域。

“告别革命”论者坚持“革命破坏一切”的观点,否定革命以创造为核心的本质特征,断定“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在中国近代 100 多年中,究竟是什么社会力量使我们的国家濒临绝境,把“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耗尽了?对此,康有为曾经目睹了中国 19 世纪后期的社会状况,说出了当时的一些真相。他在 1895 年上皇帝书中说:此次日本索赔款 2 万万两,这要全国人民 3 年什么都不吃才能付清;假如借洋债,加上利息折扣,100 年还偿还不了。“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45 - 146 页。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他所说的“必有不可言者”是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当时正致力于维新事业的康有为虽然不赞成革命,但他认为“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的局面不是革命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引起革命的原因。“告别革命”论者则说,是革命耗尽了“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从而向革命反攻倒算。从这里,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告别革命”论者的思想倾向。

二、革命情绪与理性。“告别革命”论者断定“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把革命视为下等人“丧失理性”的鲁莽和疯狂的行动,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和变革社会历史的主动性和伟大作用,否定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对此,谷方进行了如下的批驳:首先,认为革命是推动理性发展的巨大力量。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大革命都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有力地推动理论思维的发展。在革命之前,有为革命作准备的理论活动。在革命之后,有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和作下一步新探索的理性活动。因此,与革命相伴的往往是理论上的新创造与新高涨。其次,认为革命具有形成和发展理性精神的坚实的客观基础。革命的理性精神是对革命现实的必然反映。任何真正的人民大革命都是一定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完成由一

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矛盾所确定的历史任务。这种历史任务或迟或早要反映到革命者头脑中来,为革命者所掌握,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再次,革命实践是培养和发展理性精神的伟大学校。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历来如此。革命是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较量,其情况的复杂,变化的迅速,使革命成为激发创造、发明和表现大智大勇的一个特殊重要的场所。任何真正的人民大革命,即使是那些以失败而告终的革命,它的创造、发明,它所表现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它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往往长久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革命的民族甚至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告别革命”论在坚持革命“丧失理性”的同时,把理性与情绪割裂开来,认为革命只靠一股“气”(情绪)而无任何理。谷方认为革命的理性与革命的情绪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一方面,革命的情绪激发人们探索真理的热忱,促进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性对于革命的情绪则起着引发、提高和优化的作用。革命是一种政治艺术,它决不能靠一股气来解决问题。但是,它又决不可以缺少这股“气”。这股“气”就是革命情绪。革命情绪是革命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所表现出来的最真实、最可贵的情感。它鲜明地表现出革命群众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没有这种革命情绪,不可能进行任何革命。

三、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论者断定“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这种观点把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用改良否定革命,反对革命。谷方认为,改良和革命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改良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它反对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反对用改良代替革命,取消革命。“告别革命”论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20世纪会选择革命的方式,为什么在改良方式与革命方式的辩论中,主张改良的总是失败,主张革命的总是胜利?他们的结论是:“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把“疯狂与幼稚”与“告别革命”论联在一起,也许是更恰当的。为什么中国20世纪必然走革命的道路?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这

个基本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告别革命”论者宣布：“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种对21世纪发号施令、挥舞指挥棒的做法是可笑的。21世纪的革命决定于21世纪客观上存在的社会矛盾。我们认为，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间天堂，也不是永葆青春、与天地同久的神话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还在继续发展，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却积累着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展着最终否定其自身的各种因素。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严重社会问题本身就同时产生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对于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虽然不能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意味着将会出现“告别一切革命”的神话。

四、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告别革命”论者虽然否定一切革命，但否定革命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他们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告别革命而能维护社会主义，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在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到现在为止，一些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毫无例外，都是革命的产物，而且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由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首先从告别革命开始。告别社会主义是告别革命的必然结果。从“告别革命”论的内容来看，它从头到尾体现了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它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它诬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今搞成孔教会了”；它诬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它诬蔑社会主义文化是“牢狱文化”；它诬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狱”。它认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全部搞糟了，作为中国革命产物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糟透了。因此，通过告别革命来瓦解社会主义，这是“告别革命”论的本质。我们对于“告别革命”的思潮决不能掉以轻心，能不能彻底肃清“告别革命”论的影响，直接

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如果让一些人肆无忌惮地否定革命运动、否定革命思想、否定革命领袖,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剧思想的混乱,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4]

张海鹏批判的论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张海鹏认为,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能退出历史舞台吗?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可以压制下去吗?“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

其次,“告别革命”论者说,改良比革命好。张海鹏认为,对改良的不加分析的肯定,实际是反对革命的同义语。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惟一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在革命没有发生的时候,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那实际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

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再次,《告别革命》一书作者在序言中说:“影响 20 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作者宣称要“告别”的就是这些革命。难怪作者在否定法国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时候,对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置一词。独立战争恰恰是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但是这样一来,作者自然又制造出一个悖论,制造了一个他们无法辩解的矛盾。作者怎么把民族革命从他们所要反对的革命中分离出来呢?尽管作者巧舌如簧,事实上也难逃反对民族革命的干系。20 世纪的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的性质的?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反帝反封建。

最后,“告别革命”论者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张海鹏认为,这正是他们要改变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策略,于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实际上是“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么?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告别革命”论究竟错在哪里,读者当自会作出判断<sup>[5]</sup>。

以上批判“告别革命”论的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和政治的高度来分析和评判了“告别革命”论的错误和危害,进而有益于人们

坚定信念。而“告别革命”论者的思想观点缺乏史实的依据和论证,如果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即便出于一种哲学的思考,也最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注 释:

[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66、67、70、129、139、140、14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

[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312—32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

[3]龚书铎等:《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求是》1996年第6期。

[4]谷方:《评“告别革命”论》,《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第69—8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5]张海鹏:《“告别革命”论错在哪里?》,《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第86—9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第一部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基本线索的文献目录

#### 一、书 目

##### (一)专 著

- 1.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北京,中华书局 1952 年 4 月初版。
- 2.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 月第 1 版。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韩大成等著:《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3 月第 1 版。
- 3.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 4.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 5.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第 1 版。
- 6.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 7.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 1961 年版。(原名《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 8.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 卷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8 月第 1 版;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 9.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10. 中国人民大学政经系:《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11.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5 月版。
12. 聂宝璋:《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13. 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4. 孔经纬:《中国经济史问题论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5. 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16.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
17.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8. 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 钱穆著:《国史大纲》修订本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20.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 (二)编 著

21. 翦伯赞等:《中国历史概要》,知识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22. 苏双碧主编:《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 1985 年版。
23. 《中国近代史争鸣录》(历史事件篇),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24. 王天奖主编:《中国近代史文摘》(1979 - 1984 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25. 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 - 1989),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26.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27. 景有泉等主编:《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28.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国史学研究动态》,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

3月第1版。

29. 高国抗等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30. 马金科等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31. 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32. 《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1997年卷,三联书店版。

33.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4. 曹家齐著:《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 (三)教材

35.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36. 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

37.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版。

38.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

39.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1版。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共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1984年6月第1版;1984年6月第1版。

41. 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共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1986年6月第1版;1988年8月第1版。

4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43. 魏宏运:《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44. 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45. 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46.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47. 杜经国等编著:《中国近代史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48. 赵矢元等:《简明中国近百年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第 1 版。
49.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册),三联书店 1974 年版。
50.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51. 王承仁等编著:《中国近代八十年史》(1840 - 1919),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52.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53. 陈旭麓主编:《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54. 徐凤晨等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55. 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1840 - 1919)三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56. 陈月清主编:《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57. 尹湘兵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第二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58.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群众出版社 1999 年版。

#### (四)文 集

59.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 8 月第 1 版。
60.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6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4 月第 1 版。
62.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第 1 版。
6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 8 月版。
64.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2 月第 1 版。
65. 荣孟源:《历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66. 来新夏著:《中国近代史述丛》,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67.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第 1 版。
68. 《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69.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70. 《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71. 黎澍:《再思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72. 李侃著:《朝夕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73.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述评》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74. 苏双碧:《朝夕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75. 北京大学历史系:《翦伯赞学术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76. 宫明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77.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78.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79. 陈旭麓:《思辨留踪》,(《陈旭麓文集》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
80. 《吕思勉遗文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81. 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 二、论文

### (一) 50 年代

82. 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济南《文史哲》1951 年第 1 卷第 2 期。
83. 华岗:《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光明日报》1952 年 3 月 15 日。
84. 方回:《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日报》1953 年 10 月 3 日。
85.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北京《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
86.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 年第 6 期。
87.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 年第 2 期。

88.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5年第7期。

89.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史学”63期。

90. 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的分期》,《史学译丛》1956年第1期。

91. 王忍之、徐宗勉:《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北京《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

92. 顾林:《试论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完全形成》,天津《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

93.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北京《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94. 林敦奎:《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北京《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95. 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96. 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天津日报》1956年7月12日“学术”第1期。

97. 荣孟源:《对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98. 王思治等:《评“中国历史纲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99. 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北京《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

100. 祚新:《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定会简况》,《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101. 《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102. 范文澜:《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1日。

10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九五六年七月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近代史讲座所作报告稿),《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史学”94期。

104. 来新夏:《读“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笔记》,《天津日报》1956年10月27日“学术”第2期。

105. 王仁忱:《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北京《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106. 毛健予:《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介绍》,开封《史学月刊》1957年第1期。
107. 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108. 刘耀:《试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长春《史学集刊》1957年第2期。
109. 来新夏:《略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天津日报》1957年3月22日。
110. 章开沅等:《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111. 李荣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112.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问题》,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6期。
113. 姚薇元:《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及其划分阶段的问题》,《理论战线》1958年创刊号。
114. 黎澍:《中国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115. 尚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116.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问题》,上海《学术月刊》1959年第7期。
117.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118.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 (二)60年代

119. 陈绍闻:《略论经济史分期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问题》,《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120. 郭庠林:《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几个问题》,上海《复旦月刊》1960年第2期。
121. 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上海《学术月刊》

1960年第4期。

122. 茅家琦:《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8期。

123. 郭庠林:《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分期的意见》,《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

124. 张传仁:《1919年应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开封《史学月刊》1960年第12期。

125. 赵希鼎:《有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1年第1期。

126. 陈绍闻:《谈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1期。

127. 伍挺锋:《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2月6日。

128. 丁日初:《关于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

129. 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

130. 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5-6期。

131. 李湘:《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

132. 吴江:《论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红旗》1961年第14期。

133. 胡思庸:《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134. 樊百川:《中国工业在外国资本入侵后的遭遇和厄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35. 陈绛等:《中国的原始积累问题》,武汉《江汉学报》1962年第3期。

136. 朱务善:《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北京《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137. 苑书义:《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6月23日。

138. 尚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发生、发展及形成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8期。

139. 杨志信:《中国的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形成》,上海《学术月刊》1962

年第10期。

140. 宝轩:《关于五四运动几个问题的讨论》,天津《历史教学》1963年第12期。

141. 邵循正:《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北京《新建设》1964年第1期。

142. 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143.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发昌机器厂的调查》,《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

### (三)70年代

144. 黎钟进:《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容篡改——驳苏修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谬论》,《武汉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

145. 范文澜遗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146. 刘大年:《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北京,《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47. 朱宗震:《辛亥革命的下限》,《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48. 孙克复等:《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1期。

149. 黄希源:《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的分期问题》,《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1期。

150. 卞哲:《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读书》1979年第1期。

151. 汪士汉:《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152. 谢方正:《略论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南昌《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153. 李永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154. 杨光震:《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初步形成的时间问题》,长春《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155. 李泽:《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156. 陈振江:《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情况》,天津《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 (四) 80年代

15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158.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月8日。

159.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60. 王庆祥:《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讨论》,开封《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

161. 段本洛:《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南京《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162. 汪熙:《工业买办和买办制度》,北京《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63. 刘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164. 丁长清:《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生的初探》,天津《南开学报》1980年第3期。

165. 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济南《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166. 史澍:《我对洋务运动的一些看法》,《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

167. 章开沅、丁名楠、戴逸、汤志钧、李侃、林增平、陈庆华、阮芳纪:《在“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80年5月27日。

168. 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

169. 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三联书店1980年6月第1版。

170. 张磊:《列宁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天津《历史教学》1980年第9期。

171. 曹平:《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2月14日。

172. 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3. 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济南,《文史哲》1981年第1期。

174. 王廷科:《正确估价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关于中国近

代史分期的商榷),成都《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75.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

176.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北京,《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77.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178.刘春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看法》,开封《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179.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180.姜铎:《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5月15日。

181.李时岳:《近代中国的演化和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182.张仪芳:《“五四”三疑》,上海《社联通讯》1981年第6期。

183.郑天廷:《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184.李一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光明日报》1981年9月13日。

185.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第11期。

186.胡绳:《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红旗》1981年第19期。

187.钱念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若干意见》,《宁波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188.杨策:《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刍议》,银川,《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89.汪敬虞:《关于民族资本近代化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北京,《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90.祁龙威:《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红旗》1982年第2期。

191.王桧林:《从教学和研究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北京《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92.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北京《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93. 史全生:《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194. 成汉昌:《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195. 陈铭康:《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北京《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96. 吴妙玲:《近代中国的三次革命高潮》,《文汇报》1982年5月7日。
197. 来新夏:《林则徐与禁烟运动》,福州《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
198. 张岂之:《试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内容与特点》,北京《哲学研究》1982年第8期。
199. 李侃:《中国近代“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7日。
200. 杜恂诚:《官僚资本与旧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11期。
201. 杨宪邦:《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问题》,武汉《江汉论坛》1982年第12期。
202. 乌恩溥:《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特点》,《江汉论坛》1982年第12期。
203. 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答台北学者》,北京《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04. 黄继宗:《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若干问题综述》,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1期。
205. 李光一:《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刍议》,《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06. 张宪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闽西文丛》1983年第1期。
207. 魏永理:《论近代中国曾否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08. 黄逸峰:《洋务运动总论》,上海《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
209. 徐泰来:《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长春《史学集刊》1983年第1期。
210. 《周谷城、丁日初、苑书义谈洋务运动研究》,《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期。
211. 冯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自修大学》1983年第1期。
212. 张海声:《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

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

213. 陈纯仁:《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及其研究对象诸问题》,《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214. 徐泰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哈尔滨《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

215. 孙文范:《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学术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216. 戚其章:《确定基本线索的依据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217. 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济南《文史哲》1983年第3期。

218. 孔令仁:《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

219. 陈月清:《要注意经济政治的综合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3期。

220. 孙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和主要内容》,《自修大学》1983年第3期。

221. 陆文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浅见》,合肥《江淮论坛》1983年第3期。

222. 陈光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23. 《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北京《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224. 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225. 陈碧笙:《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226. 范若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天津《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

227. 汪敬虞:《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北京《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228. 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229. 马玉卿:《浅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西安《人文杂志》1983年第5期。

230. 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复旦学

报》1983年第6期。

231. 祁龙威:《毛泽东思想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南——兼评萧一山〈清代通史〉》,《扬州师范学报》1983年第6期。

232. 李少军、杨卫东:《读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福州《福建论坛》1983年第6期。

233. 修海涛:《谈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文科月刊》1983年第6期。

234.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235. 成汉昌:《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讨论述评》,北京《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6期。

236.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序言》,《人民日报》1983年8月5日。

237. 傅德华、胡礼忠:《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9期。

238. 曾景忠:《中国近现代史划期问题述评》,《百科知识》1983年第10期。

239. 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问题》,《光明日报》1983年11月9日。

240. 李文海:《爱国主义与献身精神——读近代史有感》,《红旗》1983年第16期。

241. 李侃:《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北京《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42. 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43. 张国辉:《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44. 李婉:《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下延三十年》,《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45. 侯玉山:《也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46. 黄如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些看法》,《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47. 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48.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北京《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49. 丁焕章:《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刍议》,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250.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51. 唐传泗等:《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上海,《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
252.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253. 龚家:《中国近、现代史科学断代路标问题刍议》,南昌《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254. 谢本书:《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历史发展的主线》,昆明《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255. 姚全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昆明《思想战线》(云南)1984年第4期。
256. 何若钧等:《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刍议》,广州《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
257. 吴肇庆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学习杂志》1984年第5期。
258. 张耀美:《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与张海鹏同志商榷》,北京《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259. 李华兴:《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上海《复旦学报》1984年第6期。
260. 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天津《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
261. 黄逸峰等:《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
262. 李鸿生:《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广州日报》1984年7月5日。
263. 任关华:《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分期?》《文汇报》1984年7月23日。
264. 李侃:《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漫谈》,《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265. 来新夏:《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266. 《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引起的争论》,《北京日报》1984年9月3

日。

267. 张琢:《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68. 沈渭滨、杨立强:《再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复旦学报》1985 年第 1 期。

269. 朱哲芳:《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几点认识》(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270. 诸庆清:《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271. 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272. 李文海:《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建议》,郑州《中州学刊》1985 年第 2 期。

273.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中州学刊》1985 年第 2 期。

274. 饶怀民:《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

275. 史革新:《中国近代文化史首次学术讨论会纪要》,《历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276. 吴廷桢:《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中国近代史的诞生》,《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

277. 周清泉:《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近代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研究》,《成都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278. 穆子:《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85 年 3 月 29 日。

279. 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北京《历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280. 曾景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281. 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

282. 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

283. 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284. 张静如:《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革命史资料》1986 年第 1

期。

285. 赵春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辨析》,西安《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

286. 刘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若干问题的探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287. 曹锡仁:《论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福州《福建论坛》1986年第3期。

288. 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上海《学术月刊》1986年第2期。

289. 阳晓天:《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系统分析》,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90.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291. 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北京《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292. 苏双碧:《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中的四个层次五种力量》,《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293. 余意明:《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西安《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

294. 朱华:《简论上海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解放日报》1986年7月2日。

295. 赵春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辨析》,天津《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

296. 李泽厚:《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阶段》,《文汇报》1986年12月30日。

297. 高新战:《中国近代史分期发微》,《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298. 何思:《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两重性特点》,福州《福建论坛》1987年第1期。

299. 葛仁钧:《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初探》,沈阳《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300. 张炳清:《中国近代史系统分类及其方法论问题初探》,《求是学刊》1987年第1期。

301. 沈其新:《非体系化研究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沪)1987年第2期。



302. 牟安世:《试析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及其上限》,上海《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303. 何一成:《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革命转变为新民主革命的标志》,《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304. 刘振义:《试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305. 张静如:《二十种中国革命史教材的简略比较》,北京《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

306. 陶用舒:《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研究对象》,《益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307. 曹维琼:《趋向、线索、主题: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再认识》,昆明《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308. 杜经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新议》,《广州研究》1987年第9期。

309. 《理论信息报》1987年10月26日。

310. 林存培:《论中国近现代史上四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发展》,《学习月刊》1987年第10期。

311. 王恩重:《以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为基本线索建立中国近代史体系》,《社会科学报》1987年10月22日。

312. 张静如:《中国革命史体系的若干思考》,《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2期。

313. 黄佳:《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314. 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北京《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315. 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316. 郑晓幸:《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新探》,《开拓》1988年第1期。

317. 涂鸣泉:《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之我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318. 郭世佑等:《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综述》,济南《文史哲》1988年第1期。

319. 白宜傅:《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320.关连吉:《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讨论的新进展——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评介》,《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

321.蒙子良:《浅谈中国革命史的上限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322.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23.何一成:《五卅运动是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转变基本完成的标志》,《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324.林庆元:《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框架》,福州《福建论坛》1988年第2期。

325.姜铎:《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之管见》,《社会科学》(上海)1988年第2期。

326.谢本书:《重评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327.伍云山:《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新论争》,《社会科学评述》1988年第2、3期。

328.徐宗勉:《不要忽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广州研究》1988年第3期。

329.李双璧:《大文化系统:观察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新视角》,长沙《求索》1988年第3期。

330.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31.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32.宾长初:《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兼与杜经国同志商榷》,《广州研究》1988年第3期。

333.吴颖:《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侧议: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新议〉》,《广州研究》1988年第3期。

334.时广东:《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再思考》,《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335.丛广玉:《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与阶段的划分》,《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336.冯明科:《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337.高升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是同盟会的成立》,哈尔滨《理论探

讨》1988年第4期。

338. 钟卓安:《关于近代中国“时代中心”的断想》,《广州研究》1988年第5期。

339. 陆仰渊:《中国近代化进程线索问题述评》,南京《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340.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综述》,济南《文史哲》1988年第5期。

341. 田海蓝:《中西近代史开端的不同契机》,《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342. 吴士英:《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种观点》。济南《文史哲》1988年第5期。

343. 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344. 杨立人:《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345. 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广州《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346. 凌峰:《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347. 钟兴瑜:《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辨析》,《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

348.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1期。

349. 曹炳生:《近代西方殖民征服新论》,《南通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350. 夏东元:《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1期。

351. 唐建增:《中国近代史分期之我见》,昆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352. 刘永明:《试论区别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松辽学刊》1989年第1期。

353. 张凤翔:《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进步潮流之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354. 陈胜<sub>α</sub>:《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广州《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

355. 汪敬虞:《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2期。

356. 鲁兰洲:《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是哪个阶级》,北京《团结报》1989年2月4日。

357. 马鸿谟:《断想五则》,《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58. 白宜傅:《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再思考》,《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359. 王志远:《也谈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石家庄《河北学刊》1989年第3期。

360. 郭世佑:《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再思考》,《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361. 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北京《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62. 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63. 郭世佑:《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区别和联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364. 渐醒:《中国近代史宏观学术研讨会综述》,《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5期。

365. 张静如等:《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济南《东岳论坛》1989年第5期。

#### (五)90年代:

366. 立早:《中国近代史宏观讨论会综述》,《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367. 萧致治:《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近代史体系》,《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368. 郭世佑:《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之我见》,石家庄《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

369. 殷方勇等:《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北京《争鸣》1990年第1期。

370. 任全才:《也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时代论坛》1990年第1期。

371. 丁日初:《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
372. 蒙子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于“五四”说质疑》,《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73. 蒙子良:《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74. 沈传经:《简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合肥《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
375. 郑云山:《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天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
376. 徐松革:《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发展阶段略论》,长沙《求索》1990年第2期。
377. 李华兴:《中国近代史体系散论》,天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
378. 蒙子良:《党的成立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理论学习月刊》1990年第3期。
379. 沈寂:《有关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几个问题》,合肥《安徽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380. 张海鹏:《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第3期。
381. 方小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标志小议》,《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382. 张海声:《“三次革命高潮”说能不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83.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384. 郭世佑:《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综述》,《历史教学》1990年第6期。
385. 《范文澜铜像揭幕暨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纪念》,北京《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86.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87. 顾真:《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认识》,《理论学习月刊》1990年第12期。
388. 姜秉正:《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广州《学术研究》1991年

第1期。

389.张连起:《怎样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

390.李时岳:《论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

391.张磊:《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兼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92.莫志斌:《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393.赵立人:《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广州《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94.胡维革等:《也谈110年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395.徐立亭:《评中国近代开端说》,长春《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

396.关威:《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问题的新思考》,石家庄《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

397.宋德华:《“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社基本线索刍议》,《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

398.李时岳:《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天津《历史教学》1991年第5期。

399.彭明:《屈辱、抗争、探讨——谈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教学》1991年第5期。

400.陈崇凯等:《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和方向》,《学术研究》1992年第1期。

401.席书涛:《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问题》,《学术交流》1992年第1期。

402.宋学文:《也论区别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403.张志平等:《也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404.崔志海:《关于中国近代史问题和线索的再思考》,《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

405.朱育和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的若干想法》,北京《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6期。

406.任振涛:《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标志再探》,《理论学习月刊》1992年第9期。

407. 吕建云:《如何正确界定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408. 郭世佑:《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北京《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409. 姚会元:《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方向的演变》,西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410. 王付昌:《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411. 土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线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
412. 杜耀之:《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413. 郭世佑:《对当前近代史研究理论的新思考》,《河北学刊》1993年第3期。
414. 陈为:《浅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
415. 《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北京《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416. 田百春:《1993年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光明日报》1994年1月31日。
417. 安静波:《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之断想》,《学术交流》1994年第2期。
418. 刘振岩:《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北京《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419. 田毅鹏:《关于近代史开端的几个理论问题》,《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420. 刘光永:《中国近代史上限异说》,兰州《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421. 关威:《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断想》,太原《晋阳学刊》1994年第6期。
422. 张振□:《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23. 俞祖华等:《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与近代史的分期》,《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24. 方小年:《中国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刍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
425. 钟兴瑜:《关于正确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石家庄《河北学

刊》1995年第2期。

426. 郑剑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现状》,开封《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

427. 柳和仁:《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研究上的理论困惑与出路》,《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428. 孙占元:《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脉纵论》,南昌《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429. 任军:《关于中国近代史社会走向问题研究的思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增刊。

430. 费迅:《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研究述论》,北京《党史文苑》1995年第6期。

431. 沙健孙:《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432. 李锦全:《中国近代社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北京《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433.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北京《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34. 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435.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36. 刘大年:《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求是》1997年第2期。

437. 曾景忠:《1991—1995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开封《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438.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39. 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0. 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1. 林华国:《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442. 张海鹏:《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 第二部分:关于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文献目录

### 一、书 目

1.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2.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3.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下册,改革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4. 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 二、论 文

5. 李时岳:《近代改良派和先秦法家》,《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78 年第 2 期。
6. 冉光荣:《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改良、让步和改良、让步政策》,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 年第 4 期。
7. 史逸竹:《改良派的功绩和局限》,《黑龙江日报》1979 年 1 月 19 日。
8. 沈雨梧:《十九世纪末浙江的维新思潮》,《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 年 1、2 期。
9.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的若干问题》,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2 期。
10. 李锡厚:《从严复译〈天演论〉看戊戌时期改良派的特殊性格》,《破与立》1979 年第 5 期。
11. 肖黎:《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光明日报》1979 年 7 月 17 日。
12.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
13. 夏林根:《怎样看待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光明日报》1980 年 7 月 8 日。
14. 金德群:《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运动》,《文汇报》1980 年 7 月 18 日。
15. 邓广铭:《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26日。

16. 徐培华:《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文汇报》1980年9月1日。

17. 沈渭滨:《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南京《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8. 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19. 李新:《造反、革命与改良》,《文汇报》1982年5月25日。

20. 王来棣:《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1. 《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近代世界历史范围内研究》,《成都大学学报》1985(95)年第3期。

22. 《简论上海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解放日报》1986年7月2日。

23. 李泽厚:《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阶段》,《文汇报》1986年12月30日。

24. 张海鹏:《也谈外国侵略与中国近代的“开关”》,《红旗》1987年第6期。

25. 唐昌黎:《论五四以来的革命与破坏主义》,太原《晋阳学刊》1989年第2期。

26. 祁龙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太平天国史学》,南京《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27. 景占魁:《应当正确评价中国革命及其失误》,《晋阳学刊》1990年第5期。

28. 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与改良》,《光明日报》1990年12月5日。

29. 徐梁伯:《改良、革命:中国近代化的双翼》,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1期。

30. 张磊:《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广州《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1. 龚书铎:《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纵横谈》,《求是》1991年第19期。

32. (港)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3. 《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创刊号。

34. 《慈禧新政评议》,《学海》1993年第5期。

- 35.《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从袁世凯复辟到“五四”运动》，南京《学海》1993年第5期。
- 36.《从全球化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重估中国现代化问题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 37.郭莹：《精英人物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 38.姚传德：《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桂林《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2期。
- 39.本土：《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
- 40.《敢问路在何方？——如何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讨论（笔谈）》，《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 41.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6期。
- 42.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北京《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43.谢俊美：《“清末新政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综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
- 44.朱英：《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45.钟兴瑜：《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几个问题》，石家庄《河北学刊》1995年第2期。
- 46.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东方》1995年第3期。
- 47.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北京《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 48.宝成关：《李时岳〈近代史新论〉与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 49.方克立：《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5期。
- 50.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 51.苏全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
- 52.力平：《本固则叶茂、源浊则流浑——中国近现代研究的历史观与方

法论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53.《历史学家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观与方法发论》，《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54.周俊旗：《近年来中国近代史主要问题的研究》，《历史学习》1995年第9期。

55.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北京《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56.宋小庆：《当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求是》1996年第2期。

57.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北京《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8.经盛鸿：《中国近代失去的机遇及其教训》，《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59.《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光明日报》1996年3月12日。

60.绮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当代思潮》1996年第3期。

61.安梅莲：《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62.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63.李炳清：《辛亥革命是犯了“激进主义”错误吗？》，《人民日报》1996年4月6日。

64.苏利亚：《试论近代中国探讨国家出路的可贵思路与方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65.胡松：《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吗》，《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5期。

66.萧致治：《近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启示》，南昌《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67.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68.《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济南《文史哲》1996年第6期。

69.龚书铎：《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说起》，《求

是》1996年第6期。

70. 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6期。

71.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道路》,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6期。

72. 李文海:《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73. 程潜:《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两种回顾》,《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74.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75.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发言选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76. 《爱国的坐标》,北京《读书》1996年第6期。

77. 陈其泰:《学术创新的前提是什么?》,《北京日报》1996年7月4日。

78. 丁守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光明日报》1996年7月23日。

79. 沙健孙:《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略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求是》1996年第13期。

80. 宋小庆:《关于五四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求是》1996年第13期。

81. 谷方:《评告别革命》,《求是》1996年第15期。

82. 王玉婁:《历史的必然与历史的选择》,《求是》1996年第15期。

83.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84. 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85. 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86. 龚书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思考》,《历史教学》1997年第11期。

87. 程潜:《关于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几点思考》,北京《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

88. 陈向阳:《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北京《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89. 张海鹏:《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0. 筱靖:《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2期。

91. 刘光永:《清末改革为什么会被革命取代》,合肥《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

## 编辑后记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于2004年12月底问世了。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一，从1999年开始提出选题并论证，到今天出齐历史卷十一册书，我们曾历经了许多困难和疑惑。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结构体例如何设计。文、史、哲、艺术四大门类的情况千差万别。因哲学领域中论辩过的学术问题特别多，哲学卷无法按照论题划分，就依年代划分内容。其中，方克立先生主编新中国建国前的三册，黄楠森先生主编建国后到“文革”结束的五册，邢贲思先生主编新时期的五册。哲学卷的每本书都涉及几个问题，但重点在其中一两个问题上。

由龚书铎与李文海先生主编的历史卷，则按照十一个论题展开。其中有著名的“五朵金花”和其他几项重大论战内容，也有概括世纪初史坛论争与新时期20年文化论争及历史学理论论争的内容。

文学卷分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两大部分。古典文学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分为四册，由费振刚、韩兆琦先生主编；而现当代文学则按论题划为七册，由郭志刚先生主编。艺术卷由田本相先生主编戏剧册，倪震先生主编电影册，梁茂春先生主编音乐册，邓福星先生主编美术册。艺术卷基本上是按照年代线索梳理问题。

由于历史卷百年学术论辩的内容太多，无法全面顾及，所以，

在选择论题方面,主编们与我们共同确定了两条原则:一、必须是影响当时社会的重要论辩内容;二、在学术史上必须是有价值的较大的论题。不符合这两条原则的学术论辩论题,一般不选入。这两条原则实际上也是整个书系选取论题的原则。

我们希望这个书系能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所以,我们提出了“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述评结合”的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当论则论,不当论则不论”的看法。所谓不当论,即不随便仲裁那些尚未定论的论辩观点,不充当论辩的另一方;所谓当论,是指站在今天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站在今天的学术思想高度,去回顾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论辩历程,评论那些应该评说的地方(如,已经有过定论或已经形成倾向性意见的地方,有重大理论是非的地方),从新的高度认识过去的论辩,而不仅仅罗列材料。为了强化这种出版意图,我们要求每本书的节末、章末要有小结和总结,全书有结语,提出了必须有“论辩的背景、缘起,论辩双方的主要人物、主要观点,论辩的过程,论辩的结果和影响”的要求。

经过主编、作者的努力,现在的历史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资料的广度、深度方面的开发有长足的进展。由于书稿内容涉及的范围广、情况复杂,本卷各本书的参考书大都在百部左右,论文则多达数百篇,少数书的参考资料甚至更多,所以,发掘了许多新材料,发现和认识了一些新的学术人物、新的学术观点。有些新发掘的材料很有分量。但是,应该看到,与百年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材料相比,作者所能用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以历史卷为例,限于篇幅和写作时间,不少材料无法用上。作者们只有采取在《绪论》中说明相关内容与列《主要参考文献目录》的方法进行补救。读者可以从书中获得对问题基本轮廓的认识和一些重要环节的把握,从《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中获得进一步开掘、研究的机会。

二、著作的编排结构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深度。作者们几年来对于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是建构自己著作结构体例的基础。比如,材料发掘的深度所形成的各种观点上下左右之间的深层逻辑



关系,对材料的遴选、梳理、对比和述评词句的斟酌所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观点,对问题发展脉络的清理、认识和把握,对论辩的结果及其所引发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所进行的清晰的述评,无不体现着作者们的研究程度。有时虽然未着一字褒贬,而作者的学术观点尽含其中。以历史卷为例,其中有些分册是很难构思的。用一位作者的话说,开始构思时几乎是如坠云雾。经过几年构思和筛选材料所写出的初稿,经相关专家评审,仍然存在一些可以讨论之处。但是,它毕竟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评论显现出时代感和学术性。以历史卷为例,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时期,各种论辩所表现出的学术思想十分复杂。作者们都实事求是地评析了一些学者当年初步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解释中国的学术观点及其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也对当年认识片面的和粗糙简单的一些论辩观点,被错误批判了的一些学术观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观点中的合理因素,当时未被重视而今天看来很重要的学术观点,当年有过定论而今天有了更新理解的一些观点,一一做了实事求是的评析,有了今天的说法。这些评论都很谨慎,不少是画龙点睛式的点评。由于历史卷是以论题进行构思的,其中许多评论自然是通过前后时期的认识对比而展开的,容易落实和深入。当然,还有一些论辩内容至今尚不能妄加评论,但一些认识倾向仍然闪烁于叙述间。所谓材料见功力、结构见研究、评述见观点,说这些著作是综述形式的个人学术专著,实不为过。

评论还面对着对百年论辩中包含的理论方法的反思。我们在编辑历史卷过程中,就看到作者们都认识到如下一个事实:过去参与论辩的学者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理解不够,或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原话的理解有差异,或者受客观环境影响,从概念、教条出发而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因而造成理论思维模式单一、观点运用单一、评论标准不一,这也是造成论辩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今天,应该如何对待我们曾经引以为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作者们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作者们都认

为,首先必须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次,必须实事求是,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些概念、教条出发。但是,当今学术界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差异——甚至还引发某些争论,对其他理论研究方法也各有认识上的差异,这些都是目前尚未定论的问题。所以,在涉及一些敏感话题而不易表述之时,多数作者选择了运用材料说明自己观点的方法。我们相信读者能够悟察到这些。

在组织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如何做到四大卷几十本书在内容上的各自有序和总体有序,避免出现“前后照应不够、说法不一,内容重复、顾此失彼”的现象,也是主编和我们十分注意的问题。为此,在内容安排方面,历史卷尽量做到相同的重要材料在同分卷各册中此详彼略、此实彼虚。

书稿的写作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对待一些当事人。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当事人(包括其后代)已经不大愿意、甚至忌讳重提往事。但是,本着对学术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对于一些无法回避的论辩内容和无法回避的评析,作者们只能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谨慎地选用和处理材料,尊重一些当事人的权益。如仍有不慎触犯之处,敬请原谅,也请读者谅解。

本书系的历史卷能够顺利完成,我想,首先要归功于江西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高屋建瓴的总策划、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的全力支持,其次是我们编辑室的通力协作。我的两位得力助手——李鸿、吴山芳做了很多工作。从选题初步提出后,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策划、实施方面,我都是和副社长、副总编辑洪安南及她们商量的。

李晃生

2004年12月